

XUEXI YU PIPAN

学习
与
批判

10

1975

杨
世
承
8
1



毛主席语录

列宁为什么说对资产阶级专政，这个问题要搞清楚。这个问题不搞清楚，就会变修正主义。要使全国知道。

《水浒》这部书，好就好在投降。做反面教材，使人民都知道投降派。

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

学习与批判

一九七五年第十期 目 录

学习理论 总结经验 沿着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前进

用大寨精神办好农业机械化 焦 沅 (3)

他们怎样加强大队一级集体经济

——嘉定县方泰公社向阳大队的调查 中共嘉定县委调查组 (7)

社队工业必须贯彻以农业为基础的方针 亭子大队党支部 (11)

一个技术落后的行业实现了自动化

——上海玻璃瓶行业技术改造的调查 本刊记者 (13)

改造老设备 创出新水平 上海第十二棉纺织厂革命委员会 (17)

影评：自力更生的精神是传家宝

——影片《第二个春天》、《战船台》观后感 高义龙 (20)

用《水浒》做反面教材 使人民都知道投降派

三百年来的一桩公案

- 评金圣叹腰斩《水浒》及其引起的争论 罗思鼎 (24)
- 论宋江同高俅的斗争 翟青 (32)
- 评胡适的《水浒》考证 余秋雨 (38)
- 歌颂什么,反对什么?
——评《水浒》的投降主义本质 徐缉熙 (44)
- 试论吴用 章智明 完绍元 (48)
- 评宋江“上山” 石川 (52)
- 工
农
兵
谈
《
水
浒
》
赶着革命的浪头走
——《水浒》杂谈 中国人民解放军某部 方群 (55)
- 我们是怎样评《水浒》的? 中共崇明县海桥公社委员会 (56)
- 宋江的“借”和“买” 五七农场 杨建文 (58)
- “胡敲”与“葫芦” 上海柴油机厂 黄来纪 (59)
- 权谋和宋江 上海电机厂工人 周勇闯 (60)
- 方腊传 齐矛 (63)
- 杂文: 灵牌小议 延风 (71)

教育革命经验总结

- 搞好大学的科学研究工作 复旦大学教育革命组 (73)

社 会 调 查

- 翻砂工人话革新 任菁 (76)

人 物 传 记

- 鲁迅传(续五) 石一歌 (81)

十月六日付印
十月十四日出版

学习理论 总结经验 沿着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前进

用大寨精神办好农业机械化

焦 沅

毛主席指出：农业的根本出路在于机械化。毛主席这一指示，为我国农村在农业集体化的基础上办好农业机械化、实现农业现代化指明了方向，这也是全国亿万贫下中农的共同愿望。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来，随着“农业学大寨”群众运动的深入开展，上海郊区农业机械化的步伐逐步加快了。全郊区国营和集体耕地五百多万亩，现在排灌已经机电化，机耕面积达到百分之八十八，植保、脱粒、农副产品加工都实现了机械化或半机械化，水田作业“四弯腰”（拔秧、插秧、耘耖、收割）的问题也正在积极解决。虽然目前上海郊区农业机械化还是初步的，但是它对提高农业生产力，促进农村经济的全面发展，巩固和发展人民公社集体经济，起了重要作用；对逐步缩小三大差别，限制资产阶级法权，改造小生产的旧传统和旧习惯，巩固农村社会主义阵地，加强无产阶级专政，显示了巨大威力。

回顾上海郊区农业机械化的进程，我们深刻地体会到，要办好农业机械化，必须坚持党的基本路线，发扬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革命精神，大搞群众运动。

上海虽然是一个大工业城市，但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告诉我们，农业机械的制造和修理任务，面广量大，决不是城市大工厂所能全部包得了的。过去，在修正主义路线毒害下，流传着一个说法，叫做“大城市，小郊区，只要工业加加油，郊区样样都会有”。依赖等待的思想多了，自己动手的精神就少了，严重束缚了农业机械化的发展。文化大革命以来，上海郊区广大贫下中农、社员

群众深入批判了刘少奇一伙“国家出钱，农民种田”的谬论，大大激发了自力更生办农业机械化的社会主义积极性，步子越来越快，路子越走越宽广。

办农业机械化，要有机器，要有资金，要有技术力量。怎么解决？是“张开嘴巴叫，伸出双手要”，还是立足于自力更生，艰苦奋斗？这是农业机械化问题上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的分歧。我们坚持的基本方针是，发动群众，自己动手，解决造得出、买得起、用得好的问题。

积极发展社、队工业，建立和健全县、社、大队三级农机修造网，这是实现农业机械化的重要基础。早在一九七〇年，市区工业部门发动工厂清仓查库挖潜力，为郊区一百九十八个公社各提供“四床一机”（车床两台，刨床、钻床各一台，电焊机一架），为二千八百多个生产大队各提供“三大件”（砂轮机、台虎钳、手摇钻），由社、队自筹资金购买，创办起了县、社、大队三级农机修造网。这就不仅基本上解决了农村过去“没有农机想农机，有了农机愁修理”的问题，而且使农机具的制造从当地实际需要出发，因地制宜，灵活多样。现在，上海郊区需要的农业机械，除了拖拉机、机动喷雾机等几个品种外，其余的基本上都能自己制造。对工艺要求较高的农机，在有关市属工厂的指导下，采取全郊区协作，统一布点生产关键部件，由县、社分别装配的办法，上得也比较快。在办好三级农机修造网的同时，我们还按照因地制宜、就地取材的原则，指导社、队发展了一批为农副业生产需要的和为人民生活、大工业和出口服务的工厂（场），既帮助解决了农村生产、生活的需要，又支援了大工业和出口生产的发展，还为社、队积累了资金。一九七四年农村人民公社的总收入中，有百分之三十六是社、队工业提供的。正因为这样，现在郊区购买农业机械所需的资金，基本上都是公社、大队的集体积累。广大社员高兴地说：“社、队办工厂，给农业机械化长了翅膀。”

大力开展农机科研的群众运动，这是提高农业机械化水平的重要途径。在农村的广大贫下中农中间，蕴藏着办农业机械化的巨大积极性，又由于他们有丰富的农业生产经验，对农机具的改革很有发言权。因此，要不断提高农业机械化水平，关键就在于依靠群众，集中群众智慧，大力开展农机科研的群众运动。上海郊区在办农业机械化的过程中，一定时期明确一个主攻方向，交给群众讨论并付诸实现，这就保证了群众性的农机具科研运动能经常持久地开展

下去。以上海县为例，这个县已经形成一支县、社、大队三级农机科研队伍。这支队伍从一九六五年前的十人，发展到现在的九百二十一人，其中县有五十五人，社有一百五十二人，大队有七百十四人。农机研究的项目也从原来的小改小革发展到三十多个重大项目的七十四个品种，其中已经成批生产的有小底盘割晒机、小底盘盖麦机、电动泥浆泵、链齿式开沟犁、黑光灭虫器、链型脱粒机、电动吸泥船、小苗带土移栽机等八个品种。其他科研项目，也大多是群众出题目，群众动手搞，专业人员协助研究提高。群众发动起来了，许多过去未能解决的问题也就有了解决的办法。过去专业单位关门研究了十多年还没有解决问题的机动插秧机，群众运动一兴起，就接连创制出了多种机型。对于耘耨机械，本来有些科技人员认为“稻行只有三寸三，机器进去没法站”，无法解决，群众一起来，不到一年时间就开始突破了。

在群众创造发明的基础上，组织好科研、制造、使用部门三结合和工人、干部、科研人员三结合，对主要的农机项目进行会战攻关，是加快农机科学研究步伐的一项重要措施。会战攻关的主要任务，一是对群众创制的同类机型，进行试验比较，取长补短，综合设计，选型定型；二是对已推广的农机在使用中暴露出来的缺陷，研究改进，逐步完善。从近几年的实践看，这种会战攻关，既是巩固发展农机科研群众运动成果的有效方法，又是工业支援农业、工农合作办机械化的一种好形式。

随着农业机械化的发展，怎样充分发挥农机的作用，保证农业增产，这也是一个必须十分注意的重要问题。上海郊区在这方面主要抓了两条：一是加强对农机操作和维修人员的培训，使之用好农机。近几年，通过三级农机修造网培训的农机操作和维修人员达二十万人。培训方法，除了经常举办各种短训班以外，主要是：农闲时，把农机人员抽到县、社工厂参加农机的装配、修理，学习和提高技术；农忙时，县、社工厂的工人和技术人员到生产队跟班劳动，传授技术，使一大批农机技术人员在战斗中成长起来，水平也逐步提高。二是根据机械操作的特点，不断总结推广相应的栽培管理措施。比如机器插秧，对育秧、整地和管理工作的要求，就与手工操作有所不同，它要求秧苗健壮根短，高度适中；整地要平，不宜过烂；管理要早，补苗要及时。只有这样，才能充分发挥机械效能，实现增产。

这些年来，上海郊区农业机械化在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的激烈斗争中发展，取得了一定成绩，对农业生产的发展起到了应有的作用。上海郊区三百三十万亩粮田，一九六五年三熟制粮食面积只有五万多亩，去年除了还有二十四万亩一麦一稻和三十一万亩绿肥双季稻外，其余的基本上都种三熟粮。一九七四年粮食亩产一千四百四十多斤，有一个公社、七十四个大队、八百十一个生产队亩产超过二千斤。所以能够做到这一点，正如群众所说：“是大寨精神开的花，农业机械出的力。”但是，对照大寨，对照昔阳，我们上海郊区还有很大的差距，农业生产的潜力还很大，农业机械化还要继续革命，还有大量的工作要抓紧做好。

首先，农业机械要随着农业技术的发展不断革新。我们高兴地看到，在大寨精神的鼓舞下，郊区广大社员对农业大干快上的积极性日益高涨，郊区农业生产从品种到农艺都在日新月异地发展着，变化着，因而要求农业机械相应地发展变化，以适应新情况的需要。其次，农业机械要逐步朝一机多用的方向发展。随着集体经济的发展，上海郊区的农业机械日益增多，一个生产大队大大小小的农机有几十种，走起来一长串，摆起来一大片，一机多用的问题就突出了。一机多用，能节约钢材、资金、库房，减少专职操作人员，使用、管理和维修都方便。再次，还要注意节约成本，提高农业技术队伍的水平，加强农机管理。这些问题的进一步解决，就要求我们在实现农业机械化的道路上不松劲，不停步，坚持继续革命。

最近，我们学习了伟大领袖毛主席关于理论问题的重要指示，对农村情况作了一些调查，进一步认识到无产阶级专政在改造小生产方面还是一个长期艰巨的任务，也更深刻地体会到以党的基本路线为纲加速农业机械化的步伐，是一项重大的政治任务，从而提高了进一步办好农业机械化的自觉性。我们决心努力贯彻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的精神，用大寨精神做好农村的各项工作，大力促进农业的发展，为提前实现我们社会主义建设的宏伟目标作出贡献。

(本文作者是上海市革命委员会郊区组工作人员)

他们怎样加强大队一级集体经济

——嘉定县方泰公社向阳大队的调查

嘉定县方泰公社向阳大队，原来生产条件较差，粮食产量较低。随着“农业学大寨”运动的发展，特别是在一九七一年以来，他们积极发展大队一级的集体经济，加强大队在农业生产中的作用和影响，使全大队农业生产条件有了显著改善，粮食连年增产。大队经济的发展，使集体经济不断壮大。一九七四年大队一级的收入比一九七〇年增长十三倍，达三十九万三千多元，生产队一级收入比一九七〇年增长百分之十四，达五十三万一千多元。在同期内，大队一级的收入和固定资产，在大队和生产队两级中的比重，前者从百分之六上升为百分之四十三，后者从百分之二十上升为百分之五十三。社员高兴地说：“大队经济实在好，领导各队改面貌，生产条件大改善，连年丰收有依靠。”一九七三年粮食常年亩产比一九七二年增加百分之二十一点一，一九七四年在遭受雹灾、虫灾的情况下，粮食亩产比上年增加十一斤，达到一千四百九十九斤，今年夏熟和早稻两熟产量又比去年增加了十七万多斤。

发展大队一级集体经济的比重，是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迅速发展的客观要求。特别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来，随着生产有了很大发展，同时也出现了许多新的问题：一是农田水利不适应，许多河道浅曲，而要兴修水利，常常牵涉到几个生产队，“一丈不通，万丈无功”，单靠一个生产队不行。二是发展农业机械化，要有道路、桥梁，但这又不是一个生产队可以办到的。三是随着农业机械的增加，需要加强维修保养，但生产队的物质技术条件差，很难担负起来。正如贫下中农所说：“土地高低有大小，农田水利不配套，要开农机缺路桥，要买拖轮河浅小，两熟改为三熟制，劳力紧张肥料少，水田操作‘三弯腰’，影响产量大提高。”这些情况说明，要进一步发展生产，必须发展大队的集体经济，进一步发挥大队一级集体经济在农业生产上的作用。而且从长远来说，农村人民公社现阶段实行的“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制度，总是要逐步由小集体到大集体，再向全民所有制过渡的。发展大队集体经济，就是为这种逐步发展过渡创造条件的一个重要措施。

开始，有的同志认为，土地是生产队的，劳力在生产队里，大队是个“空架子”，没法办。有的认为，大队办了企业，会影响农业生产，不应办。后来，党支部组织干部和社员学习毛主席有关论述和“六十条”，引导大家回顾解放以来从土地改革、互助组、初级社、高级

社到人民公社的历史，认识到生产力的发展要求变革生产关系，而每次生产关系的变革又大大推动了生产力的发展。因此，当前要进一步发展生产，必须不断调整和完善生产关系。只要我们不搞“一平二调”，不削弱农业生产和生产队一级的集体经济，大队一级的集体经济可以发展，也应该发展。而且，只有大队一级的集体经济发展了，才有可能兴办生产队难以办到的事情，反过来又会促进生产队经济的发展，更加有利于整个人民公社集体经济的壮大。

认识提高后，大家决心从本地的具体条件出发，自力更生，积极发展大队经济。他们组织农村“五匠”，分别建立了大队缝纫组、木工组，又根据城市大工业的需要，因陋就简地办起了一个弹簧加工厂。到一九七四年，大队企业已有养猪、粮食加工、理发、缝纫、竹木、弹簧加工、农机修理七个项目，当年积累达到十三万一千多元。为了不影响农业生产，大队企业的劳动力控制在百四十人左右，占劳动力总数的百分之十三，而且坚持亦工亦农，农忙季节全部回到农业第一线劳动，每年至少在四十天以上。还规定大队企业人员的劳动报酬、劳动时间大体和务农社员相同，除烧炉工等个别的人以外，不发劳动保护用品，不搞任何扩大同务农社员差别的福利措施和津贴。

大队一级的集体经济发展后，积累增加了，物质条件比过去好了，应该怎样帮助生产队发展生产呢？有人曾经主张拨给每个生产队几千元钱分给社员，也有主张帮助穷队还清欠债。但是，这样做不能从根本上改变农业生产条件，不符合贫下中农的长远利益。大队党支部决定根据生产发展的需要，把积累用来兴办生产队无力兴办的事业。三年来，他们把大队积累的近百分之八十用于支援农业生产，在进行农田基本建设、购置农业机械等方面先后投资支出了二十五万八千多元。主要办了以下八件事：

一、搞了一批园田化的土地。三年来，由大队统一规划，筹集资金，组织劳力，建成可以水旱轮作、旱涝保收的园田化农田，占全大队三千零六十八亩耕地的三分之一。其中的工程量，包括大明沟三十三条，地下渠道二千米，四条拖拉机路一千一百多米，桥梁三座，平整高亢地三百多亩。同时还调整了插花田一百多亩。在三分之一的耕地上做到了“小沟通明沟，明沟通河道，地下埋渠道，路上农机跑，土地实现园田化”。

二、建立了一支专业运肥队。过去，由各生产队用农船运城市垃圾、大粪，一次只能运八、九吨，要派强劳动力，花五、六天时间。一到农忙，劳动力紧张，只好停运。现在，大队有一支拥有三艘拖轮、八十吨驳船的专业运肥队，不仅往返时间短，运量大，每吨肥料的运输费用和劳力，比过去节约一半以上，而且农忙不受影响，生产队还可以腾出农船和劳力就近翻泥、割草，使生产队每亩耕地的施肥量比过去增加三、四十担。

三、搞了一些水利工程。由大队统一规划，拨出资金，经过三个冬春的大干苦干，共开挖河道一千四百五十米，四万一千土方。特别是一九七二年把一条“蛇长浜”改造成“向

“阳河”以后，有四个生产队三百多亩农田改善了水利条件，第二年早稻每亩产量即从原来的三、四百斤一跃而超过八百斤。

四、办了一个种子仓库。大队投资建造了种子仓库二百多平方米、水泥晒场三百多平方米，还配备三名老农负责保管全大队的粮食种子，建立了专业育种队伍。每到收获季节，这支专业育种队伍就到各生产队去帮助穗选、片选种子，种子田实行单打单收。种子收获后统一由大队种子库代为保管，做到不同品种专仓储存，插上标签，定期翻晒。播种以前，由种子库负责进行药物处理和发芽试验。这样，不仅种子发芽率达到百分之九十五，而且推动了良种培育工作，使品种不断提纯复壮。

五、组织了一支植物保护队伍。从一九七二年开始，大队先后购置机动喷雾机十一台，一机配备一人，建立了大队植保组。植保人员专机专用，会开会修，平时在生产队一面参加劳动，一面巡回观察病虫害，做到防治及时。而且机动喷雾机由大队统一经营，统一调度，有利于集中力量打开灭战。一九七三年，青石桥生产队早稻纵卷叶虫突发，大队立即调动了四台机动喷雾机，对六十多亩早稻打了三个小时的歼灭战，很快扑灭了虫害。

六、成立了一个农机修配站。这几年由大队投资购置和管理的农业机械，有中型拖拉机二台，插秧机十一台，清扬机、中耕机、收割机各五台，这些农机由大队农机站统一经营调度。农机站还帮助生产队修理农机，培训机修人材。现在已经做到小病小修不出队，中修保养在大队。他们在近两年还新建农机保养仓库十八间，平时帮助生产队做好手扶拖拉机等主要农业机械的保养维修，使用时由各队取回。这样就改变了过去那种“用时想到机器，不用乱丢一气”的现象，既提高了使用效率，又节约了修理费三分之一以上。

七、建造了一批猪棚。过去，这个大队养猪不多。一九七三年起，大队补助生产队新建猪棚五十四间。建棚时，由大队统一规划，将几个队的猪棚连接一起，以便于交流经验，相互促进。一九七四年全大队实现了每亩地一头猪。

八、扩大了一个卫生室。现在，大队不仅为合作医疗盖起了新的卫生室，办起了有五张病床的简易病房，充实了化验设备和药物，而且大队卫生室和生产队卫生员相结合，积极开展除害灭病活动，深受社员欢迎。

向阳大队根据需求和可能，因时因地制宜地办了以上八件事，不仅壮大了大队一级的集体经济，而且增强了大队对生产队特别是穷队发展集体经济的支持。由于大队建立了植保、育种等专业队伍，并和生产队的有关专业人员相结合，使生产大队对生产队的领导更具体、更有效了，同时也帮助社员进一步增强了集体观念。这就为以队为基础的集体经济逐步向高级阶段过渡一步一步地去创造必要的思想和物质条件。

过去，这个大队的各生产队之间，先进与落后的差距很大。以一九七一年为例，粮食常年亩产最高和最低相差三百八十六斤，社员集体分配收入相差四十七元。大队党支部

遵照毛主席提出的要“使全体农村人民共同富裕起来”的教导，认真帮助后进队改变面貌，逐步赶上先进。他们首先帮助后进队端正路线，批判资本主义倾向，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如青石桥生产队一度资本主义邪气上升，不少人热衷于搞自留地和家庭副业，集体生产搞得不好，是有名的后进队。后来，大队党支部深入这个队进行党的基本路线教育，发动社员群众开展两条道路、两条路线斗争，并且帮助他们调整了领导班子。从此，社员群众社会主义积极性大大高涨，一九七四年粮食产量比上一年增加三万多斤，今年夏熟又增产八千斤，开始进入了先进行列。对于生产条件确实很差的后进队，大队党支部一面教育这些队发扬自力更生改变面貌的革命精神，同时给以必要的物质支援。如马家生产队高亢地多，土质贫瘠，生产比较落后，大队一面补助一千六百元帮助他们建造猪棚，支持他们多养猪，多积肥，一面帮助他们发动群众，作出规划，改造高亢地。去年三秋一结束，就大干苦干，平整土地六十亩，使全队三百亩耕地基本上建成可以水旱轮作、旱涝保收的园田化农田。今年夏熟，这个队比去年增产一万多斤，开始出现了新的面貌。贫下中农高兴地说：“大集体有了力量，生产队更能快上”，“现在不但个人离不开集体，就是小集体也离不开大集体了。”

在大队统一规划下进行农田基本建设等工作中，有的生产队往往由于受益少，甚至要暂时遭受损失，思想阻力较大。大队党支部认识到，要处理好生产队之间的相互关系，除了认真落实现阶段农村各项政策以外，更加重要的是，要用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武装群众，要象大寨大队那样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教育农民，发扬爱国家、爱集体的共产主义风格，不断改造小农思想。今年二月，大队规划要改造“九曲十八弯，行船排涝难”的姚家浜，这项工程完成后，有三个生产队可以受益。但新河道要穿过龙里生产队，而对这个队来说，不仅受益少，而且还要影响十六亩耕地。为了说服教育这个生产队的干部和社员自觉支持这一工程，大队党支部深入下去，组织大家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宣传大队远景规划，宣传社会主义集体主义思想。使大家认识到，“一队红，红一点，队队红，红一片”，只有在大队以至更大范围内根本改善生产条件，才能缩小贫富之间的差距，走共同富裕的道路。社员社会主义觉悟一提高，充分发扬了龙江风格，积极投入了开河战斗。与此同时，大队也根据互助互利的精神，对这个队因开河造成的损失，给以必要的补助，并优先分配肥料，帮助他们及时平整土地，改良土壤。

现在，向阳大队党支部正在前一阶段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基础上，检查总结工作。他们决心进一步以理论学习为纲，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认真学习大寨的根本经验，把大队一级的集体经济办得更好，使人民公社集体经济更加巩固、发展。

中共嘉定县委调查组

社队工业必须贯彻 以农业为基础的方针

亭子大队党支部

队办工业应该面向城市还是面向农村？我们大队从办起工业的那一天起，在这个问题上，始终存在着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的斗争。

一九七〇年的一天，我们大队有几个社员焦急地对大队党支部书记说：“现在兄弟大队都在办工厂，我们大队这样穷，为啥不多花点精力也去钻钻门路赚点钱呢？”我们亭子大队，当时确实是上海县社行公社中比较穷的大队之一。为了打好农业翻身仗，我们正在研究采取措施，其中重要的一条，就是努力发展队办企业。但是，这几个社员的话，却引起了我们党支部的思索：“钻门路赚钱，这是队办企业的目的么？”通过反复讨论，我们认识到：队办企业应当发展，但办企业的目的性必须端正。于是，我们组织全体社员学习毛主席光辉的《五·七指示》，明确了一个思想：人民公社要以农业为主，有条件的时候可以办些小工厂，在队办企业中始终要贯彻以农业为基础的方针，坚持以工支农、以工养农，决不能重工轻农转了向。

正是在这样的思想指导下，我们亭子大队的队办企业近几年来有了较快的发展。一九七〇年，大队企业只有农副产品加工组、缝纫组和畜牧场三项，现在，已有了农机具修配组（包括竹、木、白铁修理）、抛光厂以及房屋修建组。队办企业的人数从一九七〇年的十五人增至九十八人，占全大队总劳力的百分之十四点七。企业提供的积累，一九七〇年为一千零五十八元，一九七四年为十万零一千元，增长了近百倍。与此同时，我们大队的农业生产也得到了显著的发展，产量年年上升。一九七四年，粮食常年亩产达到二千零十一斤，棉花亩产一百四十五斤，油菜籽亩产三百五十斤，养猪每亩地平均一点一五头，出现了工农业生产齐飞跃的局面。

我们大队在大办工业过程中，是怎样坚持以农业为基础的方针的呢？

第一，在劳动力安排上，保证以农业为基础。大队党支部始终把主要精力放在抓好农业生产第一线。平时，除一个支委分管企业外，其他六个支委全部扑在农业上；到了农忙季节，分工抓企业的支委就负责全大队农机的调度和机耕质量的检查，确保农业第一线。

为了发展大队工业，人员就要相应增加。安排哪些人进队办工业呢？有人曾提出，工业要办好，就要保证足够数量的骨干力量，应该多安排几个党员。也有人提出，大队办了

工业应多照顾一点干部家属,使干部能安心于农业生产。大队党支部经过讨论研究,有力地抵制了这种议论。我们认为,办好工业是要有骨干力量,但更需要保证农业第一线有足够的骨干力量。因此,我们始终把好人员关。到目前为止,全大队三十五名党员中,只有五名年龄较大、体力较差的安排在大队工业,其余三十名党员都扑在第一线大办农业。干部家属要不要照顾?我们认为,干部的权力是贫下中农给的,绝对不应该有什么特权,更不应该把企业搞成“家属工厂”。干部家属可以进企业,但一定要同社员群众一样,按照条件,由贫下中农推荐,经党支部审批,不得有半点特殊化。为了防止干部搞特殊化,党支部成员以身作则,首先动员自己的家属安心战斗在农业第一线。如支部书记计永芳,副书记汪信礼,分工负责企业工作的支委李国正,每家都有三个小孩,经济有些困难,家属本来就有条件进企业,但他们都反复做好家属工作,至今都没有一个家属进队办厂的。全大队每两户贫下中农中,有一人进队办企业,而全大队四十八名干部,自当上干部以来,只有十一名家属由贫下中农推荐进了企业,仅占干部人数的四分之一。社员群众反映说:“我侬大队干部这个头就是带得好!”

第二,在积累的使用上,有利于农业为基础。我们大队从一九七〇年到一九七四年,共积累资金二十八万五千元。尽管如此,我们在发展企业时仍始终坚持土法上马,因陋就简,从不轻易购置设备。五年来,在用去的二十万三千元中,有十四万五千元用于发展农业生产,占使用资金的百分之七十二。凭借这笔资金,筑成地下渠道三点五公里,改装低压电线二点五公里,建造拖拉机桥两座、畜牧场二十七间、养鸡房五间、饲料加工房五间、修配组和拖拉机房四间,还购买中型拖拉机一台、小拖拉机九台、插秧机七台、收割机两台、机动喷雾机十一台、泥浆泵十台、锥式脱粒机六台。这些农业机械,有力地促进了农业生产的发展。全大队的粮食三熟制一九七〇年占百分之六十,到一九七四年,除秧田面积外,全部实行三熟制。社员群众高兴地说,没有这么多的农业机械,要全面种三熟制就不可能。因为有了七台插秧机,今年后季稻机器插秧的面积达到了百分之九十五。

第三,在服务方向上,着眼于以农业为基础。我们的队办企业,首先抓的是为农业服务的项目,大搞支农产品。自一九七〇年办起修配组以来,不断扩大修配项目,除了修理农机具以外,还修理竹木农具,不断充实修配力量,加强对农机的维修、保养和推广使用。我们努力提高农机修理水平。现在,大拖拉机中修、小拖拉机大修,基本上都可自己解决。我们还为每个生产队培养了一名农机修理人员。今年“三夏”期间,大小拖拉机修理费比去年降低一半多,而效率提高了百分之二十六。大队修建组坚持为社员服务,从去年开始实行社员造房不吃酒肉饭。农副产品加工厂在农忙时将加工成品送到社员家里……。

此外,为了防止企业人员特殊化,大队党支部不断加强以农业为基础的教育。企业人员在农忙季节回生产队劳动,分配水平基本上和务农社员一样。我们亭子大队由于在队办工业问题上把准了方向,坚持贯彻以农业为基础的方针,使得队办企业成为促进农业生产发展的得力因素,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作出了重要贡献。

一个技术落后的行业 实现了自动化

——上海玻璃瓶行业技术改造的调查

上海的玻璃瓶行业，现有十个小厂，二千个职工。以前，这个行业从料场、司炉、制瓶，到检验、包装，整个生产过程都是手工操作，劳动强度高，生产效率低。制瓶工人成天围着炉子，冒着高温，一个班要不停地重复做几千次动作，真是“头点手动浑身摇，十个指头烫满泡，送瓶全靠两腿跑，劳动强度实在高”。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来，他们坚持依靠群众，自力更生，大搞技术革新和技术改造，做到“年年有革新，几年一大变”。到现在，全行业的主要生产过程已经实现了生产自动化，劳动条件显著改善，生产效率成倍提高。一九七四年与一九六五年相比，全行业的制瓶操作工人从一千五百人减为四百四十人，而瓶子产量从二万八千吨增加到五万九千吨，全员劳动生产率提高了两倍，每个制瓶工人的平均劳动生产率提高了六点一倍。

玻璃瓶行业生产的瓶子，供应着医药、食品、文教、日用化妆品等方面的需要。随着这些部门生产的发展，瓶子的生产越来越跟不上需要的增长。一九六五年，即这个行业着手进行全面技术改造的那一年，以食品罐头瓶为例，生产能力只及需要量的百分之四十，工人经常加班突击，仍然摆脱不了被动局面。怎样变被动为主动呢？根本出路在于加快技术改造的步伐，改变手工操作的落后状态。有人认为，技术改造是“远水救不了近火”，“生产任务重，没有时间搞，技术力量差，没有条件搞”。其实，进行技术改造，从暂时来看，要抽调一些人，力，占用一些加工设备，对完成当前生产任务有一定影响，但是，不下决心搞好技术改造，不舍得这暂时的“失”，就没有长远的更大的“得”。在开展技术改造的过程中，这个行业的职工回顾了二一九五八年大跃进中开展技术革新运动的经验。一九五八年前，因为生产技术落后，劳动条件差，生产不能满足需要，整个行业也一直没有摆脱被动局面。大跃进以后，玻璃瓶工人奋发图强，陆续试制成功了拌料机、送瓶机、加料机和半机械化的制瓶机，使生产效率一般提高了百分之五十，取得了可喜的成绩。现在如果不进一步从根本上改变落后面貌，光靠加班加点，生产上的被动局面改变不了，群众的积极性也会受到挫伤。当领导上同群众想到了一块，广大群众的积极性就充分调动起来了。领导

和群众一起，制订了全行业的技术改造规划，决定先集中力量搞自动化的制瓶机，以解决整个瓶子生产的关键问题。为了克服技术改造和完成生产任务的矛盾，他们采取了这样几种做法：群众性的小改小革，在业余时间搞；重大技术改造项目，同工人群众商量，从生产岗位上抽调人来搞，实行“三人生产二人挑，抽出一人搞改造”；新设备要安装、试用时，尽量做到不停产、少停产，坚持边生产、边改造。群众一经发动，许多问题也好办了。如刚试制成功的自动制瓶机试车时，需要拆除手工操作机，如果一次试车不成功，就会影响生产。机修工人和制瓶工人紧密配合，尽量把试车时间放在夜班生产任务较空时进行。遇到自动机试车影响这一班产量的时候，下一班工人就加把劲把脱下的任务补上去。这样，在整个新设备试车过程中，生产任务也保证完成，做到了“生产、改造两不误”。到一九七二年，全行业都用上了自行设计制造的自动制瓶机，初步实现了生产自动化，生产效率又提高一、二倍，整个行业的生产就主动得多了。

玻璃瓶行业在技术改造中，陆续采用了不少具有先进水平的新技术、新设备。他们的经验告诉我们，要使新技术、新设备很快能够在生产上用得上，并且在整个行业推得开，一定要依靠群众走自己发展技术的道路。

这个行业原来有两个厂装有五十年代进口的自动制瓶机。在进行全行业技术改造的时候，有人主张照现成的洋机器仿造一批给各厂就行了。可是，当一台仿造的机器拿到一家瓶子厂去试用时，由于厂房小，机器大，不仅要掘地、拆屋顶，而且这种机器要配备较多的辅助设备，经常的机修工作量很繁重，小厂缺少这种条件，群众都说用这种机器真是“小庙请进大菩萨”，服侍不起。这件事情给大家深刻的教育，认识到：任何事物都离不开一定的具体条件。由于上海的玻璃瓶厂大多是从弄堂小厂裁并改合后建立起来的，原有的厂房小、设备差，机修力量不足，搞技术改造不能从这个实际情况出发。对外国的机器，先进的技术，要认真学习，作为借鉴；但对其落后的、不合理的方面，则应该扬弃。一定要洋为中用；从本行业的具体条件出发，走自己发展生产技术的路子，而决不能脱离实际，照搬照抄。

通过总结经验，他们就发动群众，组织工人、技术人员和干部的“三结合”调查组，深入全行业各制瓶厂，对现有的机器设备，土的、洋的，以及机械化、自动化程度较高和较低的，都一一进行了调查、对比，听取操作工人对这些机器的反映和改进意见，加以综合分析，取长补短，分别设计出了采用气压和液压两种不同的自动制瓶机，然后造出样机，拿到工人群众中去评议。这两种机器体积小，通用性强，可用于生产多种品种，适宜于小型瓶子厂使用，而且造价低，辅助设备少。如气压自动机连同辅助设备在内，造价不到二万元，仅为进口洋机价格的十六分之一。工人看了这两种自己设计的机器都很高兴，说：“这才门当户对了。”经过一段时期的试用后，又组织工人总结经验，取长补短，在这两种机器的基础上，进一步制造了一种 20 型液压自动制瓶机。由于这种新型机器是经过群众反复总结、

试用之后定型的，有比较广泛的群众基础，因此，在全行业普遍推广也就比较顺利。在实现电子化的过程中，他们也同样坚持从本行业现有的物质条件和工人实际技术水平出发，简易入手，土法上马，先搞单机程控；当工人比较熟悉了技术性能，操作比较熟练以后，再搞联动群控。而且每采用一种新技术，都是先在一个或少数几个工厂中试验，成熟一个，推广一批。

在依靠群众大搞技术改造中，领导者的责任是要善于组织群众的积极性，使之发挥更大的作用，以收更大的效果。

首先，正确处理生产前方和技术后方的关系，切实加强技术后方的工作。过去，玻璃瓶工厂大多是“烂泥地上破竹棚”，设备简陋，机修要求不高。随着技术革新和技术改造的开展，越来越感到没有一支相适应的技术后方力量，不能保证生产前方设备的维修和进一步改造，也会影响前方的生产。技术后方需要的力量哪里来呢？他们除了坚持不用后方力量搞日常生产外，相反，采取了“抽前补后”的办法，加强后方建设。当技术改造上马的时候，后方力量不足，就尽可能从生产前方挤。从眼前看，生产前方的力量削弱了一些，但到技术改造项目实现后，生产技术水平提高了，就是对生产前方最有效的支持。他们在实践中体会到，技术后方和生产前方也是对立的统一。前方支援后方，后方搞出新技术就支援了前方，前方因此而可以节省更多的力量进一步充实后方，两者之间是相互支援、相互促进的。这个行业用这种办法，几个循环下来，后方力量加强了，前方生产上去了。目前，这个行业除了有专门负责本行业设备维修和新设备制造的“大后方”——玻璃机模厂等以外，十个瓶子厂都有一个为本厂设备维修和技术革新、技术改造服务的“小后方”。十个厂技术后方的人员，现在比文化大革命前增加了一点二倍，后方人员占全部职工的比例，从百分之六点二提高到百分之十五点八。这支队伍在全行业实现自动化和电子化过程中，发挥了很大的作用。至于技术后方所需要的设备，除了少数是公司分配的以外，绝大多数是各厂工人自己动手造，自己武装自己。这些设备一般都是在技术改造过程中，根据实际需要搞的土设备。如机模厂现有八十多台设备中，约有百分之九十是自己造的。

其次，处理好新技术的普及和提高的关系，搞好群众性的科学技术研究工作。玻璃瓶行业在一九七二年实现自动化以后，一九七四年开始，经过不到一年的时间，又进一步实现了主要工序的电子化。但是，在他们搞电子化的过程中，又面临了一个新问题，即：大多数工人的技术水平与采用的新技术、新设备不相适应，特别是当设备发生故障、需要调整修理时，矛盾就更突出。这个问题不解决，新设备不能充分发挥其优越性，生产不能很快上去，群众的积极性会受影响，新技术的成果也不能巩固、发展。为了进一步推动群众性技术革新不断向前，就有一个大力普及群众性的技术教育问题，这也是技术革新和技术改造工作走群众路线的一个重要内容。因此，他们就发动群众大破电子神秘论，大搞电子技术普及工作。制瓶九厂党支部积极支持工人要求掌握电子技术的强烈愿望，一面有计划地

扩大电子设备试制小组成员，一面采用能者为师的办法，请学过电子基本知识的人当教师，办起了电子技术业余训练班。公司也专门办了电子技术训练班，为各厂培训技术骨干。这样边干边学，许多工人从不懂到懂，较快地学到了一定的电子技术。一年多来，十个瓶子厂陆续投产使用的六十多台电子控制设备，都是工人群众在有关部门热情帮助下试制安装的。有的厂已经在技术革新的实践中，逐步形成一支群众性的科学技术研究队伍。瓶子十厂三个工人和一个技术人员，从一九七三年下半年开始，先是负责试制第一台电子自动控制箱，又继续从事自动检验、自动控制热工仪表的研制和原有革新项目的巩固、提高工作。两年多来，他们的技术水平不断提高，成了厂里不脱产的技术研究人员。现在的问题是，如何有意识地培养提高这支群众性的技术研究队伍，使他们既不脱离劳动，不脱离生产实际，不脱离群众，又能够有一定的时间和条件坚持搞技术研究工作。

通过学习毛主席关于理论问题、反修防修的指示，玻璃瓶行业广大干部和工人群众进一步认识到，普及技术，让工人阶级占领技术阵地，是缩小三大差别，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战略任务。特别是在推广电子技术中曾发生这样一些情况，更加引起了大家的警惕：由于负责试制和应用新技术、新设备的人，开始时总是少数，他们在斗争实践中技术水平提高较快；一旦工厂中用新技术、新设备代替原来的手工操作时，过去的操作熟练工人（他们原来是生产上的骨干），反而变得对生产技术不熟练了。在这种情况下，一定要十分注意思想政治教育。如果只抓技术，不抓技术领域的思想斗争，一些不良倾向就会滋长起来，有些人掌握了新技术，就高人一等，甚至向党伸手，争地位，争待遇。要清醒地认识到，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我们批判了技术第一、专家治厂的修正主义路线，但两个阶级、两条路线的斗争依然存在，资产阶级还会继续散布“技术私有”等腐朽思想来腐蚀人们，以此来扩大三大差别，扩大资产阶级法权，瓦解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因此，我们要为限制资产阶级法权更加自觉地普及技术知识，为工人冲破旧的社会分工的束缚积极创造条件。在这个思想指导下，玻璃瓶行业工人业余技术教育有了新的发展。自前，许多工厂已先后举办了各种形式的电子技术训练班。制瓶十厂还举办了“七·二一”工人电子技术大学，计划在三年内对全厂工人进行技术轮训，使每个工人逐步地做到“四会”——会修、会用、会造、会装。

玻璃瓶行业的技术革新、技术改造工作，目前虽然还不够完善、不够巩固，特别是检验、包装等工序还没有摆脱手工操作的落后状况，但是，只要他们坚持在毛主席革命路线的轨道上前进，坚持全心全意地依靠工人阶级，保持那么一股劲，那么一种革命精神，他们就一定能够不断攀登新的技术高峰，也一定能够为实现造就工人阶级宏大技术队伍这个伟大战略目标，不断取得新的成绩。

（本刊记者）

改造老设备 创出新水平

上海第十二棉纺织厂革命委员会

我们厂是个有五十多年历史的老厂，从前纺到织布，大都是三十年代的“老爷车”。设备旧，型号杂，流程长，效率低，劳动强度也高。人民需要的增长，要求我们不断提高纺织品的产量，扩大品种。可是，落后的设备却拖住了后腿。广大工人对技术改造有强烈的愿望，他们说：“大庆能在荒滩上开成大油田，大寨能在山坡上种出好庄稼，难道我们就不能叫三十年代的老设备达到七十年代的新水平？”

老设备能不能在进行技术改造后获得新生？这个问题开始是有争论的。有些同志把老设备当作包袱，认为“老设备旧机器，潜力挖得差不多了，胡桃壳里榨不出油”。也有的同志满足于已有的成绩，只想修修补补，得过且过。因此，在老设备改造的问题上，存在着不断革新还是因循守旧两种思想的斗争。针对这种情况，我们引导大家坚持一分为二的辩证观点，批判形而上学的错误思想。马克思说：“所有发达的机器都由三个本质上不同的部分组成：发动机，传动机构，工具机或工作机”。以我们纺纱机器来说，也是由传动部分、牵伸部分和成形部分构成的。这三个部分是相互关联又相互区别的。所谓老设备，并不等于设备的所有部分都不管用了，有些老设备的某些部分要淘汰，但其他部分还可以用，如果把淘汰掉的部分来个革新，就可以使老设备达到新水平。我们发动群众对老设备进行解剖，发现除少数设备需要全部更新外，大体上有三种情况：一种是大部分装置已不适应高速、高效的需要，但机身等铸件还可继续使用；一种是在传动、牵伸和成形部分中有一些主要部件需要改造，但其他许多部件仍可利用；还有一种是原有设备经过群众多次改革后，产量已不亚于新设备，但不能适应提高产品质量、降低劳动强度或节约用电的要求，需要适当增添若干自动装置，才能够使它提高效率。这样一分析，使大家具体地看到了旧设备有向高效率转化的巨大可能性。只要我们抱着积极的态度，狠抓技术改造工作，就可以“由尽可能少的价值，创造出尽可能多的使用价值来”，取得花钱少、收效快的成果。

要改造老企业，就要尽量采用新技术、新工艺、新设备。这些新的东西从哪里来？文化大革命前，我们强调自己缺乏技术力量，依赖别人来帮助我们改造，等待国家分配新设备来武装自己，或者只靠少数技术人员关起门来“出点子”、“换花样”，生搬硬套外国的东西。由于不适合本厂生产发展的实际需要，或者没有发动广大群众一起来搞，以致有的新技术、新工艺、新设备长期过不了关，有的即使技术上过了关也不能迅速推广。我们总结了

过去的经验教训,放手发动群众,组织工人、干部和技术人员三结合,机修、保全保养和操作工人三结合,使用单位、制造单位和科研单位三结合,使技术改造取得了较好的效果。广大群众有改变落后面貌的愿望,又熟悉每一道工序、每一台设备上的薄弱环节,因而搞起小改小革来,针对性强,见效快。许多新技术、新工艺、新设备,在群众性小改小革的基础上配套成龙,既切合本厂的实际,搞起来也快。精梳机的改造就是一个明显的例子。为了适应化纤织物的发展,原有的精梳机不论在产量和质量上都不能满足需要,怎么办?是搞扩建、增加精梳机,还是向原有设备挖潜力?光依赖搞扩建,厂内既无场地,国家一下子也供应不了那么多设备。于是,工人们从老设备上挖潜力,在工艺、设备上搞小改小革,产量一下子增加了百分之十五到二十。但是,再提高上去就有困难,需要改变精梳机设计,从结构上开刀。我们和第一纺织机械厂等单位的技术人员和工人组织了攻关小组,经过一百多次试验,终于使精梳机的生产效率又猛增百分之三十以上。精梳机生产效率提高了,又带来新的矛盾:操作工人的劳动强度大大增加,女工剥棉次数从原来三次增加到五次。保全保养工人在操作工人的配合下,又进一步搞了空气吸棉代替人工剥棉等革新,使得精梳机不断完善,受到工人的欢迎。原有的四十二台设备全面改造后,等于新增加了十六台精梳机,为国家节约投资二十五万元,每年增产的精梳涤棉纱,可以做的确良卡其服装五十五万套。最近,又在这个基础上,由第一纺织机械厂自行设计、自行制造了一台赶超世界先进水平的高产精梳机,产量可以再提高百分之四十。这些新技术、新工艺、新设备,都是在发动广大群众小改小革的基础上逐步提高取得的。

在总结群众性小改小革经验时,我们也批判地学习和吸取了外国的先进技术。我们厂的主要设备是老式细纱机,经过多年的改造,车速不断加快,每分钟达到了一万八千转。但是,纱管的容量没有变,都是“小成形”,转速快,断头多,生产工人不能看太多的锭子,所以,产量虽不断提高,劳动生产率却不高。对照一些资本主义国家的机器,虽然车速低,产量低,但是纱管容量大,劳动生产率比较高。广大工人和技术人员遵照毛主席关于“吸收那些用得着的东西,拒绝那些用不着的东西,增加那些自己所特有的东西”的教导,破除迷信,解放思想,对国外采用“低速度,大成形”的技术作了具体分析,吸收了它“大成形”的合理的部分,保持我们自己高速度的特长,来个两全其美。工人们坚持了几年,反复试验,不断改进,从一个工序到近十个工序,全面推开。仅仅这一项,全厂就节约了三百七十多个劳动力,做到了增产不增人,增产又减人。

依靠自己的力量搞技术改造,往往会遇到生产任务紧、人手不足的困难。这也要具体分析。技术改造要抽调一定的人力,有可能影响当前的生产。但技术改造工作抓上去后,又能促进生产的飞跃发展。问题是在领导工作上要全面安排,充分发挥广大工人群众的积极性,做到两手抓,相互促进。我们根据当前生产的需要和可能,分期分批地进行改造。这一部分设备进行改造,原来的生产任务就由其他设备上的工人大家来承担。工人同志说得好,“在技术改造上多花力气、多流汗,才能使生产结大果。”他们采取加快车速、多看机台等各种办法,努力挖掘潜力,尽一切可能增加生产。有些技术改造项目工程量大、牵涉面广,我们在一段时间里,集中全车间以至全厂的人力、物力搞会战,力求全开、速决。过

去要改造一批十五台梳棉机，需要八个月时间，现在只需四个月就完成了。对于一些工程量小的项目，则结合日常的设备维修工作一道进行，以减少停台时间。这样做了，不仅技术改造工作一批批上马了，而且各个季度和全年的生产计划也按时完成了。

我们纺织厂的特点是工序多、机台多的大流程生产：过去我们搞技术改造，是“烂泥萝卜揩一段吃一段”，搞“天女散花”，缺少一个通盘打算，往往一个单项设备的效率很高，但由于没有配套成龙，仍然形成不了综合生产能力，实效不大。文化大革命以来，我们总结群众中有成效的技术革新项目，确定以“发展品种，提高质量，提高劳动生产率，降低劳动强度，降低消耗”作为目标，以“高效能，短流程，大成形，自动化，新材料”作为技术发展方向，狠抓配套成龙，把群众提出来的“挡车不用走，落纱不用手，搬运不用肩，上浆不用粮”等两百多个革新项目，分别轻重缓急，制订出了技术改造规划。一九七二年，规划了布机的改造；一九七三年，规划了精梳机的改造；一九七四年，又规划了布机和细纱坐车以及运输流水线的改造。有了规划同没有规划大不一样，它使我们明确了奋斗目标，树立了长期作战的思想，看准了一个改造项目后，就发动群众，坚持抓下去，一年、二年、三年，一步不放，一抓到底，直到规划实现为止，直到在生产上推广运用为止。象梳棉机，是一个象坦克那样大的家伙，速度慢，效率低，飞花多，工人提出一定要革这个“乌龟壳”的命，口号是，“改造梳棉夺高产，移走车间云雾山，奋战三年改面貌，定叫老机换新颜”。我们组织全厂力量，分了十四期工程，花了三年多时间，改造了梳棉机，产量提高了一倍。原来需要四百零四台，现在只要一百七十二台就够了，车间的含尘量也降低到五毫克以下，大大改善了劳动条件。

生产要年年有增长，技术改造要年年出成果，没有一定的技术后方力量，是叫不应、打不上的。过去，我们的机动车间只有几部老爷机床，只能修修补补，不能适应目前的状况。文化大革命以来，我们打破了纺织厂只能修理机器、不能制造机器的框框，自己动手来武装自己。同时，我们还通过技术革新挖潜力，把生产第一线上节约下的劳动力，充实到后方去发展机修力量。目前，我厂机动车间的机修力量，比一九六五年增长了百分之三十四，专用机床也增长了百分之三十六。技术后方力量加强了，技术改造的工作量也比一九六五年增长了一倍多，维修设备的自给率从百分之三十提高到百分之七十以上。

现在，我们厂全部老设备都经过了程度不同的改造，高速化、连续化、大成形等新技术已广泛应用，使老企业的面貌发生了新的变化。一九七四年与一九六五年相比，生产工人减少百分之十二点五，设备台数减少近百分之二十，而生产总产值增长百分之四十二，棉纱增长百分之十三，劳动生产率增长百分之四十，上缴利润增长一倍多。近三年来，棉布入库一等品率达到百分之九十七点四以上。我们决心继续以党的基本路线为纲，再接再厉，在老厂技术改造上进一步向“四化”（即手工操作机械化、高速高效连续化、电子控制自动化、卷装大容量化）和“四新”（即新技术、新工艺、新设备、新材料）的方向进军，努力为全面超额完成今年的国家计划而奋斗。

自力更生的精神是传家宝

——影片《第二个春天》、《战船台》观后感

高义龙

我们祖国有着漫长的海岸线和辽阔的海域，但多少年来，却只见帝国主义的军舰和船只在我们的海洋上横行。新中国成立后，中国人民做了国家的主人。然而，由于刘少奇、林彪修正主义路线的干扰和破坏，要造出我们自己的军舰、自己的巨轮，仍要经过艰巨的斗争。在影片《第二个春天》和《战船台》中，我们可以看到：围绕要不要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道路的问题，两个阶级、两条路线、两种思想的斗争是何等激烈，壁垒又是何等分明！

《第二个春天》一开始，我国自行设计的新型舰艇“海鹰”试验失败了。一声爆炸，使原先隐藏的矛盾一下子激化起来。“出路”在哪里？不同的阶级对此作出了不同的回答。

工人阶级的态度是鲜明的。他们不怕挫折和失败，坚定地走自力更生的道路。打十四岁就给北洋水师修机器的老梁，从半个世纪的生活经历中深切感受到我们国家必须自己造出好军舰的重要性。他人虽已退休了，但整个心还是扑在“海鹰”上；管理主机的夏长发，受了伤仍然一心惦记着“海鹰”，为了让“海鹰”飞起来，他情愿“多吃苦”，废寝忘食地寻找起火原因，研究解决方法。因为他懂得这不仅仅是一条船的问题，而是关系着走什么道路的问题。党派来的工委书记冯涛，一来到船厂便深入到工人群众中去。他集中了全厂工人群众的智慧和愿望，把造不造“海鹰”的问题同国际和国内的阶级斗争联系起来，进一步提高了广大群众对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认识，鼓舞大家“总结经验再干”。冯涛作为一个领导干部，特别注意“把好方向”，抓好路线，带领工人和技术人员克服了重重困难，夺得了胜利。

“海鹰”起火爆炸，对知识分子更是严峻的考验。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道路究竟还要不要走下去呢？有三种不同的态度：

青年技术人员刘之茵代表着革命知识分子的态度。她没有因为暂时的挫折而丧失信心，在冯涛的启发教育下，努力走与工人群众相结合的道路，为摆脱依赖外国、迅速发展自

已舰艇体系而作出了贡献。

老专家刘自强代表着另一种知识分子。他爱国，想“自强”，不愿跟在外国人的屁股后面团团转。然而，他埋头书本，脱离实际，脱离群众，也就看不到“海鹰”飞起来的道路。从鸦片战争以来，许多有爱国心的知识分子曾经寻找过、试验过这样的“自强”的道路，但都失败了，历史宣告了此路不通。怎么办？办法只有一条，就是按照冯涛说的：离开“现成的道路”，到群众中去，“你会在他们身上吸取到无穷无尽的力量。”

总工程师潘文代表着知识分子中的右翼。他顽固地坚持资产阶级立场，奴颜婢膝地拜倒在外人脚下。从一开始，他就反对自力更生造“海鹰”，认为中国人自己是无法造出自己的舰艇来的；因而一听到“海鹰”起火的消息，便不禁眉飞色舞，幸灾乐祸地叫嚷：“‘海鹰’完了，就在‘飞鱼’上找出路。”他要找的“出路”，实际上是实现个人野心的出路，使中国沦为殖民地的出路。他不仅把自己的命运拴在外国人的身上，并且妄图把中国的命运也拴在外国人的身上，这就难免处处感到与党、与社会主义格格不入。由崇洋迷外进一步堕落到叛党卖国，其间原来就没有什么鸿沟之隔。他在最后走上叛国的道路是不奇怪的。

厂长齐大同与上述这些人不同。这个曾经经过革命战火锻炼的老干部，热爱祖国也热爱党。但是，由于他在担任领导职务后放松了学习，政治不挂帅，终日埋头在事务堆里，看起来辛辛苦苦，忙忙碌碌，实际上却根本分不清路线上的大是大非。他在工作中碰了钉子后，没有能正确地吸取教训，而是被前进中的困难吓倒了，被资产阶级的所谓“技术”吓唬住了，被外国人的“水平”吓唬住了。“海鹰”起火，他连起火的原因都不准找，便下令“丢下”，附和着潘文的调子，要在外国的“飞鱼”上找“出路”。齐大同“丢下”的仅仅是一条“海鹰”吗？不，他丢掉的是中国共产党人的革命精神。他找的“出路”，是条修正主义的道路。因此，从一开始他就不能不同冯涛产生尖锐的矛盾。

冯涛与齐大同的矛盾，不在于要不要外援，要不要引进国外的先进技术。冯涛的态度很明确：“我们不反对技术引进，但不能把出路建立在外国人的身上，我们要坚持自力更生。”独立自主、自力更生，就是要相信自己的力量，依靠自己的努力，把命运操在自己的手里。人民群众中蕴藏着无穷的创造力，只要在一条正确路线的指引下团结起来，就能逐步克服种种困难，创造出人间奇迹。引进国外的某些先进技术，也只有在坚持国家主权的前提下，批判地进行借鉴，才能起到一定作用。帝国主义、现代修正主义是决不会真心实意地来帮助我们建设社会主义的。外国资本家同我们做生意，是为了赚钱，借以解救自己的危机；现代修正主义卖给我们东西，是妄图从政治上控制我们，迫使我们跟着他们的指挥棒团团转。你要坚持马克思主义原则吗？他就撕合同，撤专家，什么卑鄙无耻的勾当都干得出来。看看那个潘文，总觉得月亮是外国的圆，东西是外国的好，顶礼膜拜，奉若神明。当技术员告诉他图纸上有三个数据对不上号时，他看也不看就咄咄逼人地训斥道：“国外图纸会有问题？你这是什么思想？人家赫文斯基专家的水平没有你高？”“对国外技术，我们要端正态度！”在潘文之流的身上，除了奴颜和媚骨之外，什么都没有了。连起码的爱国心、民族自尊心也全都给抛掉了。齐大同呢，由于眼睛里头只有潘文而没有工人群众，拜倒在外國技术文化及其奴才的面前，走上了极其危险的道路。固然，齐大同爱国而

潘文卖国，齐大同爱党而潘文反党，这是有原则区别的。但由于齐大同分不清路线，辨别不了是非，在思想上完全成了潘文的俘虏，结果尽管主观上想爱国而客观上却同潘文混到一起去，这是个悲剧。革命的人们应当认真地记取这个教训。

潘文在攻击独立自主、自力更生道路的时候，口口声声“尊重科学”，不能“狂热蛮干”。齐大同也跟着随声附和。对这个问题，我们必须进行分析。

无产阶级是最尊重科学的。科学的态度就是实事求是，就是尊重事物所固有的客观规律。刘之茵、夏长发为了寻找“海鹰”起火的原因，认真调查研究，一个一个零部件进行仔细检查，严肃认真，一丝不苟。这才是真正的尊重科学的态度。潘文则不同。他用“科学”来吓唬群众，压制群众。这是种什么科学呢？这是资产阶级的伪科学。齐大同上了科学骗子潘文的当，也跟在后面叫嚷什么要讲究“科学”。其实，这些讲科学的人是最不讲科学的。在讨论查“海鹰”起火原因时，潘文振振有词地算了一笔账，结论是起码三年，表面上是够科学的了。但刘之茵驳得好：“机舱起火难道连船头的锚链也要翻一遍吗？”夏长发驳得更有力：“光靠二十几个工程师，三年是不够。可工人呢？造过‘海鹰’的工人有成百上千，我们能两只手造出‘海鹰’，就不能用两只手给‘海鹰’找出毛病？”这一驳驳得好，剥掉了科学骗子潘文的画皮，证明了他所攻击的“狂热蛮干”，正是无产阶级雄心壮志和不怕困难、百折不挠的斗争精神。

说来也巧，《第二个春天》的故事发生在六十年代的第一和第二个春天，《战船台》的故事则发生在七十年代的第一个春天。两部影片的背景整整相隔十年。十年，在历史的长河中只是短暂的一瞬，然而，这个十年又是多么波澜壮阔，经历了多少风暴、湍流和激浪啊！在这不平常的十年中，我们依靠自力更生的道路，粉碎了帝、修、反的反华大合唱，夺得了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新胜利。特别是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战斗洗礼，各条战线都起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在《战船台》中，我们看到了红旗招展、彩霞满天的大好形势，看到了经过对刘少奇修正主义路线的批判，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革命精神更加深入人心，无产阶级的革命力量更加声势浩大，而怀疑和反对自力更生道路的人则越来越孤立了。

但是，斗争并没有结束。一种错误的思想在经过批判后，还会在适当的气候下重新泛起。要不要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道路的斗争，继续在继续进行着。这场斗争还是长期的，曲折的，有时甚至是很激烈的。《战船台》中的斗争，是《第二个春天》中的那场斗争在新形势下的继续。在赵平的身上，我们不是清楚地看到了齐大同的影子吗？

对工人群众大打造船工业翻身仗的积极性，赵平是看不见的。他张口就教训人：“造大船靠冲冲杀杀是不行的，这关系到科学”，这和齐大同说“造军舰靠科学，不是靠憋气”如出一辙。冯涛回答得好：“我这回就是憋了气才来造军舰的。”雷海生、王大船的心中，都憋了这么一股气。面对着帝国主义、现代修正主义对我们的包围、封锁、挑衅，我们能没有气吗？刘少奇一伙鼓吹“洋奴哲学”、“爬行主义”，跪倒在洋人面前，我们能没有气吗？这股气不是别的，正是中国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志气，踏着困难阔步向前的勇气，这是一种极可宝贵的革命精神。有了这股气，我们过去在百般困难的条件下，推翻了三座大

山，迎来了祖国的黎明；有了这股气，我们就能改天换地，在不远的将来，赶上和超过世界先进水平；有了这股气，我们就立于不败之地。我们要保持过去革命战争时期的那么一股劲，那么一股革命热情，那么一种拚命精神，把革命工作做到底。在雷海生、王大船身上，生动地体现了这种勇往直前的革命精神。

赵平恰恰就缺少这股气，他的精神状态与工人群众形成了鲜明的对照。他从文化大革命的烈火中“烧出来”、重新担任领导职务后，并没有正确吸取教训，如同齐大同有了个“危险的进步”一样，他的领导艺术也“越来越高明”了。他不理解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意义，怕危险，求保险，不敢为革命担风险，胸无大志，见到困难就吓得趴在地上。他考虑的不是革命的利益，而是个人“不能再犯错误”。这是种什么世界观？是懦夫懒汉的世界观。作为一个共产党员、领导干部，在这种世界观的支配下，怎么会自觉地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怎么可能在两个阶级、两条路线的斗争中不迷失方向！怎么能带领群众大于社会主义！

现在，我们的国家正处在一个重要的历史发展时期。为了实现在本世纪内把我国建设成社会主义强国的宏伟目标，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道路有着格外重要的意义。自力更生的精神是我们的传家宝。帝国主义、社会帝国主义怕的不只是一条“海鹰”、一条“东风号”，而是我们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革命精神。这种革命精神，过去要发扬，现在要发扬，将来仍然要发扬。有了这种精神，革命的航船就一定会沿着毛主席指引的航向，乘风破浪驶向共产主义的光辉未来。

（上接 70 页）

方腊等五十二人。”辛兴宗一见眼红，就摆出上司架子说：“俘虏由我解往大营，你继续搜山。”韩世忠大叫：“老将军怎能掠俘虏功。”辛兴宗的部下依仗权势，动手来抢，同韩世忠部下冲突起来，双方混斗了一场，小小的偏将韩世忠，哪里斗得过前军主将辛兴宗，终于让辛兴宗夺了功去。辛兴宗查点俘虏，发现只剩下三十九人。吕将、方七佛等十三人趁敌人互相撕咬时，机警地溜走了。

八月二十四日，北宋首都汴京风雨如晦。百万义军领袖方腊在风雨声中不屈就义。

赵宋王朝以为方腊既已死去，也就解除了他们心头的祸结，于是下令重开“花石纲”，恢复“应奉局”，朱勔也官复原职。然而，方腊果真死了吗？不，他没有死，他在继续战斗。看，在义军根据地，脱险后的吕将，不折不挠，率领余下的七万义军，高喊着“圣公在头顶护佑我们”，冲向敌阵；

在浙东，方七佛举着方腊的杏黄色战旗，战斗在丛山峻岭上；

在黄岩，吕师囊与宋军恶战断崖，山水为之变色；

在上苑洞，义军面对无耻叛徒宋江的野蛮屠杀，战斗到洞破刀断，宁死不屈！

当时，谁也不信方腊已经去世。直到几年以后，还有人热情地传说，方腊又出现在安徽歙州的一个名叫山角里的小山村，而那个在汴京就义的方腊，却是为救方腊而冒死替名的一个义军弟兄。这传说是真是假，没人证明，但方腊留下的武器、战袍和靴子，却给了后人以不屈的英雄形象和永远的怀念。

用《水浒》做反面教材 使人民都知道投降派

三百年来的一桩公案

——评金圣叹腰斩《水浒》及其引起的争论

罗 思 鼎

《水浒》通行的本子原有一百回本，一百二十回本多种。明朝末年有个叫金圣叹的，把一百回本《水浒》拦腰砍了一刀，搞了个七十回本。此事一出，攻之者有其人，辩之者有其人，成了三百余年来的一桩公案。腰斩后的《水浒》有没有真实地反映了原作的面貌？为什么那么多人对此发生了强烈的兴趣？这就是本文要讨论的内容。

马克思主义认为：金圣叹把《水浒》砍掉了二十多回。砍掉了，不真实。但金圣叹自己对腰斩《水浒》的事业是颇为得意的。他自我吹嘘说：“一部书七十回，可谓大铺排，此一回可谓大结束，读之正如千里群龙，一芥入海，更无丝毫未了之憾。笑杀罗贯中横添狗尾，徒见其丑也。”^①至于一百回本《水浒》、一百二十回本《水浒》，金圣叹说这些是假货，不真实，是“俗本妄肆改窜，真所谓愚而好自用也”^②；只有他的七十回本《水浒》，才是真正的“古本《水浒》”^③，是真实的。

事实恰正相反，不真实的是金圣叹自己。他截去了《水浒》的后小半，杜撰了卢俊义“惊噩梦”一回，以嵇叔夜杀尽梁山一百零八将作为尾声。鲁迅对此很不满意，专写了一篇《谈金圣叹》，批评七十回本是“断尾巴蜻蜓”，失去了“原

① 《影印金圣叹批改贯华堂原本水浒传》第七十五卷第一页。

②③ 《影印金圣叹批改贯华堂原本水浒传》第七十五卷第二十三页。

作的诚实之处”，尖锐地指出：“他大概并没有什么古本，只是凭了自己的意见删去的，古本云云，无非是一种‘托古’的手段罢了。”（《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

《水浒》的第四十二回是全书的纲。作者通过九天玄女的法旨，点出了全书宣扬投降主义的主题，规定了七十一回后情节发展的基本线索。九天玄女对宋江说得明白：“汝可替天行道为主，全忠仗义为臣，辅国安民，去邪归正。他日功成果满，作为上卿。”还留给他四句“天言”：“遇宿重重喜，逢高不是凶。北幽南至睦，两处见奇功。”七十回本《水浒》删去了四句“天言”，保留了“去邪归正”之前的内容。但既然砍掉了《水浒》的后小半，宋江失去了向宋王朝投降效忠的机会，前面大半部的思想发展线索也就落了空。这类漏洞在七十回本《水浒》中可说是大量的。金圣叹为了弥补漏洞，对《水浒》作了许多删砍；但砍来删去，毕竟无法砍掉《水浒》所宣扬的投降主题，结果只落得个全书破绽百出。金圣叹居然还自吹“更无丝毫未了之憾”，岂非自欺欺人之谈？

金圣叹声称他的这部断尾巴《水浒》忠实地反映了作者的本意，这话也不真实。《水浒》的成书固然在元末明初，但其故事情节却渊源自南宋以来流行的传说，经过各种说话人历年来的添改，又经过杂剧的敷演，才逐步丰富和完整起来。无论是宋代的话本或者是元代的杂剧，都已经有了宋江受招安、打方腊的情节。到了小说《水浒》成书后，作者更是全力地歌颂和美化了宋江这个投降派。金圣叹派定《水浒》的作者“只是把宋江深恶痛绝”^①，不过是证明他自己在发昏罢了。即使是在七十回本《水浒》中，尽管经过金圣叹的苦心删改，宋江与其说是个“倡众落草”的“盗魁”^②，还不如说是个忠心耿耿的封建奴才。宋江推行投降主义路线的结果，必然是受招安，打方腊。金圣叹让宋江在“噩梦”中被斩首，完全违背了原作者通过宋江来鼓吹投降主义的真实用意。

金圣叹本名人瑞，取号圣叹。又是“人”中之“瑞”，又受“圣”人赏“叹”，可见他是以封建卫道士自居的。但是，他自以为对《水浒》的腰斩是代圣人立言，真实而全面地反映了整个封建统治阶级的观点和意图，这却是又一个不真实。封建统治阶级内部由于经济和政治利益的不同而分成了不同的集团和派别。金圣叹本人由于得罪了某些官绅，在清代初年被牵涉进“哭唐案”而杀了头，就说明了他只属手地主阶级中的个别集团、个别派别。他的腰斩《水浒》，也不可能代表整个封建统治阶级的观点和意图，只能是代表了地主阶级中某个派别

① 《影印金圣叹批改贯华堂原本水浒传》第三卷第一页。

② 《影印金圣叹批改贯华堂原本水浒传》第三十九卷第五页、第二十二卷第一页。

的利益。

历史是欢喜嘲弄人的。金圣叹认为只有自己才是真正的圣人之徒，而不承认《水浒》中的宋江有充当封建卫道士的资格；封建阶级中却有人认为金圣叹是该死的异端分子，不承认金圣叹有充当封建卫道士的资格。金圣叹只是在卢俊义的恶梦中将忠于封建朝廷的宋江问斩，而金圣叹自己却活生生地遭到了他效忠的封建朝廷的问斩。金圣叹容不得宋江曾经投奔过梁山的投机举动，封建官府则同样容不得金圣叹“哭庙”的越轨行为。这种复杂而奇妙的情况，完全可以从阶级根源上得到解释。地主阶级内部的不同政治派别，反映了它们之间在经济地位上的差异以及出身和教养的不同。只要这种差异和不同还存在着，各种不同派别的存在就是不可避免的。地主阶级贪得无厌的本性，决定了它内部各派之间在财产和权力再分配的问题上，必然地要进行着你死我活的争夺。金圣叹在明末从征剿派的立场出发，把为招抚派所欣赏的投降派宋江看作“异端”，非得让他在梦中杀头不可；清初的江南地方官吏从在朝派的立场出发，把在“哭庙案”中闹了一点小乱子的在野派金圣叹看作“异端”，也得把他在刑场上杀头不可。金圣叹的“杀”宋江和他自己的被杀，归根到底，是地主阶级内部狗咬狗争吵的结果。

二

金圣叹批改的七十回本《水浒》，在当时及以后引起了一场不大不小的风波，这实际上是一桩政治公案。它是反动统治阶级内部两派斗争的继续，即《水浒》中宋江与高俅斗争在现实生活中的继续。

高俅此人顽固而又昏庸。他反对“剿”和“抚”的交替使用，强调征剿而屏弃招安。金圣叹也是一个高俅。他只懂得杀戮而不懂得诱降，只要稽叔夜而不要宋江。鲁迅深刻地指出：“单是截去《水浒》的后小半，梦想有一‘稽叔夜’来杀尽宋江们，也就昏庸得可以。”（《谈金圣叹》）稽叔夜们的屠刀只能杀戮革命农民的肉体，宋江一类投降派的欺骗却能瓦解革命农民的斗志，它的作用是一百个、一千个稽叔夜所代替不了的。列宁曾经指出：“所有一切压迫阶级，为了维持自己的统治，都需要有两种社会职能：一种是刽子手的职能，另一种是牧师的职能。”（《第二国际的破产》）在镇压和瓦解梁山义军这一点上，稽叔夜执行的是刽子手的职能，而宋江则扮演了牧师的角色。如果把宋江们都杀尽了，让谁来充当抚慰和欺骗革命农民的反动牧师呢？何况，宋江在打方腊的过程中，证明了他在执行反革命刽子手的职能上，不仅不比稽叔夜们差，而且有过之而无不及。

在清代，凡是站在金圣叹一边的，大多是一批大大小小的高俅。他们都坚

持镇压,反对招安。清初的封建小官僚王望如,就特别欣赏金圣叹用卢俊义的恶梦来做七十回本《水浒》的结尾,认为“有功于圣人不小”,使“盗贼不寒而栗”^①。清朝道光年间的俞万春,也是口口声声“圣叹先生”,痛骂一百回本、一百二十回本是“伪书”,而将七十回本《水浒》吹捧成真正的“(施)耐庵之前水浒传”^②。他强调“既是忠义,必不做强盗;既是强盗,必不算忠义”^③,为此,还专门写了一部《荡寇志》与七十回本《水浒》相衔接,让祝家庄的后人把梁山的一百零八将杀得干干净净,用以证明“当年宋江并没有受招安平方腊的话”^④。王、俞等人不能理解《水浒》通过宋江来宣扬投降主义思潮的真实用心,看不到也不愿意看到宋江这类混在农民军中的投降派与自己是同类人物。他们认为只有对起义农民斩尽杀绝,才能使革命人民“不寒而栗”,再也不敢造反。然而,这类人其实很昏庸。革命农民是斩不尽、杀不绝的。反动统治者的疯狂杀戮,只会激起革命农民更猛烈的反抗。正如鲁迅所说的:“石在,火种是不会绝的。”(《且介亭杂文二集·“题未定”草》)

但也还有更昏庸的,清初的归庄就是一个。他直截地认为《水浒》是“倡乱之书”^⑤,金圣叹又是腰斩,又是批注,反而抬高了《水浒》的地位,“惑人心,坏风俗,乱学术,其罪不可胜诛矣。”^⑥在归庄的冬烘头脑中,除了封建经书之外,就是写八股文,什么《水浒》不《水浒》,干脆一把火烧掉就是了。金圣叹否定宋江但肯定《水浒》,归庄则既否定宋江也否定《水浒》,而且连金圣叹也一起给否定掉了。这种历史现象很值得分析。在农民阶级与地主阶级的两军对垒中,革命农民一方打的是红旗,封建统治阶级一方打的是白旗,壁垒分明,不容混淆。然而,宋江这类投降派打出的却是一面颜色杂乱的灰色旗子。说它是红旗,底里是白的;说它是白旗,表面上又是红的。《水浒》中的李逵、吴用等人没有看到红色底下的白色,误认了这面旗子,结果被宋江在梁山上用“替天行道”的假红旗、真白旗取代了晁盖的革命红旗,葬送了梁山的革命事业。金圣叹和他的拥护者只看到了它在白色上面涂着的红色,也误认了这面旗子,因此就砍去了《水浒》的后小半,用杀戮的结局来恫吓人们不再举起红旗。归庄这类人物则认为凡是与红色沾上了边的,不管这种红色是真是假,都应一律烧毁灭绝,以免人们引起对红旗的回忆。他认为金圣叹对《水浒》的删改是多此一举,最好的反革命法子是不承认世界上有过红旗,完全是一种鸵鸟式的态度。从《水浒》作者到金圣叹再到归庄,虽然同属于地主阶级的立场,但一个比一个反动露骨,也一个比一个更为昏庸。

① 《评注全图增象五才子书》卷首《王望如先生评注图象水浒传总论》第一页。

②③④ 俞万春:《荡寇志》,商务印书馆版第一卷第一页。

⑤⑥ 归庄:《归元恭文续钞》附录《诛邪鬼》。

赞扬金圣叹腰斩《水浒》的那些人物，并不全都昏庸，有人就看出了《水浒》原作的奥妙。日本资产阶级学者盐谷温赞扬金圣叹的腰斩《水浒》，“取了豪快的前半”，“为《水浒》吐其万丈的气焰”^①，称得上是金圣叹的海外知音。但仔细一追究，不对了，金圣叹反对宋江而盐谷温肯定宋江，这可是个很大的分歧。盐谷温肯定的是金圣叹砍过的《水浒》而并不赞成金圣叹砍《水浒》的本意。他与金圣叹不同，完全能够领略《水浒》通过宋江来宣扬投降主义思潮的苦心，但是他嫌一百回本，一百二十回本写出了宋江投降的全过程，未免太露骨了。而经过金圣叹这么一砍，使宋江在“梁山泊英雄惊恶梦”这一回中成了壮烈牺牲的农民英雄，不由得使盐谷温认为“是非常神韵缥缈而留着有无量的感慨的，确使一读不禁拍案叫快”^②。是的，金圣叹这一刀砍下去的客观社会效果，是他本人在主观动机上所从来没有想到过的。他主观上想贬低宋江而客观上却抬高了宋江；他主观上误解了《水浒》的本意而客观上却发扬了《水浒》的本意。他不让宋江受招安，是为了使假红色、真白色的《水浒》剥落掉它的保护色；但结果在客观上却进一步掩护了《水浒》的投降主义本质和宋江的投降派真面目，使它们具有了更大的欺骗性。就这样，昏庸的金圣叹对反动统治做了并不昏庸的事。盐谷温清楚地看到了这一点，当然要“不禁拍案叫快”了。至于“拍案叫快”的原因还有点什么的，盐谷温没有说。但后来当蒋介石在抗日战争中大肆进行反共投降活动的时候，有个日本帝国主义分子说出了盐谷温没有说出的话。他竭力吹捧《水浒》“对中国民族的研究是无可比拟的好材料”^③。什么好材料呢？好就好在鼓吹投降。这个日本帝国主义分子扬言：“今天在重庆的蒋介石的情况，也和梁山泊末期宋江的处境和心情很有相同之处”^④。看，《水浒》就是这样地被日本帝国主义者当作对中华民族的败类进行诱降的“好材料”的。

三

在《水浒》中，宋江比高俅要狡猾。现实生活中的宋江们也比高俅们更难识破。清代地主阶级中那些反对金圣叹腰斩《水浒》的人，就都支持和拥护宋江。早在乾隆年间，就有人重新捡拾起了金圣叹砍掉的那条尾巴，把它改名为《征四寇》而单独刊印，并说：“虽始行不端，而能翻然悔悟，改弦易辙，以善其修，斯其意固可嘉，而其功诚可不泯”^⑤。用今天的话来说，也就是造反该杀，投降可

①② 盐谷温：《中国文学概论讲话》，开明书店一九二九年中译本第四一七页。

③ 井坂锦江：《〈水浒〉与中华民族》，一九四二年日文版第一页。

④ 井坂锦江：《〈水浒〉与中华民族》作者序。

⑤ 鲁迅：《中国小说史略》，人民文学出版社一九七三年版第一二四页。

嘉。清初还有个叫陈忱的封建文人，反对七十回本而赞成一百回本，同情投降派宋江。但是，他对一百回本《水浒》也有不满意的地方，这就是叛徒宋江最后被高俅毒死的结局，太令投降派气短了。为此，他写了《后水浒传》作为一百回本《水浒》的续篇，让燕青、杨林冒死混进金营去见宋徽宗，感动得皇帝当面褒奖“宋江忠义之士，多建功劳”^①，还让李俊等人受新皇帝宋高宗的册封，在海外称王，享尽荣华富贵，给《水浒》添加了一条光明的尾巴。但无论是拾取尾巴或者是添加尾巴，目的都是为了通过不同的方式去鼓励人们向投降派宋江学习，当顺民。软刀子割头不觉死，这是他们比昏庸的金圣叹要狡猾的地方。

在那些反对金圣叹腰斩《水浒》的人中，也有人属于受骗上当的性质。在辛亥革命时期，就有人站在民族资产阶级立场上，否定《水浒》的七十回本而肯定一百回本，赞扬《水浒》“纯重民权，发扬公理”^②，批评金圣叹的腰斩是《水浒》的“厉劫”^③。所以如此，这不仅是由于受了《水浒》假象的蒙蔽，把“只反贪官，不反天子”当作是反对“数千年之专制政府”^④，而且有着极其深刻的阶级根源。中国民族资产阶级与帝国主义和封建阶级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从娘肚子里带来了软弱性、妥协性和动摇性。原谅别人是为了原谅自己。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原谅宋江的妥协和动摇，就正是为了原谅自己身上的妥协和动摇。中国民族资产阶级那种参加革命的可能性和对革命敌人的妥协性的两面性格，决定了他们反对高俅而同情宋江，能够识别金圣叹这类反革命死硬派而不能识别宋江这类隐藏在革命阵营中的投降派。这种特点，反映了中国民族资产阶级不可能将中国革命彻底进行下去，即使作为革命的同盟者，也是一个极不可靠的同盟者，常易发生妥协和动摇。

在这场关于金圣叹腰斩《水浒》的历史争论中，买办文人胡适是各类人物中最狡猾的一个。这种狡猾，在于他看到了宋江和金圣叹对反动统治都同样有用，爱前者也爱后者。他爱金圣叹，是由于他钦佩金圣叹的反革命立场坚决，但他更爱宋江，因为他需要宋江们和他一起来帮助帝国主义及其走狗“征服中国民族的心”^⑤。因此，他既欣赏金圣叹在《水浒》批注中所表现的死硬派态度，称赞他是“何等眼光！何等胆气！”^⑥但是，又反对金圣叹的对宋江认友为敌，“处处把施耐庵恭维宋江之处都解作痛骂宋江”^⑦，责骂他“迂腐”、“可厌”^⑧。胡适对金圣叹责骂中夹杂着称赞、怨恨中搀和着怜惜的这种复杂心理，既有着他个人政治生涯中的难言之隐，也反映了投降派所特有的共同苦恼。当

① 陈忱：《水浒后传》，上海古典文学出版社一九五六年版第二一四页。

②③ 燕南尚生：《新评水浒传》，直隶官书局发行。

④ 蛮：《小说小话》，见《中国小说史料》，古典文学出版社一九五七年版第三十七—三十八页。

⑤ 鲁迅：《且介亭杂文·关于中国的两三件事》。

⑥⑦⑧ 《胡适文存》卷三《〈水浒传〉考证》。

年，胡适作为新月派首领为国民党反动派忠心奔走的时候，由于在对付革命者的策略上存在着分歧，曾经遭到了国民党反动派的误解，虽说幸免于金圣叹式的杀头，却也着实受了一阵惊慌，吓得赶紧在《新月》杂志上引据三民主义以自辩，总算保住了教授的职位。因此，胡适怨恨金圣叹“误解了《水浒传》的用意”^①，竟将属于同一营垒中的宋江问斩。但胡适又怜惜金圣叹的遭到清朝政府的误解，以致忠于封建朝廷的金圣叹竟死于封建朝廷之手。胡适当然也同情自己，为自己遭到反动主子的误解而感到伤心。凡属投降派，身上必定涂有保护色，这固然对于革命人民增加了欺骗性，但也每每容易引起同一反动营垒中伙伴们的误解，甚至误遭杀戮，岂不冤哉枉也！忠于反革命的宋江遭到了反革命金圣叹的误解，忠于封建朝廷的金圣叹遭到了封建朝廷的误解，忠于国民党反动派的胡适及新月派遭到了国民党反动派的误解，这种团团转的走马灯式的历史现象，反映了反革命营垒中一点特别有趣的争斗，一个不大不小的缺口，一种又痒又痛的矛盾。（《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

四

在这场延续三百余年的争论中，各个不同阶级各个不同集团的代表人物相继登场，分别对金圣叹腰斩《水浒》的这桩公案发表了很不相同的意见。争论的焦点，则始终在于究竟应当如何看待宋江这个投降派，如何看待《水浒》所宣扬的投降主义思潮。长期以来，这场争论基本上停留在反革命营垒内部。尽管有的肯定金圣叹而否定宋江，有的否定宋江而肯定金圣叹，有的既否定宋江又否定金圣叹，有的既肯定宋江而又肯定金圣叹，说法五花八门，但其共同目的，都是为了镇压革命人民，只是在反革命策略上存在着某些分歧而已。

直到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末，中国文化革命的主将——鲁迅参加了这场讨论以后，才使这场争论具有了革命和反革命两派对垒的性质。鲁迅在一九二九年发表了《流氓的变迁》，在一九三三年发表了《谈金圣叹》，不仅深刻地谴责了金圣叹顽固的反动立场，而且剥掉了宋江这类投降派身上披着的革命画皮，与胡适既爱金圣叹又爱宋江的反动立场形成了鲜明的对照。鲁迅尖锐地指出：“一部《水浒》，说得很分明：因为不反对天子，所以大军一到，便受招安，替国家打别的强盗——不‘替天行道’的强盗去了。终于是奴才。”（《流氓的变迁》）

鲁迅批判古代反动派，正是为了批判现代反动派——胡适及胡适式人物。在反革命营垒中，宋江与高俅、《水浒》作者与金圣叹，分别代表着两种不同类型的反动人物。在这两类人中，鲁迅着重批判的是前者而不是后者，是革命营

^① 《胡适文存》卷三《〈水浒传〉考证》。

垒中的投降派而不是反革命营垒中的死硬派。金圣叹这类反动的死硬分子，其反革命言论和行动是公开的，赤裸裸的，较易被革命人民所识破。而对革命最危险的，是以革命派面目出现的投降派，冒充着马克思主义的修正主义。这种隐藏在革命阵营内部的反革命，比公开的反革命要更隐蔽、更虚伪、更狡猾，同时也更富有欺骗性。正因如此，鲁迅一再提醒革命人民要对这类人物提高警惕。

新中国建立以后，在刘少奇修正主义路线的影响下，《水浒》及宋江之流仍被继续得到吹捧。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前，关于《水浒》的大量评论，几乎都违背鲁迅的论述，美化和歌颂《水浒》所肯定的宋江的投降主义路线。六十年代初期，当国内外修正主义思潮泛滥时，学术界还曾经刮起过为金圣叹翻案的歪风。修正主义者欢迎在《水浒》问题上的认识混乱，因为这种状况有利于他们推行修正主义路线，搞投降、倒退。当古代的投降派在书籍、舞台、银幕上耀武扬威的时候，人们是不容易识破现代的投降派的。

但是，这种状况再也不能允许它继续存在下去了。

毛主席最近指出：“《水浒》这部书，好就好在投降。做反面教材，使人民都知道投降派。”毛主席又说：“《水浒》只反贪官，不反皇帝。晁盖盖于一百〇八人之外。宋江投降，搞修正主义，把晁盖的聚义厅改为忠义堂，让人招安了。宋江同高俅的斗争，是地主阶级内部这一派反对那一派的斗争。宋江投降了，就去打方腊。”毛主席的指示，深刻地揭露了《水浒》宣扬投降主义路线的本质，指出了宋江搞修正主义、投降主义的真面目，并使鲁迅对《水浒》的论述得以重新阐明并被提高到了反修防修的高度。

毛主席用极其精辟的马克思主义论述断定了《水浒》这桩公案。但只要有机阶级斗争在，有投降派和投降主义思潮在，有修正主义在，《水浒》就仍然还会有翻案的可能。历史上，定了案又翻案的，中国有，外国也有。列宁、斯大林定了苏联走十月革命道路的案，但赫鲁晓夫一上台，就立即翻了这个案，并为此而重新修改了苏联党的历史，为其篡党、篡政和全面地复辟资本主义制造舆论。这种定案和翻案的斗争将贯穿在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全过程中。然而，只要革命人民以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武器，深入持久地开展革命的大批判，深刻地认识了投降派及投降主义思潮的危害性及其各种表现，修正主义要翻案也就难了。因此，我们必须认真学习和领会毛主席的指示，开展对《水浒》的评论和讨论，这对于我们党和我国人民，在现在和将来，在本世纪和下世纪坚持马克思主义、反对修正主义，把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坚持下去，都有重大的、深刻的意义。

论宋江同高俅的斗争

翟 青

毛主席最近指出：“宋江同高俅的斗争，是地主阶级内部这一派反对那一派的斗争。”这一马克思主义的论断，深刻而尖锐地揭露了《水浒》中的宋江是地主阶级在梁山农民军中的代理人。

从表面上看，宋江和高俅的遭遇的确很不相同。高俅本是个破落户的浮浪子弟，被人告了一状而发配充军，成了人人厌恶的社会渣滓。他碰上了一个偶然的机会，依仗一脚“鸳鸯拐”把自己踢上了殿帅府太尉的宝座，成了暴发户。宋江则相反。他自幼攻读经史，忠孝守法有名声，是个正统的官僚地主分子。谁知由于杀死阎婆惜吃了官司，落得个刺配充军的结果，不仅高升无门，而且性命难保，被迫上梁山当了“寇”。

宋江和高俅都不是孤立的个人，而是分别代表了地主阶级内部的两派。宋江这一派在地主阶级中与高俅这类大狗、饱狗不同，属于小狗、饿狗一类，很不甘心于这种无权的地位。加上他们屡遭高俅这一派的打击排挤，受尽鸟气，就越加增强了对官职和权势的垂涎。《水浒》中所描写的宋江同高俅的斗争，就正是地主阶级内部这种大狗小狗饱狗饿狗之间的一点特别有趣的争斗。

宋江从封建统治集团内部的角逐中败下阵来，在地主阶级大大小小的山头中找不到一块安身立命之地，为了保存自己以便日后东山再起，只得“暂借水泊里随时避难”，这就是他上梁山的根本动机。宋江虽然怀才不遇，牢骚满腹，但他一不怪皇帝，二不怨朝廷，恨只恨“奸臣当道，谗佞专权，屈害忠良”。他比奸臣为浮云，皇帝为白日，说什么“皇上至圣至明，只被奸臣闭塞，暂时昏昧”，日后必定“云开见日”，并以效忠皇帝，拨扫浮云为己任。正是从这样的思想基础出发，决定了宋江必然要在梁山起义军内部推行一条只反贪官、不反皇帝，接受招安的投降主义路线。所谓“借得山东烟水寨，来买凤城春色”，就生动地表明了宋江选择的是一条“曲线求官”或曰“曲线尽忠”的道路。他的反贪官，反高俅，说到底，不过是为了排除“求官”路上的障碍罢了。

宋江同高俅的斗争，直接与梁山农民起义的斗争交织在一起。梁山起义大

军攻打州府、横扫贪官的一系列斗争，引起了封建朝廷的惊恐。高俅这条在封建朝廷中十分得宠的恶狗，为了报答皇帝的青睞，第一个跳将出来，叫嚷着要用武力镇压梁山的农民革命。当他自己的兄弟高廉知府被杀之后，更是在皇帝面前大骂“梁山泊贼首晁盖、宋江，屡造大恶”，称之为朝廷的“心腹大患”，说什么“若不早行诛剿，他日养成贼势，难以制伏”。一经皇帝准奏，高俅立即大兴三路兵，恶狠狠地扑向梁山，恨不得将梁山顷刻推向血泊之中。在这种背景下，宋江和高俅的斗争也由原先的迂回曲折走向了短兵相接。这时，我们第一次听到宋江在指名道姓地叫骂：“高太尉那厮是个心地匾窄之徒，忘人大恩，记入小过。”为何宋江如此痛恨高俅？这是由于高俅血洗梁山的行动，严重威胁着他“曲线尽忠”的如意算盘，打破了他“专等招安”的美梦。

高俅的征剿梁山遭到了可耻的失败，这是梁山好汉们坚持晁盖的正确路线浴血奋战的结果。但宋江却不仅借此打击了自己的对手高俅，还百般笼络抚慰被梁山农民军俘虏的高俅走卒——彭玘、韩滔、呼延灼等，把他们从高俅一派中分化出来，壮大了自己一派的力量，使自己增强了同封建朝廷讨价还价的政治资本。宋江这个叛徒、内奸把梁山农民军所取得的胜利和功绩，作为他向封建朝廷投降的敲门砖和垫脚石，这是朴实的梁山农民英雄们在梦中都没有想到过的。

宋江所处的梁山水泊不是清一色，高俅所在的封建朝廷内部也不是铁板一块，双方都在阶级斗争的大动荡中发生不断的分化和组合，形成五花八门的各种党派。在梁山，围绕着对封建王朝的不同态度，有革命派和投降派之分；在朝廷，围绕着对梁山农民军采取什么策略的争论，有征剿派和招安派之别。各党各派一个接一个登场表演，从而呈现出—幅由种种联系和相互作用交织起来的复杂画面。其中，宋江同高俅的斗争是组成这幅画面的一条重要线索，它对各党各派都发生着严重的影响。

先看梁山内部的革命派和投降派。他们之间存在着两条路线的根本分歧。前者既反贪官，又反皇帝；后者则只反贪官，不反皇帝。他们终极的政治目的虽然不同，但是，在反贪官、打高俅这一点上却可以勉强地求得暂时的一致。混进梁山革命队伍的宋江，以他同高俅的斗争掩盖了他们之间的矛盾不过是地主阶级内部这一派反对另一派的实质。这样，他就把梁山革命派的视线转移到了高俅的身上，而不去注意同高俅一鼻孔出气的自己，掩盖了他篡权搞修正主义的反动本质。就凭着这一招，宋江逐步转移了李逵、吴用、三阮等革命派反皇帝的大方向，同时也就逐步改变了这支农民起义队伍的革命性质，使它成了宋江搞地主阶级内部派系斗争的工具。在梁山起义军的将领中，不仅林冲、

杨志、柴进等人与高俅有血海深仇，史进和鲁智深等人也都分别从王进和林冲的不幸遭遇中看到了高俅的横暴狠毒。尽管这些人上山以后分别走着很不相同的道路，但在宋江同高俅的斗争中，都很自然地站到了宋江一边。

再看朝廷内部的征剿派和招安派。他们之间在维护封建王朝统治的根本利益方面完全一致，而在对用什么途径和方法扼杀农民革命方面却存在着分歧。前者以高俅、蔡京、童贯、杨戩为代表，主张对梁山杀个痛快，后者以宿元景、赵鼎、崔靖、张叔夜为代表，主张以好言抚慰笼络宋江。他们“两派反革命竞赛，一派说我们的法子最好，另一派说我们的法子最好”。双方争宠于殿前，加罪于对方，争来吵去，闹得不可开交。为什么要争吵？这是因为两派分别代表着地主阶级中不同集团的利益。哪一派的法子显了灵，哪一派就可以进一步增强自己这一派的地位和实力，从而使本集团压倒地主阶级中别的集团，在朝廷上声势烜赫地独揽大权。征剿派和招安派分别从自己一派的利益出发，各执一端，而皇帝则是主张两手并用，一半用花言巧语，一半用大军威胁。先是征剿，后是招安；招安不成，继续征剿；征剿之中，又搞招安。宋徽宗之所以一会儿支持征剿派，一会儿又支持招安派，反映他作为地主阶级的总头目，是征剿派和招安派共同的后台。

既然征剿派和招安派对宋江的态度不同，宋江也必然对他们区别对待。宋江是个“夷道纯熟”的地主阶级分子，深知牧师和刽子手的两种职能是缺一不可的。但由于他走的是“曲线尽忠”的道路，自然也就不可避免地投靠了地主阶级中主张招安的这一派。早在梁山好汉闹西岳华山的时候，宋江就向宿元景私下吐露过：“宋江原是郓城县小吏，为被官司所逼，不得已啸聚山林，权借梁山水泊避难，专等朝廷招安，与国家出力。”因此，征剿派不懂宋江的真实心意，招安派却深知宋江的用心良苦。以后，在征剿派和招安派的争吵过程中，宋江对自己的命运始终捉摸不定，惴惴不安。征剿派得势了，他提心吊胆，忧中夹愤；招安派得势了，他便喜从天降，笑逐颜开。其实，宋江的烦闷完全是多余的，九天玄女不是早就嘱咐过两句“天言”吗？“遇宿重重喜，逢高不是凶。”这就是说，你宋江遇见“忠臣”宿元景是喜上加喜，即使碰见“奸臣”高俅也算不上是什么凶险。

为什么“遇宿重重喜”呢？如果说宿元景之流是在朝的招安派，那么宋江就是在野的招安派。一个在朝廷里策划招安，反对高俅为首的征剿派；一个则在梁山内接受招安，压制以李逵为代表的反招安派。梁山革命派和朝廷征剿派都反招安，但前者是坚持用革命暴力镇压反革命，后者是坚持用反革命暴力镇压革命。这是两种性质截然不同的反招安。宋江面临着梁山内外这两种性质

不同的反招安力量，最好的出路就是巴结和笼络朝廷内的招安派，来它个里应外合，以实现受招安的阴谋。这样做，既瓦解了梁山的农民革命队伍，又压倒了高俅，岂不是一箭双雕。然后，带着这样一支改变了性质的农民武装去朝拜天子，为封建朝廷镇压别的农民起义军，用广大农民军的鲜血去换取自己的升官发财。你看，这简直可以说是一举三得的了。

又为什么“逢高不是凶”呢？那就是宋江和高俅同属于地主阶级，都是农民革命的对象。他们之间所代表的派别利益虽然不同，但在维护封建地主阶级统治的根本利益上却是完全一致的。宋江从征剿派对梁山的多次武力镇压中，看出了高俅是个在朝的实力派铁腕人物，便也动了勾结之心。我们从他不准追杀童贯、乞求鄧美回朝善言解救、放走韩存保、党世雄到济州城向高俅转达“并无异心”等一系列活动中，可以十分清楚地看出宋江的地主阶级本性。李逵、吴用、三阮等梁山英雄们浴血苦战，三败高俅，沉重地打击了北宋封建王朝；而宋江这个叛徒、内奸却在对付农民起义军、镇压革命派这一点上和高俅结成了联盟。就在梁山农民军节节胜利的大好形势下，宋江发布了一项命令：“如若今后杀人者，定依军令，处以重刑！”象高俅这样的梁山死敌，血债累累，不杀不足以平民愤。可是，宋江见张顺水泼泼地将高俅提上山来，慌忙下堂，给他换上鲜衣美服，请上正座，纳头便拜，口称死罪。不仅如此，宋江还杀牛宰马，大摆筵席，执杯擎盏，殷勤款待，摇尾乞怜地说：“万望太尉慈悯，救拔深陷之人，得瞻天日，刻骨铭心，誓图死报”。老奸巨猾的高俅为了保命，佯装愿意回朝奏请降诏招安。这一下宋江感动极了，赶忙叩首拜谢。丑死了，丑死了。动不动就膝盖发软，完全是一副奴才相。请读者注意，宋江在这里所说的“救拔深陷之人”，倒确是一语泄露了天机。原来只要高俅能同宋江一起合作搞垮梁山的农民革命事业，他们之间就可以把宿怨一笔勾销。

然而，宋江和高俅毕竟分别代表着地主阶级内部的不同派别，剥削阶级的本性决定了他们之间争夺权力的斗争不可能有片刻的停止。宋江为了实现投降的反动目的，把抓到手中的高俅放了回去。但高俅回朝却不履行诺言，不仅不奏请皇帝招安，还把萧让、乐和软禁在后花园里。这种情况表明了反动统治阶级内部不同集团之间的争斗，同样是不可调和的你死我活的斗争。后来，由于朝中以宿元景为首的招安派暂时得势，使宋江实现了投降的宿愿，同高俅、童贯合伙去打不“替天行道”的强盗，去平田虎、诛王庆、讨方腊。但他们之间绝不可能因此就相安无事，而是以另一种形式继续着狗咬狗的争吵。宋江为皇室卖力，残酷地屠杀农民起义军，在朝廷上本该论功行赏。但每次都遭到高俅这一派的阻挠和破坏，深恐宋江有功高升，灭了自已这一派的威风。最后宋江

这个叛徒被天子封官授职，高俅一伙更是嫉妒万分。高俅对杨戩说：“这宋江、卢俊义皆是我等仇人，今日倒吃他做了有功之臣，受朝廷这等恩赐，却教他上马管军，下马管民。我等省院官僚，如何不惹人耻笑？”你看，地主阶级内部就是这个样子，一派得势，另一派就不高兴，一个个都象乌眼鸡似的，恨不得你吃了我，我吃了你。最终，宋江还是给高俅的一杯毒酒毒死了，这就是叛徒的下场。

纵观宋江同高俅的斗争，实质上是地主阶级内部进行财产和权力再分配的一场闹剧。而宋江只不过是这场闹剧中的一个“三丑”（俗称小花脸）。这种角色，正如鲁迅所指出的，“他所扮演的是保护公子的拳师，或是趋奉公子的清客。”《水浒》把宋江描写成“清官”和“忠臣”，用意也就在于此。宋江真的不“贪”吗？他所谓“济人贫苦，赙人之急，扶人之困”的大量钱财是哪里来的？他用以收买江湖义士的无数金银又是哪里来的？说到底，他之所以反贪官、抗高俅，还不是由于高俅这一派的“贪”妨碍了自己这一派的“贪”！在封建社会里，无官不贪，这是由地主阶级的贪得无厌的本性所决定的。地主阶级内部的不同派别、集团，由于分赃不均，有饱饿之差，并因此而发生了争吵。但在保护封建国家机器这一点上，这一群大狗小狗饱狗饿狗对主子的忠心程度并没有什么差别，一旦皇帝主子受到威胁，它们就一齐扑向了主子的敌人。《水浒》中的征剿派、招安派和投降派为了保卫封建王朝，聚集在一起共同对付梁山的革命派，不就是这样一种情景吗？这正如毛主席所指出的，各种反动派“虽然不能够巩固地团结一致，虽然会发生无穷的互相争吵，互相恶骂，互相埋怨，互相抛弃，但是在有一点上却会互相合作，这就是用各种方法力图破坏革命势力而保存反动势力”。

封建社会的主要矛盾，是农民阶级和地主阶级的矛盾。但是，由于地主阶级内部存在着各种代表不同集团利益的不同派别，或者是由于对阶级斗争的形势具有着不同的估计，他们之间也有利害冲突，也会发生矛盾。从根本上说，地主阶级这一派同另一派的斗争，决不可能超越维护地主阶级专政的范围。“清官”也好，“贪官”也好，都是地主阶级专政的工具。宋江和高俅的区别，不过是笑面虎和青面虎的区别。笑面和青面之别，是现象；凡是老虎都要吃人，才是本质。人们不容易受张牙舞爪扑来的青面虎的欺骗，却容易被项上挂着数珠的笑面虎所蒙蔽，在这一点上，笑面虎往往比青面虎更危险，更毒辣。高俅的屠刀，杀不垮梁山的农民起义军，而宋江的欺骗却很快地瓦解了这支久经沙场、能征惯战的农民队伍。宋江起到了高俅所起不到的作用。正如鲁迅所说的，“敌人是不足惧的，最可怕的是自己营垒里的蛀虫，许多事都败在

他们手里。”

《水浒》极力渲染宋江同高俅的斗争，最终目的是为了肯定宋江对皇帝的效忠。小说的一开头就对赵宋王朝歌功颂德，接着又连篇累牍地吹捧“皇上至圣至明”。在第八十二回和第一百二十回中，《水浒》安排了两处天子骂贪官的情节。一处是当皇帝知道了童贯、高俅破坏招安又打败仗的真相以后，竟然大骂：“都是汝等不才贪佞之臣，枉受朝廷爵禄，坏了国家大事！”吓得童贯、高俅一度“不敢入朝”，这大概就是宋江所盼望的“云开见日”之时吧！另一处是皇帝知道宋江死于高俅毒手的真相以后，也是怒不可遏地责骂高俅、杨戩：“败国奸臣，坏寡人天下！”吓得“二人俯伏在地，叩头谢罪”。其实，高俅一派之所以能如此猖狂得势，正是因为有皇帝作他们的总后台。因此，怎么能够用天子骂贪官来把皇帝和贪官分割开来呢？毛主席说：“在封建国家中，皇帝有至高无上的权力，在各地方分设官职以掌兵、刑、钱、谷等事，并依靠地主绅士作为全部封建统治的基础”。封建官吏是皇帝的爪牙，他们沆瀣一气地共同组成了封建的国家机器。《水浒》不反皇帝，实质上就是不准反地主阶级的总头子，不准触动封建国家机器。相反，却用“好皇帝”“清官”一类的地主阶级的政治偶像来欺骗人民，麻痹人民的革命斗志。既然如此，这部小说所起的作用究竟是对地主阶级有利还是对农民革命有利，难道还不够明显吗？

从宋江同高俅的斗争中，还可以看出一切反动阶级的内部矛盾都是不可调和的。他们之间的这种争斗、缺口或矛盾，对于革命的人民是十分有用的。毛主席早在《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一文中就指出：“我们要把敌人营垒中间的一切争斗、缺口、矛盾，统统收集起来，作为反对当前主要敌人之用。”今天，我们在同帝国主义、修正主义和一切反动派作斗争中，同样应当如此。但是，任何时候，我们都不能被敌人营垒中间的争斗、缺口、矛盾所迷惑。修正主义者中的某些人，出于本集团的一党一派的私利，往往会声嘶力竭地反对属于同一营垒中的另一党一派，借以掩盖他们同革命人民的根本矛盾，从而运用孙行者钻进肚皮去的战术，在革命队伍内部干着许多善良的人们所意想不到的事情。刘少奇、林彪就都是这样一类人物，他们挂着共产党员的招牌而干着修正主义的勾当，同古代的宋江一样，是一伙现代的投降派。我们应当从《水浒》这部反面教材中吸取教训，总结经验，增强在复杂的路线斗争中识别革命派和投降派、马克思主义和修正主义的能力。这样去做，对于我们在现在和将来，在本世纪和下世纪，坚持马克思主义、反对修正主义，坚持革命、反对投降，都有着重大的深刻的意义。

评胡适的《水浒》考证

余秋雨

胡适是中国现代史上一个臭名昭著的投降派。他叛离五四新文化运动，投降过北洋军阀，投降过国民党反动派和美帝国主义。胡适一生曾陆续写了七万字左右的《水浒》考证和评论文章。投降派论投降主义，很值得一读。

胡适评《水浒》，屡屡提起金圣叹。但他对金圣叹的态度非常特别，一方面，好象对他意见大得很，说“他的迂腐气比三家村学究的更可厌！”^①他“无中生有的主观见解，真正冤枉煞古人！”^②甚至公开声明自己“不赞成金圣叹的《水浒》评”^③；另一方面，他又盛赞金圣叹对《水浒》的评论“何等眼光！何等胆气！”^④说什么“圣叹的辩才是无敌的，他的笔锋是最能动人的”，“在小说批评界，他的权威直推翻了王世贞、李贽、钟惺等等有名的批评家。”^⑤讲的是同一个人对同一本书的评论，为何态度悬殊若此？

一贬一褒，各有原因。骂金圣叹，是因为“他误解了《水浒传》的用意。他不知道七十回本删去招安以后事正是格外反抗政府。”^⑥请注意胡适用的“误解”这个词。如果《水浒》是一部反抗政府的书，删政后“格外反抗政府”，就谈不上“误解”；如果金圣叹是一个反抗政府的人，主张删掉招安的内容，也不能算“误解”。恰恰是一个忠于封建政府的人在—部忠于封建政府的书上做了这么一件蠢事，才使胡适恼怒。

列宁曾经指出，“所有—切压迫阶级，为了维持自己的统治，都需要有—两种社会职能，—一种是刽子手的职能，—另一种是牧师的职能。刽子手镇压被压迫者的反抗和暴动。牧师安慰被压迫者，……从而使他们忍受这种统治，使他们放弃革命行动，打消他们的革命热情，破坏他们的革命决心。”^⑦但是，并非反动统治阶级里的任何人在任何时候对这两种社会职能的认识和运用全都—致。金圣叹与《水浒》的作者就有分歧。—部《水浒》，着重描写了封建朝廷的两种“牧师”——捧着“丹诏”的宿元景和张叔夜，举着“杏黄旗”的宋江和卢俊义，如何通过不同的途径来“安慰”那些被“逼上梁山”的农民起义军，“使他们放弃革命行动，打消他们的革命热情，破坏他们的革命决心”的。金圣叹生活于农民起义的震天雷霆和反动统治者“招安”失败的消息不绝于耳的明末清初，捍卫封建朝廷的迫切心情使他特别强调刽子手的职能，而对牧师的职能方面取了怀疑的态度。他的主张，如鲁迅指出

的，是“梦想有一个‘嵇叔夜’来杀尽宋江们”^⑧。他于是删掉了《水浒》中“招安”的情节，把这个“杀尽”的“梦想”加了进去，作为结局。

两个结局，哪一个更符合反动统治阶级的利益？胡适赞赏未经金圣叹删改过的那一个：

“最末的部分，——平方腊班师之后——还有几段很感动人的文字；如写鲁智深之死，燕青之去，宋江之死，徽宗之梦，都还有点文学意味。”^⑨

方腊被“平”，梁山泊起义军死的死，走的走，——即两支起义军在拚耗中同归于尽，当然要比金圣叹仅仅扫荡一个梁山泊的设计更为毒辣，更为彻底，这是一；更重要的是，金圣叹的设计，虽然露骨地表达了反动统治者绞杀人民革命的无耻欲望，但正如鲁迅指出，“革命被头挂退的事是很少有的”^⑩，要使这个欲望得以实现，并非容易，因此连金圣叹也只能把它放在“梦”里来发泄，而梦想的力量总是虚弱的，不真实的。胡适欣赏的这个结局，则是用先“抚”后“剿”、“抚”此“剿”彼的阴险手法达到的，不仅反动的艺术效果远比一个梦想来得实在，而且还向反动统治者提供了两种社会职能交替使用的反革命策略。难怪胡适会从中获得“感动”，寻得“意味”。

投降派是反动统治者运用两种社会职能的重要工具。金圣叹“梦想有一个‘嵇叔夜’来杀尽宋江们”，表明他的怀疑“招安”，与不重视宋江一类投降派有关。胡适责怪他不仅自己恨宋江，而且以为《水浒》也在骂宋江，“他看错了，以为七十回本既不赞成招安，便是深恶宋江等一班人。……处处把施耐庵恭维宋江之处都解作痛骂宋江。这是他的根本大错。”^⑪胡适认为，金圣叹的这个“错”，与写《荡寇志》的俞仲华“是很相同的”。俞仲华也不同意朝廷去“招安”“强盗”，甚至不许宋江们投降，所以索性用他的笔把他们杀戮干净，使“天下后世深明盗贼忠义之辨，丝毫不容假借！”事情是那样耐人寻味，投降派宋江“假借”革命以尽忠皇帝，本来是用以欺骗起义军的，结果竟连反动营垒中头脑僵化的死硬派也给骗了。他们不认识自己方面派出的内奸，打了一场“误会仗”。为此胡适要反骂他们“迂腐”，并竭力把他们从宋江头上摘下来的那顶“忠义”帽子，重新戴到宋江头上去。他郑重引述《水浒》最后写宋江临死还“不愿坏了我忠义之名”，为怕李逵再反而把他毒死的情节，说这“可算是《忠义水浒传》后三十回中最精彩的部分”，是“一节最好”的“衰艳的文章”^⑫。而且对陈忱写的《水浒后传》中凡延续《水浒》投降主义的部分，尤其是皇帝称赞宋江为“忠义之士”的部分，也极赞“精彩”^⑬。总之，胡适躲躲闪闪地向自己营垒里的人们暗示，要透过宋江“假借”的伪装看到他的“忠义”本质，别把他“冤枉”了。胡适的这个暗示应引起我们的警觉。金、俞之辈只看到宋江的伪装而攻他，我们有的同志只看到宋江的伪装而捧他。因此，胡适批判金、俞的“认友为敌”，客观上也从反面批判了某些同志的认敌为友。

胡适把金圣叹和俞仲华归为一类，同时又把自己引为《水浒》作者的知音，一再宣扬唯我发掘出了作者的“本意”。看来，几百年来反动统治阶级的代表人物在文艺创作和文艺评论领域，对梁山泊农民起义的态度也无非是这么两派。金圣叹的删，俞仲华的续，都是

在与施耐庵、罗贯中派进行着一种不象争吵的争吵。胡适的考证，则是在二十世纪延续了这场争吵。但不能忘记：作为反动营垒内部讨论如何对付农民起义的一场论争，他们之间不乏共同语言。此中情形，很象《水浒》中宿元景、张叔夜与童贯、高俅两派在皇帝面前的争论。因此，胡适不仅不从根本上否定金圣叹和俞仲华，而且一想到他们的“迂腐”出之于对农民起义的刻骨仇恨，就十分能体谅了。他在《〈水浒传〉考证》的末尾说：

“不懂得明末流贼的大乱，便不懂得金圣叹的《水浒》见解何以这样迂腐”。

“不懂得嘉庆道光间的遍地匪乱，便不懂得俞仲华的《荡寇志》”。④

刚才分明还在嘲弄他们，一下子又翻成笑脸，用所谓“历史上的关系”来为他们辩解了。好象在分析历史原因，实际上完全是根据反动的政治标准和唯心史观玩弄着实用主义的魔术。金圣叹反招安，胡适说他是因为“亲见明末流贼伪降官兵，后复叛去，遂不可收拾”⑤，完全能理解；金批本虽然有点“迂腐”，但迂得妙，腐得奇，是“永不会磨灭的奇书”⑥；腰斩《水浒》转眼之间也成了一件“大胆”的美事；“他大胆地把七十回以下的文字全删了，又加上卢俊义的一个梦，很明显地教人知道强盗灭绝之后天下方得太平。”⑦实际上，金圣叹“教人知道”的这个反动逻辑，也是《水浒》的主旨，胡适的信条。他们分歧再大，斗争再烈，也不会改变“灭绝”革命以求地主阶级专政的“天下”“太平”这个共同理想。基于此，“招安”派与“征剿”派，投降主义的宣传和斩尽杀绝的主张，完全能、而且必然会统一起来。请看，胡适的耳目一触及燃烧于历史长途和现实土壤上的人民革命烈火，不是马上就《水浒》的著、删、续、考诸家拉成一家，“好一个强辩的金圣叹”⑧也变成“圣叹的辩才是无敌的”了吗？

胡适把金、俞围绕着《水浒》的一系列反动作为几乎都说成是一种时代需要。人们不禁要问：你胡适的那么多篇《水浒》考证，产生的时代原因又是什么？他自己曾这样教训读者：“莫把这些小说考证看作我教你们读小说的文字”⑨。好，那我们就看看这些“考证”的历史背景和现实政治作用吧。

胡适评《水浒》主要集中于两个时期：五四运动以后和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失败以后。拍天的巨潮开始低落，浓重的乌云压顶而来，这种时候，总“有人退伍，有人落荒，有人颓唐，有人叛变”。胡适就是从五四新文化运动中叛变出来的代表人物，而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失败后彻底投靠国民党反动派，则是他叛变的继续。他选中这样的时期写《水浒》评论，无非是两个目的：为反动派镇压革命献策，为自己投靠反动派辩护。

胡适写《〈水浒传〉考证》和《后考》的一九二〇——一九二一年，五四新文化运动内部在经历过“问题与主义”的论争和《新青年》发展去向的争夺战之后，已经明显地开始分化。两次斗争，都牵涉到如何看待现存制度和现存政府的问题。鲁迅曾明确地表示要坚持令

旧物彻底崩溃、让“官场总是头痛”^②的战斗方针。胡适从资产阶级右翼的立场出发，对自己曾投机参加过的运动竟发展成了如火如荼的人民革命，感到十分懊丧和害怕。因此一再想方设法地消蚀“五四”的斗争锋芒，告白自己对人民革命的仇视，一再向反动当局透露忏悔之心，投降之意。最后甚至公开以宋江自比，连写混迹五四运动这段经历的回忆录，也干脆称之为“逼上梁山”。既然如此，他在两篇《水浒》考证中若隐若现地强调了同情镇压、主张招安这两层意思，亦非偶然。有趣的是，他在文中还特地引了忠于朝廷的宋江反被朝廷所害的情节，论证《水浒》作者是把自称“不幸失身于罪人”而后“归顺”的宋江当作“功臣”来写的，并说这中间有“一种真的感慨”^③。其实，有这种“感慨”的，与其说是作者，不如说是胡适自己。他是多么希望政府当局不要因自己的一度“失身”而误了现代的“功臣”！

很巧，胡适写完此文的第二年，不仅北洋军阀政府没有误了他，连那个早被中国人民唾弃了的末代皇帝溥仪，也向他招手了。胡适一口一声“皇上”地在紫禁城里接受了多次召见，进行了不少次“非外人所能知也”的密谈。被“皇上”召见的次年，一九二三年，胡适又写了《〈水浒续集两种〉序》。人们发现，文中最长、最注目的一段引文，竟然就是《水浒后传》中燕青、杨林见道君皇帝的情节：皇帝当面褒扬“宋江忠义之士，多建大功”，要“重加褒封立庙，子孙世袭显爵”，而被皇帝称作“草野忠臣”的燕青则不断“伏地谢恩”，杨林出来后还深深地杆梅道：“我们平日在山寨，长骂他（皇帝）无道；今日见这般景象，连我也要落下眼泪来。”^④紧接着这段引文，胡适评论道：

这一大段文章，真当得“褒艳”二字的评语！古来多少历史小说，无此好文章，……古来写皇帝末路的，无此好文章^⑤！

行文出奇的强烈，感情出奇的激动，使人不能不怀疑，他在“草野忠臣”见皇帝的情节中，或许又发现了自己的影子，寻得了自己的足迹，找到了自己某种感情的寄托？

此后，胡适一直以“草野忠臣”自居，聊谈“自由”、“人权”于殿外，且又献媚取宠于朝廷。一九二九年六月，正当蒋介石在共产党人和革命人民的血泊中建立的反革命政权站住脚跟没多久，胡适又要评《水浒》了。这次写出的《百二十回本忠义水浒传序》，对金圣叹的评价越加升级，特别是对他“强盗灭绝之后天下方得太平”的反动思想更是大吹特吹。此外，重新强调《水浒》末尾写宋江效忠皇帝的部分“很感动人”^⑥。要了解这篇《水浒》评论的现实意义，可以注意一下此后不久发生的两件事情：一是蒋介石向我红色革命根据地发动了大规模的军事“围剿”，二是蒋介石电召胡适晋京谒见，“对大局有所垂询”。从此，人所周知，胡适逐渐从“草野忠臣”变为蒋家王朝的“朝廷命官”。

总之，镇压人民革命的建议一次次由《水浒》评论中发出，投靠反动朝廷的愿望一次次由《水浒》评论中表达。这一系列事件的巧合也许有偶然性。但正如恩格斯指出，“在表面上是偶然性在起作用的地方，这种偶然性始终是受内部的隐蔽着的规律支配的”^⑦。此中规律就是，现代的反动派必然要从古代反动派那里吸取扼杀革命的统治经验，现代的投降

派必然要从古代投降派那里继承卖身求荣的精神传统。

是规律就不会仅仅适用于一时一事。作为一个帝国主义一手培养出来的买办文人，胡适一生所作的各种投降主义宣传都要归结到投降帝国主义。因此，《水浒》评论也是他宣扬民族投降主义的一项间接工具。既然他鼓吹“尽忠天子”已不是真对“大宋皇帝”而言，那末，这个“天子”的身份也就可以不断更替：可以是北洋军阀，可以是溥仪，可以是蒋介石，当然，也可以是帝国主义头子。他在美国留学期间曾写过一首以“主君寿百岁”为结句的歌词，“主君”正是指美帝国主义。抗日战争前夕，胡适曾向日本帝国主义献出过“招安”整个中华民族的策略：“征服中国民族的心”^②，更是完全在尽忠日本天皇了。

换言之，《水浒》给了胡适多方面的受用，在阶级斗争中，他以宋江自比；在民族斗争中，他又希望自己和自己的主子蒋介石之流一起做个宋江，跪叩于外国主子的台阶之下。帝国主义者对此是很能心领神会的。一九四二年，正是抗日战争的关键时刻，一个日本帝国主义的“学者”在看了《水浒传》后自称“几度拍膝叫绝”。为什么？因为他从中看出，

“今日居于重庆之蒋介石的立场等，也颇似梁山泊末期宋江的境遇”^③。

说得再明白不过了。蒋介石与日本帝国主义的关系，也即是宋江与皇帝的关系。《水浒》不正接着胡适的心愿，很自然地引向民族投降主义上去了吗？难怪这个日本“学者”要特地交待：“水浒传正如胡适氏所言，是感情的思想的产物”。至于是什么“感情”，何种“思想”，不言自明。胡适曾想用“民族主义”的烟幕蒙住读者的眼睛，说宋江们躬行的投降主义至少有“勤王救国”的价值。可惜他自己及其主子蒋介石以无可掩饰的卖国生涯作了最好的回答。帝国主义者也从侧面提供了有力的证据。“民族斗争，说到底，是一个阶级斗争问题。”只有人民，才是民族利益的真正捍卫者。“勤王救国”与“勤王卖国”之间，则无深沟高垒。凡投降派，“大军一到，便受招安”，——反动朝廷的“大军”到了是如此，异邦别族的“大军”到了也必然是如此。

三

懂得了胡适考证和评论《水浒》的这系列政治目的，我们就能进一步理解他在《〈水浒传〉后考》一文的末尾说的这么一段话：

我为了这部《水浒传》，做了四五万字的考证，我知道一定有人笑我太不爱惜精神与时间了。但我自己觉得，我在《水浒传》上面花费了这点精力与回力是很值得的^④。

这是在故弄玄虚，自我卖弄。但却又清楚地表明了一个投降派对一部宣扬投降主义

的小说是何等的重视。阶级斗争的经验告诉我们，凡敌人重视的东西，我们决不能掉以轻心，而应该针锋相对，从中引出必要的教训。毛主席最近指出：“《水浒》这部书，好就好在投降。做反面教材，使人民都知道投降派。”为了更好地识别、批判和战胜投降派，我们也不妨学一学敌人，在评论《水浒》上舍得花费点“精力与日力”。

胡适早在几十年前就预感到了马列主义是投降主义的大敌。因此，在那马列主义开始传播的年代，他诱骗人们“自己虚心去看《水浒传》，不必怀着一些主观成见”^①。这里所谓“主观成见”者，显然是指他所厌恶的“主义”——正确的思想武器，革命的世界观。后来，他索性一语道破，声称他搞小说考证都是为怕读者“被马克思列宁斯大林牵着鼻子走”而提供一些“防身的本领”^②。在《水浒》考证上他“防”来“防”去，就是“防”马列主义对投降主义的批判。敌人的言行从反面显示了马列主义和投降主义的原则区别，大概也可以使那些总喜欢把投降主义解释成“历史唯物主义”的人们头脑清醒一些吧。真理和谬误水火不相容的客观事实说明，我们只有牢牢掌握马列主义的思想武器，才能在《水浒》的评论中，彻底批判修正主义和投降主义，把胡适之流曾拚命阻挡过的无产阶级革命进行到底。

——胡适的一大堆《水浒》考证和评论能起到这样的作用，那末，无产阶级将永远象感谢《水浒》这部反面教材一样感谢它们。

① 《胡适文存》710页。

② 《胡适文存》710页。

③ 《胡适文存》711页。

④ 《胡适文存》704页。

⑤ 《胡适文存三集》656页。

⑥ 《胡适文存》764页。

⑦ 《第二国际的破产》，《列宁选集》第二卷638页。

⑧ 《南腔北调集·谈金圣叹》，《鲁迅全集》第五卷121—122页。

⑨ 《胡适文存三集》654页。

⑩ 《三困集·争共大观》，《鲁迅全集》第四卷116—117页。

⑪ 《胡适文存》764页。

⑫ 《胡适文存》788—789页。

⑬ 《胡适文存二集》217页。

⑭ 《胡适文存》766—767页。

⑮ 《胡适文存》765页。

⑯ 《胡适文存》760页。

⑰ 《胡适文存三集》656页。

⑱ 《胡适文存》765页。

⑲ 《介绍我自己的思想》，《胡适文选》24页。

⑳ 鲁迅书信：1921年1月3日致胡适。

㉑ 《胡适文存》789页。

㉒ 《胡适文存二集》215—217页。

㉓ 《胡适文存二集》217页。

㉔ 《胡适文存三集》654页。

㉕ 《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243页。

㉖ 《日本人应该醒醒了》，《独立评论》42期。

㉗ 井坂辅证：《水浒传新考证》，满洲书籍配给株式会社。

㉘ 《胡适文存》800页。

㉙ 《胡适文存》762页。

㉚ 《介绍我自己的思想》，《胡适文选》24页。

歌颂什么, 反对什么?

——评《水浒》的投降主义本质

徐 绎 熙

《水浒》究竟是一部歌颂农民起义的史诗, 还是一部反对农民起义、宣扬投降主义的反面教材? 最近通过对毛主席指示的学习, 受到了一次深刻的思想和政治路线的教育, 想在这里讲一点自己的认识。

毛主席指出:“《水浒》只反贪官, 不反皇帝。屏晁盖于一百〇八人之外。”一针见血地指出了《水浒》宣扬投降主义的阶级本质。只反贪官, 不反皇帝, 这正是一条反对农民革命、鼓吹投降主义的反动政治路线。反对所谓的“贪官”或“奸臣”, 不正是为了忠于皇帝、忠于朝廷吗? 《水浒》之反贪官, 如同宋徽宗骂高俅等“败国奸臣, 坏寡人天下”一样, 立足点就在于要维护地主阶级的国家和一统天下。在《水浒》中, 皇帝、天、朝廷(国家)是三位一体的概念。皇帝并不是什么超阶级的单个人, 而是地主阶级和封建制度的总代表。朝廷就是国家机器, 是一个阶级压迫另一个阶级的机关。皇帝与朝廷又都是以“天”的名义来实行统治的。不反皇帝, 就意味着不反对地主阶级, 不反对地主阶级的反动专政和封建制度。宋江在受“招安”前是“替天行道”, 也就是帮助封建统治者以“天”的名义实行其反动统治之“道”。“招安”以后, 则打起了“顺天”、“护国”两面反革命大旗, 打方腊去了。从“替天行道”到“顺天护国”, 这也正是《水浒》所鼓吹的投降主义的政治纲领。不反皇帝, 那就必然要倒过来反对一切敢于“背反”皇帝和朝廷、造地主阶级反动统治的农民的革命。有个封建文人叫夫黍余人的, 说《水浒》能“化血气为德性”, 起到“盗弭”的作用。“盗弭”者, 制止和消灭农民起义也。这倒是一语道破了《水浒》这部小说的奥妙所在。

封建社会的基本矛盾是地主阶级和农民阶级的矛盾。以农民起义为题材的《水浒》有没有反映这一基本矛盾呢? 没有。它写的是以宋江为代表的“忠义义士”同以高俅为代表的“贪官”、“奸臣”的矛盾, 也就是地主阶级内部这一派同那一带的矛盾。《水浒》正是用这样的矛盾抹煞和掩盖了阶级矛盾。《水浒》竭力鼓吹这样一种观点, 地主同农民, 在皇帝、朝廷、天以至“贪官”、“忠臣”的问题上, 是没有任何矛盾的, 是完全一致的。皇帝是两个阶级共同拥戴的。换句话说, 农民同地主一样, 拥护封建制度, 拥护封建统治, 拥护地主阶级的反动专政, 而地主包括皇帝在内, 同农民一样, 也是反对贪官和奸臣的。那末还有没有地

主阶级和农民阶级的对立和斗争呢？没有了。农民还要不要再进行反对地主阶级的反动统治的革命斗争呢？不需要了。所以“聚义”必须代之以“忠义”，而晁盖的坚持农民起义的路线也必须用宋江的投降主义路线去加以“修正”。

正是从只反贪官、不反皇帝这条投降主义的反动政治路线出发，《水浒》对革命派和投降派、对地主官僚和农民阶级采取了截然相反的态度。请看书里的三种鲜明的对比。

一种对比是：《水浒》对待方腊和对待宋江的不同态度。《水浒》写了四支农民起义军。方腊、王庆、田虎这三支农民义军，都是不“替天行道”的，不受“招安”的，他们敢于造宋皇帝的反，同大宋王朝唱对台戏。如果《水浒》真是歌颂农民起义的话，那首先应该歌颂他们才对！尤其是方腊这支义军，其规模和影响都远远超过宋江那支队伍。可是《水浒》对他们采取的恰恰是彻底否定和深恶痛绝的态度。谁给抓住了，都是千刀万剐。对方腊本人，更是竭力加以丑化。可对宋江这个投降派，则是千方百计加以美化；又是“呼保义”，又是“及时雨”；上应天星，下合童谣；天上有九天玄女保驾，人间有儒释道三教护法。朝廷之上，有天子眷顾，“忠臣”保举，四海之内，则英雄豪杰，闻名即拜。方腊在书中受尽唾骂，死则受剐三日示众，惨毒已极；而宋江生前鼎食，死后封神，受尽荣耀。《水浒》“有诗为证”：“宋江重赏升官日，方腊当刑受剐时。善恶到头终有报，只争来早与来迟。”对比是何等强烈！爱憎是何等分明！《水浒》把宋江树立为“善”的典型，把方腊树立为“恶”的典型，分明是要人人都学宋江，不学方腊，要人们都象宋江那样生就一副奴颜媚骨，向封建统治者屈膝投降，并为之效忠卖命；而不要象方腊那样做反抗地主阶级的反动统治的造反者、革命者。如果真能这样，岂不是就可以使农民起义消弭于无形之中了吗？

另一种对比是：《水浒》对待晁盖和对待宋江的不同态度。《水浒》对待梁山泊这支义军，也并不一律歌颂，而是有褒有贬。梁山义军中有革命派，有投降派。而《水浒》则是肯定前者而歌颂后者。晁盖实际上就是梁山义军中的方腊。晁盖七星聚义，智取生辰纲，长了革命人民的志气，灭了地主、官僚的威风，最后反上梁山，清除了王伦的关门主义路线，扩大起义武装，巩固了梁山泊根据地。对这些行动，革命派认为好得很，而宋江则认为这是逆天大罪，法度难容，要灭九族。宋江的看法，就是《水浒》作者的看法。否定晁盖，正是为了肯定宋江。《水浒》把晁盖同宋江作了个比较：“在晁盖悉托胆称王，归天及早，惟宋江肯呼群保义，把寨为头。”晁盖敢于托胆称王，“兀自要和大宋皇帝做个对头”，这在作者看来当然是可怕得很，所以一定要让他及早死在地主武装的弓箭之下。而宋江不但恪守“忠义”，一意盼望“招安”，而且善于用“义”的锁链，把农民义军送进投降主义的死胡同。所以惟有宋江在梁山泊“把寨为头”，才能使作者称心，封建统治者放心。

有人或许会问，宋江不是私放了晁盖吗？不是把晁盖看作“心腹兄弟”吗？其实，私放晁盖不过是《水浒》为了美化宋江而加上的一笔油彩。这一情节把宋江打扮成梁山好汉的“救命恩人”，从而给宋江上山伏下一笔政治资本，为他将来篡夺梁山义军的领导权铺平道路。《水浒》处处用晁盖为宋江做铺垫，即使这样，作者还唯恐人们把宋江同晁盖等置齐观，所以让宋江一再申言他对晁盖的造反行为是反对的，他根本不愿同晁盖他们沾边，“上逆天理，下违父教，做了不忠不孝的人”，竭力与之划清界限。如果不是杀了阎婆惜，又碰

上个黄蜂刺，他是宁死不肯上梁山的。所谓“心腹兄弟”，原来是两股道上跑的车，走的根本不是一条道。

第三种对比是，《水浒》对待李逵同对待卢俊义的不同态度。我们之所以要把《水浒》对这两个人的态度作个对比，是因为一个是出身雇农的真正的劳动人民，而一个是豪绅地主和太富商。李逵无疑是梁山义军中最富于革命性的农民代表，《水浒》却把他丑化成凶神恶煞，以杀人为乐。见了百姓也是不分青红皂白地“排头儿砍将去”，甚至连来投梁山入伙的韩伯龙也被他杀了。又因为李逵是个贫苦农民，《水浒》就把他丑化成一个蠢汉，渲染他的粗卤和莽撞。甚至写他杀了人还吃人肉（杀了李鬼，吃李鬼的肉）。《水浒》写宋江、卢俊义等人，笔墨是何等庄重；而写李逵，用的完全是嘲弄的笔墨，故意引人发噱，连李逵下山接老母也嘲弄了一番，让老母给老虎吃了，事后宋江等人听了还“大笑”！我们透过《水浒》的丑化，分析李逵这个形象，不难看出李逵是当时真正的革命农民的代表，应该充分肯定他的反投降的革命立场，但是这位农民英雄在《水浒》中显然是被歪曲了的。请看《水浒》给李逵的一首诗是：“家住沂州翠岭东，杀人放火恣行凶，不搽煤墨浑身黑，似着朱砂两眼红。”从外貌到他的反抗性格，全都加以丑化。

与之相反，《水浒》对卢俊义这个豪绅地主的描写，却使用了种种美丽动听的语言来加以美化。卢俊义对农民起义怀着刻骨的仇恨，用他自己的话来说是“一心只要捉强人，那时方表男儿志”。他的“平生之愿”就是要把“贼首”“解上京师，请功受赏”。这样一个反动家伙，却被称颂为“河北三绝”，“北京大名府第一等长者”，连绰号也特别雅——“玉麒麟”（麒麟在封建社会是高贵的象征，是剥削阶级所谓的“祥瑞”）。《水浒》写卢的外表是“威风凛凛，仪表如天神”，写卢的性格是“忠肝贯日，壮气凌云”。《水浒》还特意通过宋江之口，摆了卢的三条好处，什么“有贵人之相”啦，什么“生于富贵之家，长有豪杰之誉”啦，什么“为敌万人，博古通今，天下谁不望风而服”啦，真正到了十全十美，无以复加的地步。宋江这么说，以及他那“让位”的一番做作，一方面是要抬高卢的地位，一方面也是当着众人的面立下谁有资格当梁山泊的头儿的标准。如果你不是“生于富贵之家”，长有“贵人之相”等等，那就靠边站吧。合乎这个标准的，除了他宋江和卢俊义，还能是谁？

歌颂什么，反对什么，这是艺术创作的根本问题。在这个问题上，表现着一部艺术作品的阶级本质和政治倾向。从以上三个方面的对比中，就足以表明《水浒》歌颂的是地主豪绅，是混进农民革命队伍搞修正主义的投降派、反革命派；而反对的是农民革命和一切坚持起义、反对投降的革命派。这就说明它不是一部歌颂农民起义的小说，而恰恰是一部反对农民起义的小说。

有一种说法，认为《水浒》虽然写了宋江受“招安”，但却让宋江被毒死了，这说明《水浒》是批判和否定了宋江的投降的。这种说法其实是没有道理的。《水浒》之歌颂宋江，恰恰就是要歌颂他的“忠义”和投降，所以连大涤余人也说：“《水浒》惟以招安为心，而名始传，其人忠义也。”“惟以招安为心”，所以才有九天玄女的“法旨”和天书，才要把晁盖的聚义厅改为忠义堂，打起“替天行道”的旗号；才有七十一回“大聚义”时宋江领头的宣誓，以及宋江和燕青等人的东京之行……对这一切，《水浒》都是予以肯定和赞颂的。八十二回

宿元景奉诏招安,《水浒》马上用一首诗来欢呼封建统治者“怀柔”政策的胜利,“一封恩诏出明光,伫看梁山尽束装。知道怀柔胜征伐,悔教赤子受损伤。”待到宋江投降以后,《水浒》更是大肆渲染宋江受“招安”的场面、过程和“朝京面圣”的“盛况”。宋江军马进京,宋徽宗率领百官亲临检阅,“喜动龙颜,心中大悦”,赞道:“真英雄也!”作者还硬拉上“东京百姓军民,扶老挈幼,迫路观看,如睹天神。”这能说是在批判“招安”吗?

至于宋江之死,书中写得很清楚,是因为高俅等看到天子“重礼厚赐”宋江,教他“上马管军,下马管民”,惟恐被宋江夺去恩宠和权力,所以才设计毒死他。这本来只是狗咬狗的斗争的延续。《水浒》对高俅等的计策,用诗评论道:“自古权奸害善良,不容忠义立家邦。”批评的是“权奸”,歌颂的仍然是宋江的“忠义”。《水浒》写宋江吃了毒酒后,对天子、朝廷依然毫无怨言,一心想的依然是“忠心不负朝廷”,临死前还设计毒死李逵,为封建统治者除了这股危险的“黑旋风”,“尽忠报国”,可谓至矣!这样渲染显然是作者为歌颂宋江“为主全忠仗义”而最后添上的浓浓的一笔胭脂,至此,作者心目中的理想人物,才算是最后塑造完成了。这又怎么能谈得上是对宋江投降的否定呢?

《水浒》作者,经历了元末农民大起义,恐惧农民起义的巨大威力,企图通过《水浒》来传播地主阶级分子混进农民革命队伍搞修正主义、投降主义的反革命经验。他之希望有宋江这样的“及时雨”,正如金圣叹之希望有个“嵇叔夜”,《荡寇志》的作者俞仲华之希望有个“陈希真”,本质上是一回事。不同的,只是《水浒》认为“怀柔胜征伐”,而金、俞却认为“征伐”胜“怀柔”而已。“怀柔”和“征伐”,本来是反动统治阶级交替使用的反革命两手政策,什么时候鼓吹“怀柔”,什么时候鼓吹“征伐”,则是由具体的阶级斗争的条件所决定的。《水浒》作者生活于元末明初,当时明王朝刚刚建立,所以重在“怀柔”,希望有宋江这类投降派来帮助明朝统治者消灭农民起义。金圣叹生活于明代末年,当时,以李自成为代表的农民起义军席卷全国,明朝统治者“招安”、“征剿”的反革命两手都已失败,明王朝的覆灭已势不可免。在这种背景下,站在地主阶级反动立场上的金圣叹只能梦想有一个“神人”嵇叔夜出来把农民起义斩尽杀绝。俞仲华生活于清代后期,农民起义也已遍地掀起,他死时离太平天国革命只有两年,所以他也希望天上降下一个陈希真和陈丽卿来,帮助清朝统治者扑灭农民起义的烈火。但是不论他们在“怀柔”还是“征伐”的问题上主张有何不同,在维护封建统治、消灭农民起义这个目标上,却是完全一致的。实际上,《水浒》里“征剿”方腊时的宋江,也就是一个陈希真;或者说陈希真,也就是另一个宋江。不过,一个是公开的反动派,一个则在一段时间里曾经是不公开的、隐藏在农民起义军内部的反动派而已。

《水浒》这部反面教材,有其一定的欺骗性,只有坚持马克思主义的阶级观点,才能透过假象认清本质。有比较才能鉴别。看看《水浒》歌颂什么,反对什么,就是一种比较。对我们文学评论工作者来说,同样有一个歌颂什么、反对什么的问题。我们一定要努力通过这次《水浒》的评论和讨论,认清《水浒》宣扬投降主义的反动本质,认识什么是投降派,在斗争中逐步提高识别马克思主义和修正主义、正确路线和错误路线的能力,提高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的觉悟和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水平,从而能更好地为执行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为巩固无产阶级专政而战斗。

试论吴用

章智明 完绍元

吴用的一生，经历了梁山泊农民起义从兴起、发展到失败的全过程，并且由于他一直担任梁山军师的要职而始终被卷入了斗争的漩涡。因此，吴用在《水浒》中成了引人注目的人物。

吴用出身于知识分子。但从他“戴一顶桶子样抹眉梁头巾，穿一领皂沿边麻布宽衫，腰系一条茶褐鞞带”的打扮，以及与贫苦渔民三阮兄弟的亲密关系来看，他的经济地位和政治地位都是比较低下的。在农民革命风起云涌的年代，每一个人都要根据自己的阶级立场表明一定的态度。吴用就以“智取生辰纲”的革命行动，表示了他反对封建统治阶级、赞同农民造反的鲜明立场。当刘唐提供了梁中书搜刮十万贯财礼要送到东京为丈人宰相蔡京庆贺生辰的情报以后，吴用当即表示支持晁盖夺取这“一套不义之财”，并主动串连了阮小二、阮小五、阮小七积极参加，制订了“力则力取，智则智取”的战斗方案，终于在黄泥冈打响了这漂亮的一仗。这是吴用早期革命活动中最光彩的篇章。

紧接着，吴用上了梁山。他来这里既然是投奔农民革命，就必然要与不准别人革命的白衣秀士王伦发生尖锐的矛盾。吴用根本看不起满脑子儒家思想的王伦，他支持林冲的火并行动，为农民革命的发展搬掉了一块绊脚石，从而确立了晁盖在梁山的领导地位。以后，吴用忠实地贯彻执行晁盖坚持农民起义的革命路线，协同晁盖在梁山屯粮、造船、打军器、操练军马，杀败进剿官军，巩固了农民革命根据地。在晁盖路线指引下，吴用精心策划和直接参加的一系列战斗，如反江州，攻高唐，破青州，闹华山，都沉重打击了封建统治阶级及其爪牙，取得了辉煌的胜利，为实现“要和天宋皇帝做个对头”的宏伟目标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晁盖在梁山事业逐步兴旺的时候不幸中箭牺牲，是一个沉痛的损失。在这个关键时刻，吴用能不能继续坚持晁盖的正确路线，并且同篡改晁盖路线的投降派宋江进行有力的斗争，就成了他面临的一场严峻考验。

吴用对宋江的认识也是有一个过程的。他们本是郓城县同乡，但由于一个是社会地位低下的乡村教师，一个是封建衙门的官僚，“虽是住居咫尺，无缘难得见面”。吴用同宋江的第一次会面，是在晁盖庄上。当时，吴用被宋江冒着风险到东溪村通风报信救晁盖的“义气”行为所迷惑，认为“若非此人来报，都打在网里”，几乎把宋江当作了救命恩人，只是一味地感激。宋江在被刺配江州的路上，用一大堆忠孝的说教拒绝梁山好汉刘唐等人救

他上山，甚至唯恐“擅动了国家法度”而不让花荣为他解除脖子上的枷锁。这时，吴用凭着自己的政治敏感，看出了宋江无心上山，就断然采取了与刘唐、花荣等人相反的态度，将计就计地对宋江说：“我知兄长的意了，这个容易，只不留兄长在山寨便了”，轻描淡写几句话，巧妙地把这个封建王朝的忠臣孝子打发出了革命根据地。后来，宋江为了“权借水泊里随时避难”混进了梁山，企图窜掇农民起义军一起投降的面目逐步露了破绽，吴用对他的防范也就步步加紧。凡宋江独自带兵外出，他总是紧紧跟随而至，一定要亲自参与作战计划的制定和战斗的指挥，使宋江受到了一定的约束。晁盖临死之前，并没有明确自己地位的继承人，这反映了他对宋江已存有一定的戒心。对于这一点，吴用是心领神会的。所以在晁盖一死而梁山又不可一日无主的情况下，他并没有忘记晁盖的遗嘱，只是劝宋江暂充梁山第一把手。他当着大家的面说，“哥哥权且尊临此位坐一坐，待日后别有计较。”当时宋江继位已是大局既定，吴用能讲这一番话，不能不说是十分可贵的。说的虽然委婉，用意却是很深：宋江一旦不称职，就可加以撤换。吴用为宋江坐第一把交椅留了一个余地，这无疑是对宋江搞投降主义的一个警告，同时也提醒了梁山好汉们对此要有所警惕。

自从宋江在菊花会上公开抛出了“望天玉降诏，早招安”的投降纲领以后，梁山内部招安反招安的斗争达到了高潮。吴用不肯投降，同李逵、阮小二、阮小五、阮小七等人站到一边与宋江进行了必要的斗争。宋江急急乎要巴结李师师走后门，借口进东京去观灯，此事首先引起了吴用的怀疑，他明确指出“不可”，坚决进行劝阻。宋徽宗派陈太尉前来“招安水泊军”，宋江大喜，准备放下武器投降。吴用挺身而出批驳了宋江“受了招安，得为国家臣子”的投降主义理论，主张丢掉幻想，武力回击。他说：“等这厮引将大军来到，教他着些毒手，杀得他人亡马倒，梦里也怕”，这是何等的气概啊！待到阮小七偷换御酒，李逵怒扯诏书，挫败招安阴谋以后，宋江为此而恼羞成怒，吴用就再一次警告宋江，“休执迷招安”。紧接着，吴用亲自部署战斗，团结梁山好汉一连打了好多次胜仗，粉碎了童贯、高俅亲领几十万反动军队的“围剿”。当朝廷派人第二次招安时，吴用依靠李逵、三阮等革命派作好了战斗准备，到时向花荣使了个眼色，一箭射中了宣读诏书的天使的面门，又一次挫败了招安阴谋。

宋江里通朝廷受招安以后，吴用的革命热情受到了严重的窒息。他虽然满怀对晁盖路线的深厚感情，同宋江继续在一定程度上作了斗争，但这已是一浪低于一浪了。宋江一接受招安，便迫不及待地要“起送各家老小还乡”，拆毁山寨。吴用不同意，要求“且留众宝眷在此山寨”，想借此保存梁山事业复兴的一线希望，流露出了他对这块自己亲手参加创建的革命根据地的恋慕感情。在征讨玉庆班师回京途中，三阮兄弟等水军头领找吴用商量重上梁山大计的时候，他又为这些渔民兄弟的革命热情所感染和鼓动，向宋江暗示了再举起义大旗上梁山的思想愿望。可恨的是，这足以挽回农民革命事业的主张却被宋江的一套“忠义”理论压了下去。这件事，在《水浒》中就成了吴用反招安、反投降的尾声，从此便再也“不敢多言”了。

从主动串连三阮兄弟参加智取生辰纲的斗争，到在受招安后不能坚决支持三阮兄弟重上梁山举义旗，吴用走完了一段曲折的革命道路。以后，吴用迫不得已跟着宋江去打方

腊；但血的教训并没有使他清醒过来，他摆脱不了宋江的反动的“义”的羁绊。宋江要怎样，他也只好怎样。征方腊回来后，梁山好汉们死的死，散的散，这一切对吴用的刺激是很大的。他充满了孤独和抑郁的情绪，“只带了随行安童，去武胜军到任”。在那里，他再也看不到李逵般猛烈的革命旋风，再也听不到三阮兄弟般激昂的反抗呼声，因此“自到任之后，常常心中不乐”。出路在何方？吴用茫茫然，傍徨着，苦闷着，终于想到了绝路，为宋江的死而死了。吴用惨死在宋江墓前的悲剧，为这位出身于知识分子的梁山革命家作了结论：只要知识分子所特有的软弱性、动摇性没有在革命实践中得到彻底的克服，最终免不了要走向妥协。

在最初以破产农民、渔民和手工业者为主力军的梁山革命队伍中，知识分子并不只吴用一个，象王伦、萧让、蒋敬等人都是。由于各人所依附的阶级不同，参加革命的动机不同，因而最终所走的道路也是很不相同的。正如列宁所说的那样：“革命将第一次给各个阶级以真正的政治洗礼。这些阶级将以一定的政治面貌在革命中出现，它们不仅会在自己的思想家的纲领和策略口号中，而且会在群众的公开的政治行动中显示出自己。”梁山上各自代表不同阶级利益的知识分子在革命运动中的表现和归宿，就深刻地说明了这一点。那个最早开辟山寨的王伦，本是个落第举子，因为在地主阶级内部的角逐中受了“鸟气”才走上梁山。但他上山并不是为了革命，仅仅是为了通过打家劫舍捞到他在“考场”中没有捞到的功名富贵。他这个人，参加了革命怕革命，心地狭窄，容不得人，把许许多多要革命的人们拒之于梁山大门之外，严重阻碍了农民革命根据地的巩固和发展。王伦这样的投机革命、反对革命的没落阶级的文人，最终遭到林冲火并，落得个身首分离的可耻下场，是罪有应得。同是落第举子的蒋敬，与王伦就很不一样。他“科举不第，弃文就武”，怀着对封建社会现实的不满走上了叛逆的道路。在从黄门山落草揭竿到上梁山泊入伙聚义的长期斗争中，他逐步得到了改造，革命觉悟逐步有了提高，即使宋江路线在梁山完全占了统治地位，他也决不肯同流合污。最后，在宋江踏着农民的血泊接受了宋王朝封官授职的情况下，蒋敬却毅然辞去朝廷的授封，“回潭州为民”，不愿意追随宋江为封建统治阶级卖命。这种斗争方式虽不足为训，却也表现了他对宋江投降的不满和抗议。与蒋敬不同，萧让是热衷于跟着宋江投降主义路线跑的。萧让本是“济州城里一个秀才”，因写得一手好字被吴用使计赚上山来。但萧让上山并不意味着给梁山农民革命增添一份力量，反而成了投降派宋江的一个忠实走卒。这个不肯转变地主阶级立场的反动知识分子，由于得到了宋江的赏识和重用，窃据了“掌管行文走檄调兵遣将”的要职。在宋江搞的一系列投降活动中，萧让一直是跑在头里，忙得不亦乐乎，充当了极可耻的角色。招安后他在蔡太师府中受职，继续为封建统治阶级作鹰犬，终究是个奴才。

在梁山的知识分子中间，吴用是比较杰出的一个。由于他接近下层劳动人民，革命历史悠久，威望较高，地位也较高，在革命中所发挥出来的作用也比较大。列宁说：知识分子“一旦接近了人民，就会在这个斗争中成为一支巨大的力量。它自己虽然软弱无力，但是能够给小资产者和农民的极广大阶层提供他们恰恰缺少的东西，知识、纲领、领导、组织。”吴用投身于农民革命以后，就起到了这种作用。从某种意义上说，吴用称得上是农民革命

的“智多星”。他的革命性虽然远远比不上苦大仇深的李逵，但他比较地注重斗争策略，比较地善于做敌人营垒的分化瓦解工作，这却是为李逵所不及的。三打祝家庄就是极好的一个例证。宋江为了捞取政治资本，自己带兵攻打祝家庄，“两次都因情况不明，方法不对，打了败仗。”后来晁盖派了吴用下山，纠正了宋江的错误作法，才扭转局势。正如毛主席所指出的，在二打祝家庄以后改变了方法，“从调查情形入手，于是熟悉了盘陀路，拆散了李家庄、扈家庄和祝家庄的联盟，并且布置了藏在敌人营盘里的伏兵，用了和外国故事中所说木马计相象的方法，第三次就打了胜仗”。三打祝家庄的前两次失败，是由于宋江的指导思想不对，方法也不对，第三次成功则是吴用出色地策划指挥的结果。吴用忠实于晁盖的坚持斗争的政治路线，在军事指挥上表现了出色的才能，赢得了一系列的胜利。这个功绩是不可磨灭的。

历史的现象是复杂的，在相同事件的背后蕴藏着极不相同的动机。吴用曾经使用计谋甚至亲自出马把李应、朱全、卢俊义等人赚上梁山，这一点就与宋江的投降行为大不相同。吴用为的是分化瓦解敌人营垒，为革命队伍团结各种不同的力量，巩固和扩大革命阵营。而宋江收降关胜、呼延灼、秦明，勾结卢俊义，为的是招降纳叛，扩大投降班底，为瓦解革命阵营、投降朝廷作组织上的准备。以后，宋江要尊推卢俊义坐梁山第一把交椅，就完全违背了吴用的当初愿望，因而遭到了吴用一再巧妙而坚决的抵制。再如对关胜，吴用和宋江的态度也截然相反。宋江称关胜“义气凛然，始终如一”，对派他出击大名府是一百个放心；吴用则十分怀疑，有所警惕，决定“再差良将，随后监督”。对卢俊义、关胜的不同态度，说明吴用和宋江之间，在依靠谁的问题上是有过斗争的。因此，不应当把吴用的分化瓦解敌人同宋江的招降纳叛混为一谈。当然，吴用对宋江组织投降班子的认识有一个过程，在开始时缺乏足够的警惕，而一旦大势所趋，木已成舟，他没有也不可能为挽狂澜。比如，宋江通过“英雄排座次”，一再贬低、压制梁山革命派将领，一再提拔重用梁山投降派将领，在当时的情况下，从威望和地位来说，唯一有可能起来抵制的应当是吴用，但吴用并没有这样做，反而一再迁就了宋江。这就是吴用的软弱性的又一种表现了。

吴用一生的经历和结局，生动地证明了“思想上政治上的路线正确与否是决定一切的”这个伟大真理。在晁盖坚持农民起义的正确路线下，吴用运筹帷幄，布阵排兵，在革命斗争中充分发挥杰出的政治、军事、组织才能。相反，在宋江投降主义路线统治下，这个曾经充满旺盛革命热情的优秀人物，最终竟自缢身死，成了反动路线的牺牲品。吴用在正确路线指引下是一步一步前进的，而在反动路线统治下则是不由自主地一步一步后退的。他的结局从反面告诉了人们一个道理：知识分子只有和革命共同着生命才能有所作为，这个教训是深刻的。

评宋江“上山”

石川

历史上任何一次伟大的革命运动，犹如汹涌澎湃的潮流，难免鱼龙混杂、泥沙俱下。《水浒》中的宋江就是农民革命潮流挟带而来的泥沙。他“身居水浒之中，心在朝廷之上”，在篡夺了梁山起义军的领导权后，推行了一条投降主义路线，以“上山”图“官爵升迁”。

宋江的这条投降主义路线，早在他“上山”以前，就埋下了深刻的阶级根源和思想根源。认清宋江“上山”的来龙去脉，对于认识宋江推行投降主义路线的必然性及其本质，是很有意义的。虽然《水浒》的作者写宋江“上山”的来龙去脉，目的是为了美化宋江，为他“生当庙食死封侯，男子平生志已酬”的“英雄结局”作伏笔。但如果我们运用阶级分析的方法，完全可以拨开重重迷雾，揭示出宋江“上山”的真实本质。

毛主席指出：“地主阶级对于农民的残酷的经济剥削和政治压迫，迫使农民多次地举行起义，以反抗地主阶级的统治。”这是农民起义的根本原因和普遍规律。“智取生辰纲”就是生动的一例。阮氏三兄弟所以要上梁山，“不怕天，不怕地，不怕官司”地大干一场，就是因为受了残酷的经济剥削和政治压迫，“如今那官司，一处处动掸便害百姓。但一声下乡来，倒先把好百姓家养的猪、羊、鸡、鹅尽都吃了，又要盘缠打发他。”经济剥削总是以政治压迫为后盾的。“官司”下乡，敢于恣意妄为，搜刮一空，就是因为有地主阶级的国家机器在支持着他们。正因如此，当阮氏兄弟听说梁中书把民脂民膏十万贯金珠宝贝与他丈人庆生辰，就不由得“搔着我痒处”，决心上梁山聚义去。而晁盖，正是顺应了农民阶级的这种革命要求，抛弃了地主阶级的“私意”，亦即阶级偏见，因而能取得贫苦农民的拥护，并在起义中执行了一条正确的路线，“劫了生辰纲，杀了做公的，伤了衙观察，又损害了许多官军人马，又把黄安活捉上山”，“如此大弄”起来，使得梁山泊“好生兴旺”。

宋江是什么人？他为什么要“上山”？宋江地主家庭出身，原是郓城县的押司。虽无“堂上一呼，阶下百诺”的威风，也无“富埒王室”的万贯家财，但靠着“刀笔精通，吏道纯熟”的手段，也争得一个好家业，“端的是挥霍，视金如土”。姑且不论“公人见钱，如蝇子见血”，他的“金”是从哪里来的，也不论他仗着这样来的“金”怎样地买得“仗义疏财”、“乐善好施”的美名，至少说明他在经济上决无阮氏兄弟的苦惱。他身为吏员，是国家统治机器中的一枚螺丝钉，即使杀了人，公人都是和他好的，“不肯做冤家”，“知县又是要出脱宋江的”，照样能逃之夭夭。总之，宋江“上山”，不是因为受了残酷的经济剥削和政治压迫。

宋江“上山”的直接起因，是杀了阎婆惜。阎婆惜原是“风尘娼妓”，因阎婆感激宋江而

把女儿送给了他。此婆娘却与宋江的同房押司张文远打得火热。宋江撞上门去，受到婆惜一夜冷遇，“心里气闷”，加上婆惜抓住梁山好汉给宋江的书信大肆要挟，“一肚皮气正没出处”，就一刀结束了她的性命。有人以为宋江杀人是因为“仗义”“私放晁天王”的缘故。其实这只是作者为了美化宋江而在他脸上涂抹的一层油彩。如果宋江真是那么英雄，不惹烟花，纵然私放了十个晁天王，也不会闹出这样的风流案子来。还是李逵看得分明：“你原正是酒色之徒。杀了阎婆惜便是小样。去东京养李师师便是大样。”一语道破了宋江的本相。

宋江既是梁山泊的“恩主”，而梁山泊又是“和大宋皇帝做个对头”的，按理说，他为了逃避官司应当主动上梁山。然而宋江并没有因此“上山”。他给自己安排的安身之处有三个：“一是沧州横海郡小旋风柴进庄上。三乃是青州清风寨小李广花荣处。三者是白虎山孔太公庄上。”柴大官人乃是“大周皇帝嫡派子孙”，家藏“先朝太祖誓书铁券”，是个谁也碰不得的“帝子神孙”；小李广花荣是个武知寨，“朝廷命官”；孔太公是独霸一方的地主豪强，均属“富豪将吏”。他们都是农民阶级的死对头。宋江不投奔农民起义军而投奔这些人，这叫“同声相应，同气相求”，反映了地主阶级的阶级本性。而投奔柴进等人避难的最终目的，又是等待“宽恩大赦，那时回来父子相见，安居乐业”。等待“大赦”与“上山”以后等待“招安”，一脉相承，前后呼应。只有程度上的差别，并无原则上的差异。水有源，树有根，宋江投降主义路线的思想根源，就在这里露出了它的端倪。

对地主阶级的信赖和对农民起义军的蔑视，这原是一种立场的两个侧面。他对“晁盖倒去落了草，直如此大弄”很不以为然，认为是“灭九族的勾当”，远之唯恐不及，怎么还会去“入伙”呢？所以当他听说武松要上二龙山入伙，就谆谆告诫武松：“如得朝廷招安，你便可擢擢鲁智深、杨志投降了。日后但去边上，一刀一枪，博得个封妻荫子，久后青史上留一个好名，也不枉了为人一世。”这寥寥数语，言简意赅，说得很透彻：第一，他反对的是晁盖那样“大弄”的落草，败官兵，杀将吏，“于法度上却饶不得”；第二，他不反对武松入伙，是因为不仅要武松等待“朝廷招安”，而且要武松“擢擢”别人投降朝廷。在他看来，“若要官，杀人放火受招安”，这条路于武松是相宜的，因为“你如此英雄，决定做得大官”。这几句话可以说是日后宋江行动的“总纲”，是他“上山”以后苦心孤诣追求的目标，也是他推行投降主义路线的反革命自供。你看，他坐上了梁山起义军的第一把交椅以后，不是发表了“愿天王降诏，早招安，心方足”的投降宣言，一而再，再而三地期待着“朝廷招安”么？他不是不仅自己投降，而且要尽阴谋诡计，软硬兼施、恩威并用，“擢擢”整个梁山农民起义队伍投降朝廷了么？他不是“一刀一枪”，镇压了方腊起义军，并间接杀害了梁山上的众弟兄，“博得个封妻荫子”，在农民阶级的尸骨堆上，筑起了他的“楚州安抚使，兼兵马都总管”的官署么？那末，当时宋江自己为什么不像武松一样去落草呢？不上梁山，就上二龙山嘛！他自白道：“我自百无一能，虽有忠心，不能得进步。”这是无可奈何的自供状。“百无一能”，“忠心”售于谁家呢？既然落了草日后也做不得大官，自然不必铤而走险，担惊受怕。这倒把封建统治阶级的忠实奴才的那种想做大官而不得、想向上爬而不能的卑劣、矛盾的心理，维妙维肖地刻划了出来。

其间宋江也不是没有“上山”的机会。在清风寨花荣处闹出事来以后，曾“一时乘兴”，想投奔梁山泊。所谓“乘兴”，绝非自觉地深感有“上山”的必要，只不过是“随大流”而已。它是经不起任何风浪考验的。果然，一封家书，宋江就撇下众兄弟，急不及待地回到他的地主庄园去了。宋江又名“孝义黑三郎”，“于家大孝”，“忠孝”二字时刻不敢有忘。他父亲的一番“不忠不孝”的说教，顿使他大彻大悟，连“乘兴”的念头也都一笔勾销，坚定了他的做地主阶级的忠实奴才的信念。在地主阶级的道德观念里，“忠”于皇帝与“孝”于父亲是完全一致的。“忠”以“孝”为基础，“孝”以“忠”为前提。“于家大孝”，就必定“于国大忠”；国者，大宋天子、赵家社稷之谓也。“于国大忠”，又怎么可以“上山”落草，象晁盖他们那样“和大宋皇帝做个对头”呢？这种根深蒂固的孔孟之道，正是宋江日后投降的阶级根源和思想根源。自此以后，他竟把“上山”看作“上逆天理，下违父教”，“陷我于不忠不孝之地，万劫沉埋”的“迷天之罪”，宁可硬吃官司，发配江州，也不愿“躲在江湖上，撞了一班儿杀人放火的弟兄们，打在网里”；宁可拔刀自刎，也不愿“上山”，甚至“教去了枷，也不肯除”，因为“此是国家法度，如何敢擅动”，活画出一副封建统治阶级标准奴才的丑恶嘴脸。

然而宋江毕竟还是“上山”了。那是在浔阳楼吟“反诗”之后。他真的要学黄巢、造封建统治者的反了么？没有那么回事。这是“醉后狂言”，是作不得准的；而且这“狂言”也不过是郁结于心的一股牢骚：“自幼曾攻经史，长成亦有权谋”。完全是一副自命不凡的样子。不幸“目今三旬之上，名又不成，功又不就，倒被文了双颊”，怎能不“临风触目，感恨伤怀”？因而题咏于壁，为“他日身荣”，“以记岁月”。如果黄文炳是个有见识的，大可不必大惊小怪，只要统治者分给一点残羹剩汤，宋江自然会感激涕零、知恩图报。而黄文炳之所以抓住不放，无非是要争宠于蔡京、高俅之辈，这完全是“地主阶级内部这一派反对那一派的斗争”，是饱狗与饿狗之间的一点特别有趣的争斗。正是这种地主阶级内部的派别斗争，把宋江“逼”上了梁山。宋江在杀了黄文炳以后说，“今日不由得宋江不上梁山泊”。“不由得”三字道出了宋江的苦衷。杀了命官，闹了州城，有家归不得，有国报不得，于是只能硬着头皮，走象他嘱咐武松那样的一样的路：“上山”去，“暂占水泊，权时避难”，以待时机，投降朝廷，真所谓“恰如猛虎卧荒丘，潜伏爪牙忍受”。就这一点说，宋江应该大大地感谢高俅们，要不是他们一“逼”，宋江何时才能功成名就，“官爵升迁”？

这就是宋江“上山”的来龙去脉，也就是宋江投降的来龙去脉。宋江的地主家庭、封建教养、孔孟之道以及“上山”的曲折过程，说明了宋江的投降路线决不是晁盖死后突然出现的偶然现象，而是有其深刻的阶级根源和思想根源。我们一定要注意前半部《水浒》中的这些描写，不要辜负了《水浒》作者的一片苦心。当然，《水浒》作者如此写，是为了美化和歌颂宋江，但这恰好从反面为我们提供了绝妙的批判投降主义的材料。

《水浒》里的宋江是一个不可多得的反面教员。宋江的“上山”告诉我们，看一个人，一条路线，必须在阶级的历史的分析。对宋江是如此，对林彪反党集团也同样应当如此。我们必须“善于辨别那些伪装拥护革命而实际反对革命分子，把他们从我们的各个战线上清洗出去，这样来保卫我们已经取得的和将要取得的伟大的胜利”，把上层建筑领域无产阶级战胜资产阶级、马克思主义战胜修正主义的斗争进行到底！

赶着革命的浪头走

——《水浒》杂谈

中国人民解放军某部 方 群

这是观海时所看到的，茫茫无边的大海，千重浪，万顷涛，一浪高过一浪，恰似千军万马呼啸着奔腾而来。大海是深沉有力的，它不停地汹涌着，咆哮着，……

生活也象大海，每一个腾跃而起的前进浪头，总是社会深沉的革命激流所掀起的。一个革命浪头出现了，万万千千个浪头紧随着奔腾而来。人类社会就是这样地被亿万人民所组成的历史潮流推动着前进。

浪无风不起，革命风掀起革命浪。然而，每当一个新生事物出现在地平线上，革命人民争先恐后地认真学习时，往往被某些人讥之为“赶浪头”；一个学习或批判运动掀起时，某些人也讥之为“赶浪头”；甚至向某一个英雄人物学习，也会被某些人讥之为“赶浪头”。

革命的浪头就是要赶！这就是我们革命者的态度。跃腾在时代前列的一个一个的浪头固然伟大，但要形成波澜壮阔的革命运动，还必须靠无数个浪头的汇合才能掀起高潮。有波有涛才能有高潮，高潮是由无数个浪头聚成的。没有这千重浪、万顷涛，冲在前列的浪头就会失去支援，甚至有可能孤孤单单地消失在肮脏的浊流之中。革命者当新的前进的浪头涌来时，总是毫不犹豫地投身于革命的漩涡之中，推波助澜，使革命的浪涛一浪比一浪高。这就是赶浪者的可贵之处。如果整天呆在岸上，背剪着双手在岸边徘徊，表面上似乎酷爱大海，而一遇浪花沾及衣襟，便回避唯恐不及，甚至对波涛汹涌的群众运动横加指责，动辄讥之为“赶浪头”，这其实是一无可取的。

赶着革命的浪头走，这并不是说可以盲目地随大流。随大流的有形形色色的人物，有投机革命的，有追求个人出路的，也有试探着走上革命道路的。但即使是真心实意随着革命潮流走吧，如果不分清路线，不辨别是非，就只能消极地、被动地卷入革命的潮流，因而离开革命潮流也快。《水浒》中的宋江，原先是反对革命的，只是由于在地主阶级的内部

斗争中遭到了失败，革命风暴把他卷进了汹涌澎湃的农民革命激流。这种渣滓当泛在水面上的时候，倒也显得挺神气的；然而，一旦当他们认为叛变革命的时机已到时，便露出了渣滓的本相，离开了革命的激流，心安理得地接受招安，攻打方腊，成为阻碍激流前进的礁石。因此，宋江后来离开革命的潮流而被招安，完全不是偶然的。而李逵则不同，他是真心实意地投入革命潮流的，连梦里也恨不得“杀去东京，夺了鸟位”，表现出革命农民“何等的历史主动性”。然而，李逵由于时代和阶级的局限，尽管在招安和反招安的问题上与宋江存在着两条路线的分歧，但这种斗争毕竟是自发的而不是自觉的。李逵没有能从本质上认清宋江招安思想的实质，最后终于不免成为宋江这条投降路线的牺牲品。

历史的教训是深刻的。永远前进的革命搏浪者，不仅要合着时代前进的步伐积极投身于汹涌澎湃的革命洪流，而且应当随时随刻辨别政治方向，一旦面临暗流或逆流出现时，就得挺身而出，成为反潮流的革命战士。只有这样，才能保证我们永远沿着正确路线在大风大浪中奋勇前进。

前进吧，人们！让我们一起赶着革命的浪头走！

我们是怎样评《水浒》的？

中共崇明县海桥公社委员会

毛主席指出：“《水浒》这部书，好就好在投降。做反面教材，使人民都知道投降派。”为了充分发挥《水浒》这部反面教材的作用，我们组织广大社员，联系本地农民革命斗争史，狠批了宋江的投降主义路线，使广大群众进一步认清了宋江投降主义的真面目。

对反动派造反究竟是有理还是无理？对这个问题，革命派和投降派的回答历来是不同的。革命者从来认为造反有理。拿方圆千里的崇明岛来说，五十多年前，就在今天海桥公社所在地的协平乡，爆发了震撼全县的“西沙田革命”。协平乡数万农民打进“公堂仓”，捣毁警察局，直冲县衙门，举行了声势浩大的夺田抗租斗争，在崇明的革命斗争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曾经亲身参加过“西沙田革命”的老贫农、共产党员刘士怀，在回顾当年这场斗争时说，一九二一年秋天，崇明西沙接连发生水灾，田都荒了，狠心的地主还变本加厉，催租逼债。我们被逼得实在活不下去了，就起来造反。因此，农民阶级和地主

阶级之间的斗争是你死我活的斗争。但是，几千年来一切剥削阶级总是说：‘压迫剥削有理，革命造反有罪。’《水浒》中的宋江，从他投降主义的立场出发，从头至尾也都是唱的这个调子。晁盖、吴用、阮氏三兄弟等“聚义”起事，“智取生辰纲”，把地主阶级从劳动人民身上榨取的血汗夺回来，宋江却把这种革命行动说成是“犯了迷天之罪”；晁盖等人抗击封建王朝的武装镇压，把官军打得落花流水，宋江又认为是干下了“灭九族的勾当”，“于法度上却饶不得”；晁盖要宋江上山造反，但在他看来这是“上逆天理，下违父教，做了不忠不孝的人”。总之，农民阶级的一切革命行动，在宋江眼里都是无法无天，简直是糟透了。因此，宋江一旦夺得了农民起义军的领导权，就大搞修正主义、投降主义，甚至充当反动统治阶级的走狗，镇压方腊起义，恶毒咒骂起义农民是“贼寇”，把他们“剖腹剜心”，残酷屠杀革命人民。这样地联系崇西沙革命斗争的历史，批判《水浒》所鼓吹的投降主义，使广大干部、群众深刻认识到了宋江之流是地主阶级在农民起义军内部的代理人。而搞修正主义、投降主义，最后必定公开堕落成为镇压人民革命的刽子手，这是一切投降派的共同规律。

在评论中，我们还引导干部、群众对招安、投降究竟是不是“农民的局限性”这个问题进行了深入的讨论。

西沙农民革命斗争的事实告诉我们，把梁山农民起义的失败归结为“农民的局限性”，把投降招安说成是农民起义的必然结局，这是对农民革命斗争的污蔑。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来看，农民，特别是贫农，乃是“打倒封建势力的先锋”。崇西沙农民革命斗争完全证明了这一点。当时，协平乡方圆数十里内几万农民，敲着铜锣，手持木棍、铁锹冲击县城，把伪县长吓得魂飞魄散。敌人为了收买人心，瓦解农民斗争，撒下大把大把银元，但是，他们理直气壮地把银元踩在脚下，不为敌人所收买。第一次斗争后，伪县政府抓走了许多人，几万农民又重新包围县城，进行示威、抗议，并把伪县长抓到高台上狠狠地批斗了一顿。联系这些斗争事实，使大家看到了宋江只不过是混进农民革命队伍的地主阶级分子，他上梁山只是“权借水泊里暂时避难，只等朝廷赦罪招安”，以便“保国安民”，效忠皇帝，维护地主阶级的反动统治。宋江是假造反，真投降，根本不是什么农民起义的“领袖”。因此，怎么能把宋江的投降主义同“农民的局限性”混为一谈呢？许多同志，在评论中还列举了西沙田革命斗争中广大农民宁死不屈、英勇斗争的事实，驳斥了把投降招安说成“农民局限性”的谬论。当时，由于反动派的残酷镇压，许多参加暴动的农民被抓去坐牢，家里的房子被烧毁。但是，革命的烈火是扑不灭的。广大农民群众转移到附近的三光镇继续坚持斗争。一九二二年夏天，几千农民又冲进伪警察局，发动了抗暴斗争。不久，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又成立了农民协会，建立了自卫军，并坚持转战芦荡，直到全国解放。这种“杀头好比风吹帽”的英勇气概，和宋江回回声声“早招安，心方足”的奴才心理，是多么鲜明的对照！

“思想上政治上的路线正确与否是决定一切的。”通过联系评论《水浒》，大家还深深感到，农民起义要取得胜利，一定要有先进政党的领导；要有正确的思想政治路线。梁山农民起义之所以会失败，归根到底是这支农民起义队伍的领袖不好，搞修正主义，搞投降。而有些人象李逵等，虽然有“杀去东京，夺了鸟位”的想法，但由于路线斗争觉悟不高，识别不了宋江搞修正主义的真面目，因而在关键时刻总是和错误路线作了妥协。因此，大家感到，我们今天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中，一定要学会在斗争中善于识别形形色色的修正主义，坚持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才能在党的领导下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抵制资本主义倾向，把革命进行到底。

(崇明县革命委员会写作组协助整理)

宋江的“借”和“买”

五七农场 杨建文

宋江在钻上梁山之后，遇见朝廷文武官员，总要“倾诉”一番“心腹衷曲”，我宋江只是“权借水泊暂时避难”。其实，“心腹”还只吐露了一半，说“借”是真，说“避难”就并非全是实话。直到梁山泊大聚义，宋江眼看自己实力已经不小，便跑到皇帝姘头李师师家里，写了一首《念奴娇》，说道是：“借得山东烟水寨，来买凤城春色。”一个“借”字，一个“买”字，方才将宋江的“心腹衷曲之事”和盘托出：“借”是为了“买”，也就是要借用梁山起义军作为资本，同封建朝廷做一笔政治买卖。

“凤城”，即禁城、皇城，是封建皇帝及最高封建统治集团寻欢作乐的天堂。宋江“自幼曾攻经史，长成亦有权谋”，渴望钻到最高封建统治集团中参与财产和权力的再分配，分享一点“凤城春色”。可是在地主阶级反动派内部的倾轧中，宋江不但“名又不成，功又不就”，甚至差点丢了脑袋。于是他看中了水泊梁山的“烟水寨”。在他看来，“烟水寨”不过是一件能够同朝廷交换高官厚禄的商品。他替朝廷把这支农民起义军招安了，朝廷就理所当然地要让他升官发财，这不是一件“一本万利”的买卖吗？

这种生意经，宋江历来是十分精通的。所谓“仗义疏财”，无非就是从剥削所得的财物中拿出一丁点来，小恩小惠，收买人心，“吃小亏占大便宜”。不过，在眼前这笔政治买卖中，“烟水寨”这件商品并非属于他自己的，宋江说是“借”来的，这是为了向朝廷表白自己

并非真的要造反，其实是骗来的。水泊梁山前期的巨大发展，是晁盖的坚持起义路线的胜利，是起义农民浴血战斗的成果，他宋江又有什么“鸟”功劳！宋江所干的，只是千方百计篡夺晁盖的 leadership，用一条投降路线来代替坚持起义的路线，才把“烟水寨”捋到了自己手里。与其说这是做买卖，还不如说是一场买空卖空的政治赌博。

宋江要出售“借”来的——不，骗来的“烟水寨”，朝廷就要“卖”给他一点“凤城春色”，公平交易嘛。但“买”方与“卖”方总是要进行一番讨价还价的。《水浒》写朝廷对梁山的三次招安，实际上是宋江同地主阶级当权派之间的买卖磋商。第一次皇帝的诏书，要宋江“拆毁巢穴，率领赴京，原免本罪”，否则“天兵一至，齑粉不留”，“凤城春色”只字不提，出的价钱显然是太低了。《水浒》当然不能让宋江接受。第二次诏书，被高俅玩了个花招，搞成“只恕群盗，不恕宋江”，当然更不行。直到第三次诏书，明确表示“早早归顺，必当重用”，也就是允许宋江分享“凤城春色”了，这笔买卖才算拍板成交。就这样，宋江“借得”农民起义军战士的鲜血，作为自己“面君”“朝贺”的酒浆，“借得”农民起义军战士的尸骨，作为自己升官发财的阶石，洋洋得意地走进了“凤城”。这还不算，宋江临走前还索性对“烟水寨”中一应器材货物来了个“分金大买市”，也就是减价大拍卖。曾经轰轰烈烈的“山东烟水寨”终于被宋江的投降路线弄得轻烟流水地无踪无影了。

朝廷让宋江“买”一点“凤城春色”，这笔生意合算不合算呢？很合算。《水浒》八十二回以后的叙述很清楚，梁山农民起义队伍变成了封建王朝屠杀农民的御用工具，田虎、王庆被“凌迟处死”，方腊被“剐”了三日示众。遍地农民起义的烈火被扑灭了，封建皇帝摇摇欲坠的江山保住了。这就是宋江给封建统治阶级增添的一片“凤城春色”！

但是，北宋王朝早已是“流水落花春去也”，《水浒》末尾描写的“天下太平”那种“春色”，只是给死人脸上抹了一点胭脂。宋江费尽心机“买”了一顶乌纱帽，没几天就可耻地葬身蓼儿洼了；如果他还有什么用处的话，那就是作为反面教员教育人民，使人民都知道投降派。

“胡敲”与“葫芦”

上海柴油机厂 黄来纪

宋江这个孔孟的忠实信徒，见到什么都要发一通“忠孝节义”的议论。在从皇帝那儿领得打方腊圣旨回营途中，他看到有人在玩“胡敲”（即现在的扯铃），就立刻造了两首歪诗：

“一声低了一声高，嘹亮声音透碧霄。空有许多雄气力，无人提处漫徒劳。”

“玲珑心地最虚鸣，此是良工巧制成。若是无人提挈处，到头终久没声名。”

宋江生怕走在旁边的卢俊义不懂，还作了一番解释：“这胡敲正比着你和我。空有冲天本事，无人提挈，何能作音？”就是说，他和卢俊义如果不被皇帝赏识“提挈”，又怎么能升官发财呢？一副忠心耿耿的奴才相，维妙维肖。

宋江把自己比作“胡敲”，不禁使人联想起孔老二不愿作葫芦的故事。当时晋国奴隶主代表人物佛肸，想拉孔老二一起去对付新兴地主阶级代表赵简子，孔老二欣然同意了。子路因为佛肸名声不好，表示异议。孔老二说：“我难道是个葫芦吗？怎么能够挂起来呢？”

宋江得意洋洋地把自己比作“胡敲”，孔老二唉声叹气地不愿做“葫芦”，看上去好象截然相反，其实反动思想是完全一致的。

孔老二是没落奴隶主阶级的代表。他何尝不想做一个“嘹亮声音透碧霄”的“胡敲”，为挽救奴隶主阶级的灭亡发挥一阵“雄气力”呢？可惜，奴隶主阶级已是山穷水尽，他就是把“克己复礼”的声音喊得再响，也没有人顾得上“提挈”他，于是只好做一个闷“葫芦”挂将起来。宋江所处的时代，地主阶级也已走上了下坡路。一肚皮“忠肝义胆”的宋江，也很久“四海无人识”，做了半辈子闷“葫芦”。但是他的“心地”似乎比祖师爷孔老二还要“玲珑”一些。他采取钻到革命力量内部来瓦解革命力量的办法，替封建皇帝消灭了梁山这支农民起义军，暂时地解除了摇摇欲坠的北宋王朝的一大威胁，果真得到了皇帝的“提挈”。“葫芦”就这样变成了“胡敲”。对皇帝的“提挈”感激涕零的宋江，决心要为巩固封建统治竭尽“雄气力”，就去打方腊——不“替天行道”的强盗去了。

但是，北宋王朝既已濒临灭亡，被这个王朝“提挈”的宋江又能有什么美妙的命运？宋江的“胡敲”诗恰恰从反面说明，当一个反动的剥削阶级病入膏肓之时，任何“心地玲珑”的“忠臣义士”都是不能起死回生的。宋江在地主阶级倾轧中送了命，临死时还不忘尽忠于“提挈”他的皇帝，害死了“反心未除”的李逵。但是，成千上万的李逵，终究会象对付罗真人那样，抡起板斧把地主阶级劈成一堆破“葫芦”的。

权谋和宋江

上海电机厂工人 周勇闻

《水浒》中的宋江自认，“自幼曾攻经史，长成亦有权谋。”权谋者，即搞阴谋诡计以篡夺

权力之谓也。宋江一生，就是为了贩卖农民起义军以换取自己的升官发财而大搞反动权谋的一生。

宋江原来是不想上梁山的。后来虽然在地主阶级的内部斗争中失败而无可奈何地上梁山，目的也只是为了要“得朝廷招安”，“博得个封妻荫子，久后青史上留一个好名”。为此，他选择上梁山的时机是下了一番苦心的。宋江在刺配江州的途中，当刘唐邀请他上山时，竟以自杀来威胁，执意不允。后来，花荣建议给宋江开枷，宋江一听就急得双脚直跳：“此是国家法度，如何敢擅动！”在这里，宋江诚如作者所歌颂的：“有罪当官不肯逃，逢人劝解愈坚牢”。但时隔不久，宋江在江州因作了所谓“反诗”被缚上法场待斩而被劫出时，他就决定加入梁山农民起义军。

宋江的这个行动完全违背了自己原先的声言。所以如此，这不仅是因为这个叛徒历来是个言行不一的两面派，而且由于他在这时选择了所谓“曲线尽忠”的道路。就以他所选择上山的时机来看，也足以见这个叛徒老谋深算，善于玩弄权术。当宋江第一次在刺配途中被刘唐等人所截获时，梁山泊共有头领三十一名，其中由宋江直接推荐上山的只有九名，力量很单薄，再说宋江此时又没有什么功劳，上山想必也捞不到什么地位和实力，因此情愿刺配江州。宋江在法场被梁山农民起义军劫出时，宋江原先推荐上山的九位头领地位已比较巩固，而且宋江手下又有了张顺、张横等九人，再加上戴宗、李逵并连同自己，一共是二十一人，与跟晁盖上山的一十二人正好倒了个头。这些人中有不少是真心实意参加农民起义的，然而在宋江眼里，他们都是自己获得领导地位的实质资本，于是就狠下一笔赌注，加入了梁山农民起义军。

正是由于这个原因，作者在宋江被劫出法场后，立刻匆忙地安排了一场白龙庙英雄小聚义的情节，为宋江参加农民起义军大肆渲染，成了七十一回中梁山泊英雄排座次的序曲。宋江从江州上山以后排座位时，提出了休分功劳，新老头领两边坐。于是，只见左边稀稀拉拉只有九位头领，这是跟着晁盖上山的老头领们；右边则簇簇拥拥坐着新上山的三十七人，其中二十五人是经宋江推荐或拉拢上山的。宋江提议对列而坐，实际上是让晁盖等人“检阅”一下宋江的力量。宋江而后又迫不及待地讲起黄文炳捏造的谣言，什么“耗国因家木”，“刀兵点水工”，拼起来正好是宋江二字，还有什么“纵横三十六，播乱在山东”，合主宋江造反在山东。总之，连上天也都认为宋江为起义军之重，简直夸得不得了。宋江闭口不言其反映忠君思想的“反诗”，而侈谈这些蛊惑人心的谣言，联系宋江上山时机的选择，不都是有目的、有计划的阴谋吗？

象宋江这样投机参加革命的人，实际上只不过是將革命当作一项买卖，一项赌注。他们象赌棍一样，只要赢牌的机会一到，就不顾一切地扑将上去。这是宋江开始他的反革命权谋活动的第一时期。

宋江上梁山以后，开始了他权谋活动的第二时期。他口口声声称晁盖为“山寨之主”，

自谦“小可不才”，其实心里可根本看不起晁盖。当晁盖谦让宋江坐第一位时，宋江只是说：“仁兄，论年龄，兄长也大十岁，宋江若坐了，岂不自羞。”在宋江看来，晁盖做山寨之主，只不过岁数大点罢了。这句似乎恭维的话包含着多么恶毒的讥讽！宋江表面吹捧晁盖，是为了骗取晁盖的信任，暗中却逐步篡夺农民起义军的领导权。多次作战，晁盖要亲自指挥，宋江总是劝道：“哥哥是山寨之主，不可轻动。这个是兄弟的事。”久而久之，梁山泊农民起义军的兵权已实际操纵在宋江手里，晁盖已被架空。而宋江借助指挥作战的机会，把宋朝将领秦明、呼延灼、徐宁、韩滔、彭玘、樊瑞、朱全、雷横，地主分子李应、柴进等拉上山来，作为搞投降的骨干力量，安插在各个重要岗位上。

晁盖死后，宋江立即把“聚义厅”改为“忠义堂”，公开打出“替天行道”的旗子，从根本上改变了梁山农民起义军的路线。为了坚持走投降主义道路，宋江又在这第三个时期中进行了一系列不可告人的阴谋活动。拉卢俊义上山，便是其中一个重要步骤。卢俊义原是北京大地主，宋江硬拉卢俊义上山，还口口声声让卢俊义坐第一把交椅，这实质上是在用行动说明农民起义军必须要有卢俊义这样的地主分子来领导，是向地主阶级投降的丑恶行为。其实，宋江请卢俊义坐第一把交椅，只不过是做戏而已，他心里完全明白，梁山寨主稳是他自己坐定了的。卢俊义既无功劳，又无帮手，孤身寡人能当什么头。卢俊义也自认：“卢某是何等之人，敢为山寨之主？”宋江经过这样一拉一让，既起到了向地主阶级投降的宣传作用，又安安稳稳地坐上了第一把交椅，其权谋之阴险毒辣，于此可见一斑。

然而，“机关算尽太聪明，反误了卿卿性命。”权谋家的结果从来是和愿望相反的。宋江坐了梁山泊的第一把交椅后，诱骗农民起义军投降朝廷，最终被皇帝的御酒毒死。这是功狗的共同下场，也是功狗的共同悲哀。

搞权谋是一切混进革命队伍内部的投降派的特征。鲁迅曾经把企图带领革命队伍走向歧路的投降派讥讽为“带头羊”，这是很精当的。投降派总是首先要篡夺革命队伍中的权力，然后才有可能利用既得的权力引诱革命队伍走向投降的道路。蒋介石是如此，林彪也是如此。他们的阴谋活动表明：“反革命分子不是那样笨拙的，他们的这些策略，是很狡猾很毒辣的。一切革命党人决不能轻视他们，决不能麻痹大意，必须大大提高人民的政治警惕性，才能对付和肃清他们。”这是历史的教训，我们必须认真记取。

方腊传

齐 矛

北宋末年的一天，浙西群山的重重雾霭，罩住了青溪县（今淳安县）的一块山顶平地，一个青年姑娘在雾中练剑，只见她翻腾回转，矫捷多姿。练了一会，她并腿、收剑，抹一把汗，叫道：“哥哥！”

从磨刀石上站起一个中年男子，手上举着两把钢刀，稳稳实实走来，笑着问：“啥事？”
“哥哥，唐朝的陈硕真，当年就在这里练剑吗？”

“是的。陈硕真领导我们家乡农民，起来反抗唐朝皇帝的统治，大长了农民的志气。她英勇顽强，百折不回，直到最后被官军杀死，始终没有屈服。”

姑娘被故事激动了，她眼眉飞动地说道：“哥哥，她真是一位了不起的妇女！”

哥哥放低声音，决断地说：“我们也要这样干，把人间的不平事都铲光！”

这兄妹两人，就是著名的农民起义领袖方腊和女将方百花。他们在北宋宣和二年（公元一一二〇年），领导了东南百万农民大起义。这次起义虽然受了阶级和历史条件的限制，不可能成功，被封建王朝残酷镇压了下去，但方腊和广大起义农民那种敢于向反动统治者挑战，提出“平等”的革命口号，在斗争中不畏强暴，不受招诱，大义凛然，宁死不屈的崇高气节，在农民战争史上放射出夺目的光彩！

漆园誓师

方腊出生在浙江睦州（今建德）青溪县塌村一个经营漆园的中产之家。青溪位于新安江岸。从黄山南麓发源的新安江，蜿蜒曲折地穿行在浙西丛山峻岭之间，把这里的地势穿凿得山陡谷深，险峻万状。

在北宋将要灭亡的宣和年间，国内连年灾祸，老百姓饿得连树皮草根也吃光了。残忍的地主、官僚，把饿得奄奄一息的穷人，敲开头盖骨，取出脑髓，炼油熬烛。宋徽宗赵佶，是个极端荒淫腐朽的家伙，他为了满足自己饮宴玩乐的需要，加重了对人民的压榨，对两浙（浙东、浙西）这一片富饶地区，剥削更重，光是“身丁钱”一种，就逼得无数百姓妻离子散，家破人亡。当时在睦州一带，流传这样一首民谣：“拖欠了身丁钱，手脚上镣大堂牵，不付身丁钱，砍了头颅那个怜？”沉湎在酒色狗马中的赵佶，还要各地奉献名花异石，用来装饰园亭。赵佶的宠臣朱勔（音“勉”），专门成立了一个“苏杭应奉局”，在江南民间搜刮花石。

民家有了一块较别致的石头，或一株少见的花木，“应奉局”的恶棍就闯进门来，用黄纸往上一贴，这花石就属于赵宋“皇”家的了。启运时，如果花石高大，他们就拆墙倒屋，并趁机翻箱倒篋地掳掠一空，然后扬长而去，这就是江南老百姓切齿痛恨的“花石纲”。民间怨声载道，阶级矛盾十分尖锐。

方腊是一个正直、仗义的人，他看到村里一些穷苦百姓交不出身丁钱，被官府吊打，十分气愤，有时就从自己家用中挤出点钱来代交。贪暴的官府以为方腊有钱，存心敲诈他，要他拿出家里一块花宝石。方腊拒绝了，官府不肯甘休，几次派了衙役来恫吓他，还把一间房子捣毁了。

方腊气愤极了，同妻邵氏、妹妹百花商议。百花说：“岂有此理，这个皇帝小子，不让我们百姓过日子了。”方腊说：“现在过不下日子去的，何止我们一家。村里因为交不出苛捐杂税，有上吊的，有跳崖的，今天又是一个老汉，出去躲官粮，饿得走不动，被乌鸦把眼珠啄走了。要过好日子，除非起来造反。”百花一挥拳说：“对！先杀死狗县官，再把应奉局的恶棍抓起来！”邵氏说：“讲轻些，当心让隔壁听了去。”

隔壁住的是当“里正”的方庚。这个方庚虽说是方腊的兄弟，思想品德却和方腊完全相反。方庚为人贪财，巴结官府。这一天，方腊一家说的话，都进了他的耳朵，这个混蛋就连夜进县城告密去了。等到方腊发觉，已经追不上。方腊看到形势迫切，决定利用拥有大批农民群众的“食菜事魔教”的组织，提前起义。

“食菜事魔教”，是当时在两浙秘密流行的一种宗教，主张素食，提倡节财互助，教徒不论到哪里，碰到不相识的教徒都留饭留宿。他们不拜神佛，不祭祖先，主张“是法平等，无有高下”。这反映了贫苦农民要求改变封建制度，建立一种自己不受剥削的社会的淳朴愿望。教内设“魔头”，教徒接受“魔头”的约束。方腊就是当地的一个“魔头”，因此他在教徒中有很大的号召力。

宣和二年十月的一天夜里，方腊没有把方庚追到，就立即将村中青年教徒召集到他的漆园里，宰了牛，抬来了一坛坛好酒。方腊举杯在手，高声说道：“今晚请了大家来，要商量一件大事。天下的国和家，本是同一个道理。譬如有一家，子弟耕织，终岁劳苦，父兄不劳动，却吃好穿好，还对子弟鞭笞酷虐。做这样的子弟，你们甘心吗？”

教徒们齐声回答：“不甘心！”

方腊又说：“父兄不但挥霍享用，还拿去孝敬仇敌，让仇敌更加富足，再来欺侮我们。我们做子弟的，拚死上前打仗，父兄却继续用财帛贡奉仇敌。你们说这事有理吗？”

教徒们愤然举起了拳头：“真是岂有此理！”

方腊自己也因激愤而涌出了眼泪，他顿了顿，说得更快了：“现在赋役繁重，官吏侵剥。我们种的粮、织的丝、砍的竹、割的漆，统统被他们搜刮了去。朝廷里的那些帝王将相，玩歌舞，养狗马，造园亭，敬道士，这些年来，‘花石纲’，可把我们害苦了。我们终岁勤劳，而妻子冻饿，求一日饱食不可得。这样的日子我们还能忍耐吗？”

这些话送到了农民心里，他们的情绪完全被激发起来了，齐声喊道：“我们忍不下去了！”“我们为什么在这里等死？我们要动手干！”

方腊跳上一块大石头，更响亮地说道：“只要我们一条心起来造反，四面八方的穷人都响应我们。我们先把东南地区占据下来，划江而守，轻徭薄赋，让人民过好日子。朝廷失去了东南这个财库，一定要在中原地区加紧剥削，那时，中原地区的百姓也会起来反抗。这样不到十年，我们一定能够统一天下。”说到这里，方腊高举双臂，仰天高叫：“我们的口号是：‘是法平等，无有高下’！”

这一番话，是一篇十分精彩的造反宣言，包含了很有远见的革命纲领。农民们抹去因激动而涌出的泪水，端起齐心酒，一饮而尽，喊道：“我们生死同心，永不背叛！”于是大家涌上南山，削竹剑，砍木棍，在高大的漆树上扯起了杏黄旗，并尊称方腊为“圣公”，年号“永乐”，和北宋王朝公开对立。他们选择了地形特别险要的帮源洞为义军的根据地。受尽苦难的百姓，纷纷赶来参加义军，数天之间就达到几万人，练兵习武，热气腾腾。

十一月十九日，义军消灭了官兵五千人，打下了青溪县城。

连下三州

打下青溪后，方腊挥师直指睦州。

睦州知府张徽言，在任上拼命搜刮民脂民膏，名声很臭，最近奉调回山东青州去。不料还没有来得及办移交，睦州已被义军围起来了。张徽言一心只想早点脱身，哪敢赔上命在这里打仗。建德县尉童淑，长着蛇一样的青眼睛和老鼠胡须，为人贪残凶狠。他见张徽言不敢打仗，就捋着袖子吹牛：“我领五百名刀斧手，可立砍方腊之首。”

方腊来到城下，看到城高河深，义军手中又大部分是竹枪柴刀，决定智取睦州。他把青年将领方七佛和妹妹方百花找来商议。方七佛说：“不怕。我们‘拳脚队’一顿拳脚，就能把睦州踢翻。”方百花说：“老百姓传说我们义军有神兵助战。我们索性扮作天兵天将，叫我们娘子军都穿上红衣裳、绿裤子，吓唬他们一下，怎么样？”方腊呵呵地笑着说：“好！官军杀人放火尽干坏事，所以最怕鬼神报应，我们就扮一扮鬼神。当然，光吓唬不解决问题，还是要靠狠狠地打。七佛，你们‘拳脚队’就先把敌人放过来，然后断了他的后路，把敌人统统报销。”两人奉命分头去布置了。

童淑领了五百人出城，看到两边都是高山，不见义军，心里疑惑不定。一个小卒悄悄对童淑说：“听说义军是神兵，一阵风就到了你面前，刮一阵风又不见了。”童淑心虚，硬着头皮朝前走。走到一个山口，忽然一阵山风刮来，飞沙走石从山上滚滚而下。透过沙尘和山中云雾，隐隐看见大批穿得红红绿绿的“女仙”，手里举着刀，飞腾下山而来。官军一阵惊叫：“神兵来了！”扭头就往回跑。童淑一见只剩了自己孤零零一人，赶紧喝叫士兵们回来，但哪里喝得转，只得自己也跟着跑。一眨眼功夫，“神兵”到了面前，刀光闪闪，砍死了一大批官军。方七佛的拳脚队也从地底下突然冒了出来，夺过武器，在敌阵中夫砍夫杀。官军的五百名刀斧手大部分成了刀下鬼，童淑没有面子逃进睦州，独自落荒溜走了。

打下睦州，方腊分兵两路，一路由方百花率领，向杭州方向打去。方腊一直送她到富春江边，用鞭梢指着远处的杭州说：“等我打下歙州，就回来同攻杭州，看谁先打进杭州城

去。”方百花自豪地说：“我在杭州城里等着你。”

方腊率另一路起义军回师溯新安江西上，穿过千里岗山和天目山之间的空隙，进入歙州地界。守歙州的“东南将”郭师中带一万人出城迎战，正遇上方腊部下勇将八大王。两人交手，打了半个时辰，八大王一刀将郭师中砍成两半，义军趁势冲进歙州城。八大王又趁势向北发展，威逼宣州。

方百花率领义军所向披靡，直抵杭州凤山门，在馒头山上设了点将台，准备攻城。

杭州知府赵霆，一见义军来到，就卷起搜刮来的金银财宝，逃之夭夭，留下一文一武两个官员，武的是制置使陈建，文的是廉访使赵约。他们两人也各有自己的算盘，“陈建恋美妾，赵约惜货财”，因而没有跟着逃走。两人走上城头，看到义军已经架起云梯，一个女将领头，迅速爬上城来。城上的石头和箭矢，雨点般落下去，女将挥舞长剑，把石头和箭矢全都格开，脚下爬得更快。陈建慌忙喊道：“用火，快用火。”火烧着了云梯，看看快要烧断了，女将奋不顾身继续往上爬，正当云梯轰然一声倒下去时，她翻身一跃，上了城头，挥剑把逼上来的官军一个个砍下城去。就在这时，大批义军也跟着爬上了城，官军被压下城垛。陈建回头要跑，方百花飞身一跃，伸出剑去挑，但这时冷不防一支暗箭射来，正中方百花的面门，她支持不住，倒了下去……。

西南喊杀声大作，方腊的大军也攻进了城。方腊教把陈建、赵约两个捆起来，听候杭州百姓发落，同时寻找方百花，布置守城。可是，当方腊把她找到时，这位杰出的女将已经停止了呼吸。只见她面容严肃，剑眉竖起，紧握双拳，象是在说：“打到金陵去！打到汴京去！”

宋 兵 南 来

东南形势的急转直下，大大震动了封建王朝的京都汴京。北方虽然也有宋江等三十六人造反，但在赵宋统治者看来，这一伙人只是流来窜去，不占州县，并不构成很大威胁，且在宣和元年十二月，已经下“诏”招安，正等着看结果；而方腊乱起两浙，占地称王，却不能不使赵佶急得大汗淋漓。这个地区是全国财物集中之地，北宋在这个地区搜刮的赋税钱粮越来越沉重。以茶税做例子，公元一〇一九年（宋真宗天禧三年），东南“茶息钱”是三万贯（一千文为一贯），而一百年后的徽宗政和年间，就增加到了四百余万贯，增加了一百三十三倍。两浙起义无异断绝了封建王朝的主要财源，这怎么不叫赵佶一伙焦急万状呢！

赵佶匆匆下令，命童贯率领军队前去镇压。这支军队共由三部分组成：一、保卫京畿的禁军；二、鼎州（湖南常德）、澧州（湖南澧县）枪排手；三、山西和陕西的六路精兵。总数共十五万人。以西北系老军官刘延庆为都统制，王禀为统制。赵佶倾北宋全国精兵来对付方腊起义，还不放心，在军队出发时，他又穿了便服赶来，心事重重地拉着童贯的手说：“这东南大局，寡人完全托付给太尉了。倘有紧急事，不必奏报，直接代寡人以御书处理。”童贯就带了十五万军队，顺汴河星夜南下。

赵宋王朝最害怕义军占领金陵（今南京），凭据长江天险与北宋抗衡，因此命令童贯，

金陵乃咽喉要害，先占据江宁府，守住镇江。于是童贯亲自驻扎镇江，命王禀守住扬子江口，刘延庆镇守金陵，封锁了长江，这在战略上，宋军已比义军先走了一着。

在杭州，方腊召集军事会议，确定下一步战略行动。

方腊兴奋地说道：“漆园誓师以来，战斗连连胜利，各地纷纷响应，义旗四举，仙居吕师囊起兵十万，永嘉俞道安威震浙南，东阳富求道人转战在金华江沿岸四县，他的师兄仇道人出击剡县（今浙江嵊县）和新昌，还有苏州的石生、归安（今浙江吴兴）的陆行儿，声势都越闹越大。我们的队伍已迅速发展到现在近一百万人。我的计划是，固守杭州，先图浙东，派出大军回头打去，配合各路义军打下浙东各县，然后再部署北取金陵，大家的意见怎样？”

太学生吕将，是新近才加入义军的一个青年知识分子，他拥护农民革命，反对赵宋反动统治。听了方腊的意见后，吕将站起来说道：

“圣公对浙东形势的分析，很鼓舞人心。在这种情况下，我以为应当挥胜利之师，直取金陵，以扼守长江天险，断绝敌人的南北通道，确保整个江南在我手中。如果我们回头在浙东徘徊，敌人必定长驱直入，那将是很被动的。”

方腊看这个年轻的读书人敢于发表不同意见，侃侃而谈，心里很喜爱他，但不赞同他的方案，于是说道：“我本出身于中产之家，只因见到统治者欺压农民太甚，我才起来造反。现在浙东受欺压的百姓还很多，不把他们先行解救出来，我心不安。”

吕将说道：“听说圣公在誓师之夜，就曾经计划过：江南列郡，一鼓而下，我军据有江表，划江而守，十年之内，可图全国统一。这个正确计划，圣公可不要改变呀！”

方七佛看到两人都说得有理，谁也说服不了谁，就建议道：“圣公，北进的事，交给我好了。现在苏州的石生，已经起来，确实很需要支援。给我三万人马，我先打下秀州（今浙江嘉兴），然后直插苏州，夺取金陵。”

方腊说：“好！给你六万，去打秀州。吕将守杭州。郑魔王南下攻婺州（今浙江金华），我随后也去。”

当召开这次军事会议时，童贯还在江北。义军没有认识到先取金陵的意义，而老奸巨猾的童贯却看到了，这是义军的一个失着。义军虽然英勇作战，东拚西杀，甚至又打下了浙南重镇婺州和处州（今浙江丽水），但放松了对整个战局具有决定意义的北线，终于不能顶住自北而南压来的官军，在军事上逐渐被动起来。

杭州军事会议后，方七佛率领义军在秀州城下苦攻四日，没有得手。童贯的军队却已经渡过长江，扑灭了苏州的农民义军，迅速顺运河南下，绕到方七佛的背后，占领海宁和崇德，把六万义军包围在秀州、海宁、崇德之间一个狭小的三角地区。形势对义军十分不利，打下秀州已不可能，退回杭州的路又被切断。方七佛和全体义军浴血奋战，从北边冲出包围，到了离太湖不远的一个小镇——桐乡县乌镇，部队已损失了四万人。

乌镇百姓象接待亲人一样接待义军的到来，立即烧水煮饭，给伤员换药喂水。已经一整天没吃一点东西的义军，流着热泪大口地吃着热菜热饭。乌镇百姓要义军在镇上住下。方七佛负了重伤，他挣扎着从船里上岸，对乌镇百姓说：“感谢父老兄弟姐妹，我们不能在这里久停，马上就要冲过官军的封锁线，回杭州去。将来我们还要打回来的。”

一长串船只向南摇去。天正下着密密的雨，几千乌镇百姓依恋不舍地站在岸边流泪送别。后来，就在这岸边，乌镇百姓筑了一座亭，叫做“哭送亭”，亭边柳枝飘拂，好似招唤着远方的义军重来。

城 楼 斥 降

重寨率领着京畿禁军和辛兴宗、杨惟忠的黑河兵尾追方七佛，到了杭州外围。

这时，方腊已从南线战场赶到杭州，立即部署加强城防，准备歼灭来犯的官军。

方腊在城头上巡查，看到义军同杭城老百姓正在一起加固工事。方腊从一个手臂负伤的义军小战士肩上抢过一块大石头，放在城垛上，然后回过身来关切地问：“小兄弟，你在哪里受的伤？”

“秀州城下。圣公，我砍死了六个官军。突围时被恶狗咬了一口，现在已快好了。”

方腊很高兴地称赞他，并指着城外说：“恶狗跟上来，作好准备，狠狠打它们。”

“圣公，今天早上从城外射进来一支带信的箭，说是姓赵的皇帝要我们放下武器。”

方腊故意逗他，“你看怎么样？”

“打！”小战士毫不犹豫地回答，“我们不是软骨头，娘老子给我生下的膝盖骨，是从不向敌人下跪的！”

正说着，方七佛抓来了一个穿宋朝官服的家伙，掷在方腊脚下。这家伙爬起来，哇哩哇啦叫着，“我是皇朝命官，我要面见你们首领。”

方腊喝住他，“你来干什么？”

这家伙被方腊的威严镇住了，嗫嗫嚅嚅地说：“我，我是奉命而来，不关我事。皇上发出了诏书”，说着从口袋里拿出一张纸来，“皇上姑念你们出于生活所迫，听信奸邪……”

方七佛在一边大喝一声，“住口！你敢胡说八道，我就把你撕碎！”

方腊向方七佛摆摆手，对吓得瘫在地上的宋官说：“说下去，看你那张嘴里还能放出些什么好东西来。”

宋官壮壮胆，继续说，“皇上体恤民间疾苦，已经下了‘罪己诏’，撤销‘花石纲’，并且撤了朱勔的职。东南百姓沐浴皇恩，从此可以回乡安心耕织了。”

方腊冷笑一声，“这是被我们农民义军打怕了，不得不装模作样，实际全是欺骗。我问你，既然停止了‘花石纲’，为什么汴京还在劳师动众，大造什么‘万岁山’？为什么中原大饥而帝王将相照旧过着春花秋月的生活？为什么姓赵的皇帝至今还用百姓汗水供养着两万个道士给他祈寿延年？这叫做体恤民间疾苦？这便是沐浴皇恩？”

宋官说，“大王不要用这样的火气对待皇上。皇上对你们宽大为怀，只要接受招安，就不咎既往，还可以封官赐爵，到那时，大王对万岁山的观感就会不同于今日了。”说完，斜着眼看方腊的脸色。

方腊手扶剑把，大声笑了起来，“呵呵！只要投降了，就给官做，还可以到皇帝的万岁山上去逛逛，是这个意思？妙极了！可是我这剑”，他敛住笑，把剑从鞘里拉出半截，“是陆

州一个老铁匠亲手打就，交给我的，要我为穷苦百姓出力。我可没那个心思逛什么万岁山！迟早有一日，我会把它一脚踏平，把你们那赵家皇帝一锅端！”

宋官见势不妙，起身想溜，但还没有死心，又说：“大王，还有个消息奉告，山东大盗宋江三十六人，去年十二月已在海州接受了招安，皇上封宋江做了节度使。宋江这个人真不愧为识时务的俊杰。大王对这件事，有何感想？”

方腊怒火万丈，两道浓眉陡地竖起，圆睁大眼，右手猛地掣出佩剑。方七佛飞起一脚，把宋官踢翻在地，一只脚踩住，正要伸手去抓刀，那个负伤的小战士手快，举刀就要砍。方腊一摆手：“慢！留个活口，让他回去报信。告诉陶童贯，我们是顶天立地的农民义军，同赵家皇帝、贪官污吏都是死对头。想要我方腊出卖穷人利益，领着百万弟兄投降，休想！谁用穷人的命运给自己换一顶乌纱帽戴，谁就要受千年骂，万代恨，落不下一个好收场。回去就这样向你们主子说。滚吧！”

方七佛象抓小鸡一样，抓起宋官，飞步走下城楼，穿过吊桥，将宋官摔出十几丈远去。

“哈哈……！”城楼上的义军都痛快地大笑起来。

血战帮源

诱降不成，童贯采用帐前小校韩世忠献的诡计，在北关堰伏击义军，占领了钱塘。义军便坚守杭城，不再出战。童贯为了等待后军王涣来到，也暂时按兵不动，只把杭州密密围了起来，切断了它的一切外援。城中粮食很快就发生恐慌。等了十天左右，王涣赶到了，宋江这个无耻叛徒背叛了农民革命的事业，也率领军队到了杭城前线，童贯才下令攻城。方腊率领八万义军苦战六日，终因城中断粮，只得下令分批突围。二月十八日，方七佛率领最后一批义军二万人突围，遭到官军重重阻击。义军前赴后继，大部壮烈牺牲，只剩千余人跟着方七佛杀出重围，追上方腊率领的部队，经过富阳、桐庐、睦州，节节向根据地帮源洞撤退。三月二十七日，王禀攻下了睦州。

皖南三月，春水涨了。驻守在歙州的八大王，牵挂着新安江上游的战事消息。他恨不得让江水把他送向秦去，狠狠同敌人拚杀一阵。实际上在这时，一场恶斗也已向他逼近。

童贯早在进攻杭州时，就命令守金陵的刘延庆，派他的部下刘镇、杨可世，从江东进入安徽，占领皖南，摸向义军根据地的背后。三月初，刘镇、杨可世沿青弋江河谷突袭泾县。接着，杨可世从泾县进攻旌德县，刘镇从宣州进攻宁国县，两股敌军形成了对歙州的钳形攻势。八大王与敌军大战于歙州城下，不幸城破。八大王又在城外的潘村设下埋伏，与敌人鏖战到半夜，给了敌人重大杀伤，但八大王自己也负了重伤，只得退向帮源洞。刘镇、杨可世紧紧追来。

童贯就这样从睦州和歙州的东、西两线，同时扑向义军根据地帮源洞。各地义军急急赶来支援，但受到了官军的拦截牵制。四月十九日，王禀占领黟溪。二十三日，刘镇、杨可世首先到达帮源洞南口，按照预先约定的信号，放起了烟火。这一股黑色的烟火，象一面招引鬼魂的黑幡，把各路宋军都引到帮源洞来。

南口的黑幡，引来了王涣和他的裨将宋江等一路人马。王涣一直是作为王寨的后军，跟在人家屁股后面拾破烂，运死尸，窝囊得很。叛徒宋江，也急于想在“讨”方腊战斗中卖点力气，以报效主子。南口的烟火一举，意味着升官迁爵的最后机会到了。于是王涣率领着马公直和裨将赵明、赵许、宋江，急急赶来抢功。

南口的黑幡，引来另一路三万官兵，带兵的是黄迪和刘光弼，他们是童贯特地派来参加围攻帮源洞的。

南口的黑幡一举，急死了王渊部下的韩世忠。这个小校在杭州献了一条诡计，升为偏将，官瘾越来越大。一见烟火升起，就带了自己挑选的五十名亡命之徒，抢先向南口奔去。

见到了南口的黑幡，王寨倒抽了一口凉气。老而贪功的辛兴宗更大为光火。他是王寨部下的前军，满以为这次稳得头功，不想被西路军占了先，于是死命地催部下往前赶路。

四月二十四日黎明前，五路官军三十万人马，把帮源洞重重叠叠包围起来。二十万义军，集中在帮源洞，在方腊亲自指挥下，展开了一场惊心动魄的根据地保卫战。

方腊扼守着帮源洞南口的箭门岭。官军把炮车推到岭下，朝着山岭放炮。浓烟烈火笼罩山头，成群宋军就开始爬山。当他们爬近山口，义军突然从烟火中冲出来。方腊舞着他著名的“火刀”，浑身象一团烈火，成批敌人倒在山坡下。箭门岭激战一日一夜，岭下枕藉着三万多具官军尸体，义军自己也牺牲了一万多名。由于箭门岭内陡外缓，利于攻而不利守，方腊下令翻过松毛岭，向严家溪滩撤退，在那里同另一路优势的宋军相遇，大战一场，方腊的坐马战死，刀也丢失，最后退往洞里。宋军大发兽性，又烧又杀，使根据地“流血丹地”，义军十多万义士壮烈牺牲。黑夜，各山头上依然听到刀剑格斗声和义军震惊山谷的喊杀声。直到天明，声音才渐渐沉寂。王寨下令搜山。官军见屋就烧，见人就杀，百姓被害的何止成千上万。据地主阶级文人的记载，汤岳、榴树岭一带八十五里，九村山谷相望，吊死和杀死的人不知其数。尽管敌人这样残杀，他们还是找不到方腊潜居的秘密洞口。

韩世忠带了五十个敢死队满山搜索，不知道洞口在哪里。但是，那个在方腊起义时向官军告密的方庚，在青溪隐匿了很久，这时又冒出头来，充当封建王朝的鹰犬。韩世忠这才找到了洞口，摸进洞窟，和守在洞口的义军格斗起来。激烈的刀剑声惊动了正在洞里养伤的八大王，他提了一把刀赶出来，迎面遇上韩世忠，奋力砍去。韩世忠带来的敢死队，杀死了守门义军，向八大王一拥而上，把他裹在中间。八大王箭伤还没有好，同几十名敌人格斗很久，终于力尽扑地，被敌人擒住。

洞里黑森森地，深不可测。韩世忠已经被八大王砍了一刀，污血满脸。他不敢再往深处走了，蹲在洞口，把自己带来的几十个亡命之徒往里赶。只听得洞底传来“乒乒乓乓”的刀剑声，夹杂着撕裂人心的叫声。一会，声音消失了，从洞里丢出来几具尸体，韩世忠一看，全是自己的部下，就又把第二批人赶下去，接着又激烈地传来砍杀的声音。宋军后续部队大批涌来，一批批地跳进洞去，整整打了几个时辰，方腊虽然英勇，怎禁得敌人这样轮番进攻，最后终于被宋军缚住，妻邵氏、子方毫，和部将方七佛、吕将，也陷落在敌人手中。

韩世忠钻出洞外，劈面遇到辛兴宗。韩世忠打了一躬，吹牛道：“末将单身入洞，生擒得

(下转 23 页)



灵牌小议

延 风

《水浒》第六十回中有一段描写：晁盖死后，宋江在忠义堂上设了个晁盖的灵牌，上写道：“梁山始祖天王晁公神主”。这虽是件不起眼的小事，但其中的奥妙是颇值得议论一番的。

灵牌，又称神主牌位，这个东西对于现在的年轻人是很陌生的。人死了，弄块木板写上死人的名字，让活人对着这块木板烧香叩头，这不是很好笑么？但对反动统治者来说，却是桩神圣而又庄严的事情。灵牌的发明人相传是周武王，这个西周奴隶主头子曾载着他老子的灵牌去攻打殷纣王。孔丘及其弟子更是一群灵牌迷，他们把灵牌的祭供作为一种专门的学问，不厌其烦地规定了天子、诸侯、大夫等各级奴隶主灵牌的各种尺寸规格。在封建社会中，灵牌更是风行一时。《红楼梦》的“宁国府除夕祭宗祠”，就描写了贾府老爷、少爷、太太、小姐们在香烟缭绕中向着—长串灵牌下跪叩头的情景。反动统治者对灵牌如此虔诚，与其说是为了悼念死者，倒不如说是为了吓唬活人。死去了的统治者既然统治着天国，那末，对人间统治自然就理应由他的子孙们所继承。父死子袭，兄终弟及，这用孔孟的语言来说，就叫作“正统”。谁有资格供奉灵牌，谁就是正统的继承人。因此，休小看了这块小小的灵牌，它上面集中地体现了封建的君权、族权和神权，是封建统治者加在中国人民身上的沉重的精神枷锁。

农民要造反，就必须劈碎这些大大小小的灵牌。历史上的起义农民，将什么“先帝”、“先师”的灵牌摔到了地上，砸的砸，烧的烧，好不痛快。但是，这种作为封建制度象征的灵牌，居然被宋江搬上了起义农民的梁山；而作为农民起义领袖的晁盖，在死后居然被人们象对待封建统治者那样地进行顶礼膜拜。这是对晁盖的纪念吗？不，这是对晁盖的亵渎。晁盖临终遗言：“若那个捉得射死我的，便教他做梁山泊主！”直截地否定了那种“父死子袭，兄终弟及”的“正统”观念，肯定了只有带领弟兄们坚持向封建统治者作斗争的人才资格充当梁山的领袖。宋江设立了晁盖的灵牌，则是对晁盖否定“正统”观念的再否定。这是一种复辟行为。宋江制造晁盖对于梁山的“神权”，目的是为了实现在自己对于梁山的“君权”。宋江每日“领头”向着晁盖的灵牌“举哀”，也就意味着他在梁山的一切事务上成了“当然”的“头领”。在梁山上，晁盖是老大，宋江是老二。老大死了，兄终弟及，梁山的总头

领,舍宋江其谁?

自然,宋江对于设灵牌这一封建制度是作了一点“改良”的。在这块灵牌上,写的不是“先帝”、“先师”,而是梁山的“始祖”即创始人“天王晁盖”。宋江要继承晁盖的“头领”地位,根本不是为了继承晁盖的革命事业,而是为了背叛和瓦解晁盖的革命事业。但是,梁山的起义农民是拥护晁盖的,他们是善用坚持起义的实际行动来纪念晁盖的。宋江不能公开打出反对晁盖的旗号,于是就供起了晁盖的灵牌,打出晁盖的旗号来反对晁盖。从表面上看,宋江对晁盖之死比任何人都要伤心,“如丧考妣”,“哭得发昏”;实际上,他恶毒地将群众对于晁盖的纪念转移到向着晁盖牌位作祭祀祷告等形式主义的封建仪式上面,使之从中得到某种安慰和满足;而晁盖要求大家坚持斗争的遗言,则根本绝口不提,以便让人们在记忆中逐渐淡忘。归根到底,他将晁盖奉若神明,目的是为了借用晁盖的名义搞背叛晁盖的勾当,使自己的修正主义活动合法化。

列宁指出:反动阶级在革命家逝世以后,“便企图把他们变为无害的神像,即所谓把他们偶像化,赋予他们的名字某种荣誉,以便‘安慰’和愚弄被压迫阶级,同时却阉割革命学说的内容,磨灭它的革命锋芒,把它庸俗化。”宋江正是依靠晁盖的灵牌这个“无害的神像”的帮助,轻轻巧巧地篡夺了革命的领导权,把聚义厅改成忠义堂,葬送了晁盖所创建的轰轰烈烈的梁山农民革命事业。

然而,晁盖的灵牌也有使宋江胆战心惊的一面。灵牌固然可以蒙蔽梁山的英雄们,使他们天真地以为宋江是晁盖革命事业的忠实继承者;但是,当宋江公开暴露了他的叛徒面目以后,灵牌也很有可能引起人们对革命领袖和正确路线的追忆和怀念,逐步地从宋江的愚弄中醒悟过来,重新举起革命造反的大旗,与他所推行的投降主义路线实行彻底决裂。这是宋江这个投降派所最害怕的。因此,一旦招安成为事实,宋江就迫不及待地一把火将晁盖的灵牌烧毁了。

凡是革命阵营内部的投降主义者,当他的阴谋尚未能完全实现时,为了欺骗群众,总是既要当婊子,又要立牌坊,既要做投降派,又要冒充革命派。但当他公开叛变革命、投降敌人以后,就不仅疯狂地镇压和屠杀革命派(包括原来在一起而后来仍继续坚持斗争的同伴),而且大多患有严重的神经衰弱症,见了与革命有关联的东西就感到害怕。正是从这种心理出发,死去的晁盖才会引起活着的宋江如此惊慌,连见了自己设立的晁盖灵牌也会心惊肉跳,非得一把火烧掉了才放心。《水浒》的作者以为一把火烧掉了晁盖的灵牌,就可以烧掉了梁山农民军对晁盖及其正确路线的追忆,烧掉了人们头脑中的革命思想而代之以投降哲学。这只能是作者的痴心妄想。有压迫,就有反抗。历史的宋江在投降后,没隔几年,梁山农民军的余部就在史斌的领导下重又举起了革命的大旗。正如鲁迅所说的:“石在,火种是不会绝的。”(《且介亭杂文二集·“题未定”草》)

宋江害怕晁盖而又利用晁盖,供奉灵牌而又烧毁灵牌,这种卑劣的反革命两面派行为是很值得革命的人们加以研究的。宋江如此,赫鲁晓夫如此,古今中外的一切修正主义者也都莫不如此。我们应当充分重视利用《水浒》这部反面教材,从对反面教材的批判中引出有益的正面经验来。

搞好大学的科学研究工作

复旦大学教育革命组

搞好大学的科学研究工作，是实现“教育必须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必须同生产劳动相结合”的一个重要方面。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来，我们不仅坚持开门办学，搞好各门学科的教育革命，同时对大学的科学研究领域也进行了较大的改革。

搞好大学的科学研究工作，最根本的是要解决一个为什么人的问题，也就是科学研究的方向问题。文化大革命前，旧复旦大学科研项目也搞了不少，但由于方向路线不对，脱离三大革命实践，对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益处不大。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批判了修正主义的科研路线，使我们认识到：科学研究工作必须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与生产劳动相结合，才能具有广阔的前途。

要无产阶级政治服务，首先就有一个科研项目哪里来的问题。文化大革命前，大学的科学研究工作往往不立足于我国三大革命运动的需要。拿我校生物系来说，文化大革命前，在修正主义路线统治下，科学研究工作“只搞名、古、洋，不搞油、棉、粮”。因此，贫下中农批评说：“你们这个专业、那个专业，就不服务于工农业，这个系、那个系，就是和工人农民没关系。”文化大革命以来，广大革命师生在开门办学的推动下，根据农业生产的需要，到上海县北桥公社和贫下中农一起开展关于虫害预测预报的研究工作。几年来，对近百种虫的形态和生活习惯进行了观察和记录，总结了上海郊区虫害发生的规律和防治经验，及时向各人民公社提供虫情预报，还同苏、浙、皖等邻省八十多个科研和农业生产单位建立了经常的联系。又如数学系，在过去历来是“一张纸，一支笔”，“论文几十篇，实际不油边”，现在，他们开门搞科学研究，帮助有关石油开采部门进行石油藏量和选定井位的数据处理，得出了较为精确的结论，为开发我国石油资源作出了贡献。正如恩格斯所说：“社会一旦有技术上的需要，则这种需要就会比十所大学更能把科学推向前进。”几年来，我校理科各系共承担了和工农业生产（包括新兴工业和尖端项目）有密切联系的二百多个研究项目，其中一半已经基本完成。事实证明，综合性大学的科学研究工作，也必须坚持从实

实践中来,到实践中去,才能具有旺盛的生命力,真正做到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

强调科学研究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还必须重视开展基本理论的研究。毛主席指出:“真正的理论在世界上只有一种,就是从客观实际抽出来又在客观实际中得到了证明的理论”。理论从实践中来,反过来又对实践起着重要的指导作用。因此,必须立足于三大革命实践,兼顾眼前需要和长远需要,积极开展基本理论的研究工作。随着工农业生产的发展,不断地对基础理论的研究提出了新的要求。例如,为了提高各种光源的质量,开辟发展新光源的途径,我校光学系开展了对惰性气体和金属蒸汽放电的研究,其中包括化学、动力学、光谱学等方面的基本理论问题。同时,对于国内外有影响的重大课题,如生命起源,天体演化,时空理论,等等,我们也都组织了适当的人力进行研究。任何一门自然科学理论,都有一个以什么世界观为指导的问题。在这个领域里,两种世界观的斗争历来是十分激烈的。几年来,理科师生认真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持续不断地对自然科学领域的唯心论和形而上学开展了革命的大批判,有力地推动了自然科学学科的改造。

科学研究的开展,对于专业的改造、教材的革新、实验室和校办工厂的建设、多种形式办学以及教师队伍的培养等,都起着积极有益的作用。比如,化学系物理化学教学小组和高分子七二级学员到上海溶剂厂开门办学,当他们了解到这个厂甲醛生产催化剂工艺副反应多、转化率低、原料消耗高时,他们就决定把这个课题作为自己的科学研究的项目。把科研和教学结合起来,不仅为我国甲醛生产实现高效低耗创造了有利条件;而且,教师结合这项典型产品进行教学,学员从实践中提出问题,师生共同研究讨论,打破了过去“满堂灌”的现象。又如信息论教研组在参加勘探石油的会战过程中,编出了理论与实际统一的新教材;光学系在电光源和激光的科学研究的基础上,根据国家需要,从无到有,较快地建设起电光源、激光两个新专业。由此可见,搞好大学的科学研究工作,对于推动教育革命的深入开展是十分有利的。

为了正确处理科学研究和教学的关系,我们还根据需要建立了教学、科研、生产三结合的体制。科学研究队伍在编制人数上占教师总数的百分之二十五左右。他们以科学研究为主,也参加一些教学工作。搞教学的教师,也要承担一部分科学研究的任务,这两部分人进行定期的轮换。此外,还要轮流参加社会调查、短训班和函授班教学,到工厂、农村、“五·七”干校进行学习锻炼。科研与生产也是相辅相成的两个侧面。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我校先后建起了“四·一”综合电子仪器厂、石油化工厂、光学工厂等校办工厂,还加强了电光源、计算机等实验室的建设,这些校办工厂和实验室不仅为师生提供了理论联系实际的教学基地,也成了重要的科学研究的基地。“四·一”工厂先后承担了大小几十项科研项目,试制成一批性能好、用途广的线性集成电路、中规模集成电路以及小

型多功能电子计算机。

搞好大学的科学研究工作，还必须大搞群众运动，坚持开门搞科学研究。毛主席早就说过：“什么工作都要搞群众运动”。科学研究是关门还是开门，是发动群众来搞还是由少数人包办垄断，这是区别毛主席革命路线和修正主义科研路线的一个标志。科学研究不仅要充分调动教师的社会主义积极性，而且要充分发挥校办工厂工人、工农兵学员的作用，大搞群众运动，才能搞得生气勃勃，进展显著。例如研制中、大面积集成电路，是难度较高的一个科研项目。开始时，承担这个项目的有关教研组与车间没有拧成一股绳，力量分散，进展缓慢。在批林批孔运动推动下，改变了过去各管各的现象，成立了由工人、工农兵学员和教师组成的战斗队，以校办工厂为战场，连续作战，终于在较短的时间内试制成具有六十四种功能的“四位算术逻辑单元电路”，在中大规模集成电路试制上迈出可喜的一步。几年来，我们还与社会上的工厂和科研单位对十多项国家重点科研项目进行会战，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今后，我们要充分利用综合大学多科性的特点，组织好校内外的协作，共同完成国家交给的重大科研项目。

开门搞科学研究，还必须把科学研究的成果及时应用到工农业生产中去。这里就有一个在提高指导下的普及和在普及基础上的提高问题。把科研成果普及推广到生产中去，实际上是发动群众检验科研成果的过程，也是吸取群众经验进一步丰富发展科研成果的过程，这样的普及本身就包含着提高。实践证明，举办各种类型的短训班，是普及推广科研成果的一种好形式。化学系分析组为了解决工业部门测定汞污含量问题，试制成功一种有自己特点的 F732 汞测仪，灵敏度与原来的汞测装置一样，而价格却从原来的上万元缩减到几百元。为了推广这项成果，他们在市治理三废小组的支持下，与分析仪器厂等单位协作，举办了微量汞测分析短训班。来自自来水公司的学员带来各种水源，来自医疗单位的学员带来血、尿、头发等样品，要求分析各自的汞含量。短训班虽然只办了十天，却解决了实际部门不少急需解决的问题，汞测仪也得到迅速推广。电光源实验室推广新产品镝灯的短训班，信息论组关于地震勘探方面的短训班，也都收到了显著的效果。

“思想上政治上的路线正确与否是决定一切的。”为了使学校的科学研究工作适应社会主义建设的新高潮，需要进一步加强党对科学研究工作的领导。我们决心在党委领导下，坚持党的基本路线，狠抓科研工作中两条路线两种世界观的斗争，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勤俭建国的方针，坚持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方针，同时对学校的科研工作制定一个长远规划，使学校的科学研究工作不断沿着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前进。

翻砂工人话革新

任 菁

一提起翻砂，人们自然就会联想起旧社会流传的一首歌谣：“要说苦中苦，翻砂打铁磨豆腐”。今天呢，翻砂行业的面貌与过去大不相同了。翻砂工人用这样几句话来概括：“学理论，做主人，技术改造抓得紧，生产面貌日日新。”

开 路 先 锋

翻砂，也称热加工，是机械工业的头道工序。所以，翻砂工人总爱把自己的工作形象地比作“开路先锋”。

在机械工业中，金属切削和机械安装称作冷加工。热加工和冷加工是一前一后的两大工序，有时就不免闹些矛盾。机电一局铸造行业组的同志给我们讲了这样一件事：有一年，这个局冷加工实际需要的铸件是四十八万五千吨，而生产能力却只有四十一万吨多。缺口这么大，势必造成铸件供不应求，结果是红彤彤的铸件刚刚成型，冷水卜卜一浇，就被运去冷加工，这就影响了产品的质量。有一次，一架注塑机的底座就因为这个缘故而造成内壁有了裂纹，冷加工时没有发现，当注塑机出厂后，一经运输途中的颠簸，底部竟裂开了。

为什么会产生这种矛盾？翻砂工人告诉我们，从现象上看，是由于翻砂跟不上冷加工引起的；其实，根子还在技术改造的脱节上。前个时候，冷加工技术改造的步子上得快，而作为“开路先锋”的翻砂行业的技术改造却没有能够跟上。“开路”的没有把“路”开好，后面的当然就顶着你屁股上来了，这怎么会不闹矛盾呢！

这件事告诉人们：“开路先锋”要真正开好路，当好先锋，抓好行业的技术改造是何等重要！上海数以万计的翻砂工人，从这样一件件具体事例中，认识到自己在整个工业生产中的地位和作用，看到加快技术改造步伐的迫切性和重要性，下决心主要依靠自己的力量来改变原来的落后面貌，当好名副其实的“开路先锋”。

同 样 与 不 同 样

翻砂行业的技术改造，称得上是一场对传统的翻砂生产技术的革命。工人同志在回

顾他们走过的路程时说：这个行业里面可真是五花八门呢！比如，全市三百多家翻砂厂和翻砂车间，就遍布各行各业；它们生产的产品，小的只有几两重，大的要有几十吨乃至上百吨；多的一年生产几百万件，少的只几件。因此，整个行业的技术改造如果企图搞一个统一的“标准”、“系列”，结果就非碰壁不可。

那末，翻砂行业技术改造的门路究竟在哪里呢？上海科技交流站负责全市铸造技术交流工作的薛文钦师傅说得好：尽管整个翻砂行业里面包含着各种“不同样”，但它们仍然是有头绪可抓的。一般来讲，大批量的小件产品属一类，小批量多品种的中小件产品属一类，零星的大件产品又属一类。正确认识这些“同样中的不同样”，一把钥匙开一把锁，对于翻砂行业的技术改造是很重要的。就拿缝纫机厂来说，它所生产的就属于大批量的小件产品这一类。这类厂的技术改造，主要采取搞自动流水线的办法。过去，大多数缝纫机厂只有单台的造型机，这比之于手工操作当然大大进了一步。可是，这种机器只解决了整个翻砂中一道工序的手工操作；一道工序上去了，前后道工序的压力很大，往往要耗费更多的人力去做辅助性劳动。后来，这类厂进一步对前后道工序作了改造，把从混砂到浇铸、开箱等工序连成一条“龙”，试制成了一种四立柱震压式造型机的流水线。当我们来到上海缝纫机二厂的这条流水线旁时，只见运输带缓缓驰行，机械手灵巧工作，一道道工序配合得井然有序。正在操作的工人告诉我们：过去，翻缝机上的车壳，一组造型机一天只能生产三百五十只，现在搞出了这条流水线，一天就可生产三千六百只。

在上海机床铸造厂，我们看到的却又是另外一副情景：这里没有一条流水线，却有两种机器特别吸引人：一种是每分钟转速一千四百转的抛砂机，从它嘴里喷出来的砂直冒火星，就是它，可以代替人工一锹一锹地铲砂和捣固机把砂在砂箱里捣结实的工作。另一种是有二、三十个大气压力的水力清砂机，它靠高压水的冲力，把粘结在铸件上的砂冲刷得干干净净。原来，这个厂主要是生产机床成套设备的铸件，批量小，品种多，大的有几吨重。如果搞流水线，模具杂七杂八，换上换下很不方便。何况铸件大，流水线也驮不动。于是，他们就遵照毛主席关于“着重于捉住主要的矛盾”的教导，针对目前厂内劳动强度较大又是生产上薄弱环节的造型、清砂这两道工序，开展技术改造。俗语说：“一吨铁水三吨砂”。抛砂机搞成功了，就甩掉了铲砂和捣固砂的繁重体力劳动。清砂采用水力后，用不到象原来那样用凿子凿、榔头敲了，改善了劳动环境和劳动条件，又提高了清砂的产量和质量。这就给翻砂行业的技术改造开拓了一条新路。

当然，抛砂机也好，水力清砂机也好，都不是万能机。拿抛砂机来说，碰到特大的铸件，砂箱就有五六米高，抛砂机连头都够不上；即使够上了，要把砂抛到五六米深的箱底，也早有气无力了；如果遇上凹凸不平和弯弯曲曲的铸件，抛砂转不了弯，就更是英雄无用武之地了。怎么办？专门和大型铸件打交道的上海造纸机械厂的翻砂工人，就在改革型砂上动脑筋。他们试验成功的自硬砂造型，只要将一种特制的砂装满砂箱，经过短时间的停放和微震，型砂就会自己变得坚实而成型。你看！流水线和抛砂机行不通，却从型砂改革上又闯出了一条新路。翻砂工人的创造性可真是无穷无尽的呵！

在翻砂行业的技术改造中，你有你的打法，我有我的打法，真称得上是“八仙过海，各

显神通”。这不禁使我们想起，每个行业都有自己的特殊性，即使同一个行业中也不可能千篇一律。这些“同样中的不同样”，必然会给技术改造带来困难。但只要具体分析，抓住了矛盾的特殊性，总能找到切实的解决问题的方法。翻砂行业的工人群众，学习和运用毛主席哲学思想，正是从实际出发，战胜了各种“不同样”的困难，才使技术改造搞得千姿百态、气象万千！

其实，矛盾的特殊性中也寓有矛盾的普遍性，“不同样”中也有“同样”。翻砂，不管有怎样的特殊性，总是前后十一道工序，这就有可能使我们在运用特殊方法对付“同样中的不同样”的同时，运用一般方法去解决“不同样中的同样”。确实，过去翻砂厂的混砂、熔炼、落砂和清理等工序，都靠手工操作，现在制造成功了辗转式混砂机、风力运输设备、电磁吸铁盘、水力清砂机和水爆清砂等，这对“不同样”的翻砂厂的技术改造就都带有普遍的意义。正是从这一点来说，各行各业开展技术改造，不也都能从中得到启发吗？

不怕底子薄

我们在上海科技交流站参加了一次小型座谈会。座谈的主题是：翻砂行业技术改造的力量从哪里来？

翻砂行业技术力量的底子很薄，在某些人眼里，要搞流水线，造这样那样的机器，就非得先有一支掌握电子技术、机械技术的队伍不可。否则，让翻砂工人自己来唱主角，只能是“竹篮打水一场空”。真的是这样吗？不。上海马铁厂党支部书记陈彩明同志就在座谈会上这样地谈了自己的看法：底子的厚和薄是相对的。在一定条件下，底子厚的不一定就上得去，底子薄的也未必不能办大事情。文化大革命前，我们厂曾请了一位所谓技术专家和一位苏修铸造专家来作指导，“底子”总算不错吧！但这些人到厂里兜了几圈，便大泼冷水：“这里场地小，没有条件搞机械化”，“你们厂这样生产就行了，用不着搞什么流水线。”要说有这样的“底子”，那么它再厚也等于零。后来，工人群众在毛主席革命路线指引下，怀着对摆脱笨重体力劳动和改变落后生产面貌的强烈愿望，边学边干，大胆实践，终于使底子薄逐渐向底子厚转化。现在我们厂里，由工人们自行设计、制造的自动造型流水线犹如百舸竞发，代替了昔日繁重的手工操作，在生产上越来越发挥出巨大的作用。

接着补充发言的是马铁厂的工人技术员戴景贤。他说，在技术改造中决不能轻视操作工人的实践经验。翻砂工人固然对机械、电子等技术不熟悉，但在翻砂技术方面却是内行。如果我们注意创造条件让这批“土生土长”的技术力量发挥自己的特长，并通过学习逐步克服原来的缺陷，便能使技术改造搞得更符合生产的实际需要。譬如，我们厂在设计一条挤压自动造型流水线时，碰到了制造一百只加工难度高、结构复杂的凸轮传动部分的难题，广大工人、技术员和领导三结合，从生产实际出发，根据实践经验，大胆提出了用一台旁磁制电动机和十八只继电器代替凸轮的设想，对流水线的机械结构和传动方式进行了改革，终于获得了成功。改革后的自动造型流水线与同类型的进口设备相比，造价降低了百分之六十，效率提高了百分之十六。

翻砂工人出身的上海机床铸造厂党支部书记陆关元同志也谈了自己的体会。他说：翻砂行业由于生产比较紧张，许多工人都是“一个萝卜一个坑”，在这种情况下，要从生产前方抽调一部分力量来加强技术后方，确实是一个矛盾，也是对我们的一种考验。拿我们厂来说，总共五百多人，现在已初步形成了一支六十多人的技术改造的骨干队伍。把这么多人从生产前方抽下来，当初不少同志是有顾虑的。我们支部开会商量，觉得如果技术力量薄弱的局面不改变，给生产带来的影响就会更大。一时有所失，长远有所得；一时有所得，长远可能有所失。事实也正如此。后方的技术力量由“底子薄”变成“底子厚”，前方生产就出现了大幅度增长。比如，过去由于没有能力搞技术改造，设备得不到经常的维修和保养，一出故障，生产就只好停下来，现在这种情况几乎没有了。过去生产中劳动强度高的薄弱环节经常要拖后腿，现在搞了技术革新，革掉了手工操作的命，提高了机械化自动化程度，就进一步挖掘了生产潜力。我们作了一个对比：全厂每个工人一年的翻砂总量，一九六五年是七十三点六吨，今年七月份已提高到一百二十三点七吨。在厂里，大家就把这种适当抽调生产工人来加强技术后方的做法，叫作“磨刀不误砍柴工”。

上海许多翻砂厂的厂房面积狭小，条件很差。工人们风趣地说这类厂搞技术改造好象“螺蛳壳里动刀枪”。在这方面，中华冶金厂的王财根同志作了动人的介绍。他说，我们厂场地紧张，拥挤得“水泄不通”。好几次，用于技术改造的造型机和射芯机已经到厂了，但由于没有地方安装，只好“打回票”。我们曾采用水爆清砂的新工艺，可是铸件一到水里，“蓬”的一声巨响，四周象发生地震一样，居民可真吃不消。这也不行，那也不行，就逼得我们上“梁山”，外出取经学习，回厂自己动手试验了翻砂不用砂的磁丸造型新工艺。现在这种新工艺基本试制成功。它省去了混砂、翻砂、清砂三道工序，把三只最大的占地“老虎”给赶跑了；由于磁丸造型是用泡沫塑料作模型的，它很轻，也就可以把一向只能在底层加工的木模工序搬上楼，这就打破了历来翻砂行业“不能利用高度空间”的陋习，使生产面积得到了较充分的应用。工人们讲，原来认为场地小搞不了技术改造，谁知这样一逼，倒逼得我们搞出了生产效率高、占地面积小、劳动强度低、工作环境好的新工艺，使翻砂行业的技术改造又出现了一片新天地，真是“草窝里能飞出金凤凰”。

座谈会上的发言，用事实批驳了“底子薄就只能永远是底子薄”的形而上学观点。广大翻砂工人正是运用辩证唯物论，承认事物的对立统一，促使矛盾着的双方在一定条件下向它的反面转化，使底子薄转化成为底子厚，不断取得了技术改造的成就。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马克思主义哲学一旦为广大群众所掌握，能产生多么巨大的威力啊！

路线的正确与否决定一切

我们的调查访问越深入，感受也就越深。翻砂行业的工人群众为什么能够克服种种困难把技术改造搞上去？回答是：有毛主席革命路线的指引。

让我们从上海缝纫机二厂三条不同的流水线说起吧。这三条流水线，清晰地记载着工人群众贯彻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开展技术改造的前进脚印。第一条震压式造型机流

水线,是在大跃进的锣鼓声中诞生的;第二条四立柱震压式造型机流水线,是在文化大革命的高潮中建成的;第三条无箱挤压造型机流水线,又是批林批孔运动的产物。

厂党委书记徐汉清同志告诉我们:“这三条流水线,一条比一条先进。怎样使它们更上一层楼,这里就有一个路线问题。”他带着我们来到四立柱震压式造型机流水线旁,继续说:“拿这条流水线来讲,刚建成时有不少缺陷,运转起来时流时停。于是有人就埋怨起来了,主张拆了它。是拆还是改?我们的思想经历了剧烈的斗争。任何一件新生事物刚出现时总还不很完善,作用还不能得到充分的发挥,在这种情况下,人们往往会对它不理解。因此,对四立柱震压式造型机是拆还是改,其中也有一个站在那一条路线上来认识新生事物的问题。后来,我们党委统一了思想,并在群众中开展了路线教育,同时切实抓紧了技术改造措施,终于使四立柱震压式造型机变成了现在这条畅行无阻的流水线。”

参观完这三条流水线,徐汉清同志又给我们讲述了他们厂抓翻砂技术改造的深切体会:“从认识论上来看,怎样对待技术改造的成果,还有一个不断端正思想路线的问题。譬如,是提倡积极巩固,还是搞消极巩固,这里就有斗争。拿震压式造型机诞生后的情况来说,它代替了手工操作,生产效率大大提高,但由于它和流水线之间还隔着一条‘沟’,震实后的砂箱要靠人一箱箱往流水线上抬,一天要抬几十吨!产量问题解决了,劳动强度问题却突出了,这就要求进一步发展。四立柱震压式造型机流水线就是在克服了这种不足之处才诞生的。但它仍不够完善,噪音和灰尘比较大。这就又为我们提出了新的课题。现在的无箱挤压造型机,吸收了前两条流水线的长处,医治了它们身上的弊病,就变得比较完善起来,但它还要发展。如果搞消极巩固,把取得的技术改造成果视作极限,最后必然束缚自己的手脚,不可能创造新的成就,甚至连已经取得的东西也会给抛了。任何事物总是在发展中求巩固的。只有这样,才能使技术改造的步子沿着正确路线不断向前迈进。”

是啊,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一切发展,不管其内容如何,都可以看做一系列不同的发展阶段,它们以一个否定另一个的方式彼此联系着。”从整个翻砂行业技术改造的历史长河来看,现在所取得的成就,只不过是一滴水珠而已。翻砂行业技术改造的前途是广阔的,生产潜力可以说是很大很大。比如,缝纫机二厂这三条不同类型的流水线,现在还同时存在着(原因之一,是生产的需要一时还不可能把较落后的全部抛掉),但能不能尽快创造条件,用较先进的去代替较落后的呢?又如,整个行业的技术改造,发展还很不平衡,怎样创造条件使落后的赶上先进的呢?还有,翻砂行业目前的生产体制和任务安排,有好些是可以研究改进的,如果采取相应措施,那末,技术改造的成果就能在现有基础上进一步得到发展。所有这些问题,都需要我们在毛主席革命路线指引下,逐个去求得解决。

我们的调查访问,是在七、八月的大伏天进行的。室外的气温高,翻砂厂的高温可想而知。然而,翻砂工人那股决心把技术改造搞上去的劲头比高温还要高,到处是一片热气腾腾的景象。他们在制订远景规划时豪迈地提出了“木模不用木,泥芯不用骨,翻砂不用砂”。我们相信,在不远的将来,整个翻砂行业一定能够逐步实现这个壮丽的前景。

鲁 迅 传

石 一 歌

第十一章 在 厦 门

座落在闽南海滨的厦门大学，有着一番与古城北京迥然不同的风光，几座花岗石的楼房矗立在海边，校园里到处丛生着生命力强盛的亚热带植物——高大挺拔的龙舌兰。鲁迅在上海同许广平分手后，于九月四日来到这里，担任文科国文系教授和国学研究院教授。

当时，厦门大学才开办了五年多，教员宿舍还没有完全造好。鲁迅来到后，暂住在生物学院三楼靠海的一个房间里。这座楼房，筑在海滨的小山岗上，四无遮拦。屋外，茫茫的海水连着蓝天，海风卷着涛声日夜轰鸣。鲁迅有时在几个同事的陪同下，来到海滨漫步，他踏着玉屑一般的细沙，远眺南太武山那边天上的红霞，近看嬉戏于波涛之间的白鸥，顺便捡几枚奇丽精巧的贝壳。离此不远，耸立着明末郑成功建筑的城墙，蟠龙似地雄踞在海边；附近是当年的演武场，还有几尊郑成功军队遗留下来的野钢炮，在秋草萋萋的荒地上受着风吹日晒。这些遗迹，比海边的山光水色更使鲁迅不能忘怀。他不时前来凭吊，将思绪引到三百年前那段悲壮的时期，引到三百公里外被帝国主义强盗霸占去的祖国神圣领土台湾……

鲁迅初到厦门，离开了北京那种沉闷的环境，有种耳目一新的感觉。特别是看到报上刊登的北伐军节节胜利的消息，更是振奋异常。九月七日，北伐军攻下了汉口，包围了武昌，鲁迅从报上获悉这消息，不胜欢欣鼓舞；不久，北伐军攻入福建，鲁迅于九月十四日写信给已到广州的许广平，“此地北伐消息也甚多，极快人意。”以后每过几天，他都把北伐消息向许广平报告一次。迅速发展的革命形势，使鲁迅受到鼓舞。他在给朋友的信中曾说：“我来厦门，虽是为了暂避军阀官僚‘正人君子’们的迫害。然而小半也在休息几时，及有些准备。”所谓“休息”和“准备”，乃是回顾自己走过的革命路程，潜理和解剖自己的思想，总结斗争经验，以便迎接新的、更大的战斗。

九月二十日，开学了。开学前，群贤楼下右边的布告牌上，贴着一张文科办公室的布告：

“周树人先生，已到校多日，其所担任之《中国文学史》，《中国小说史》，及《声韵文字训诂研究》三门功课，定于下星期起，开始上课讲授，希各注意，此布。”

同学们看到这布告后，欢欣鼓舞，奔走相告。有些学生，是听说鲁迅要来厦大任教，特地从河南、青岛、南京、上海等地转学过来的，他们更是兴高采烈，觉得果然不虚此行。

鲁迅担任的三门课，原定每周各二小时；后来“训诂研究”没有开，小说史改为三小时。每当鲁迅讲课之前，热情的学生们常先到他的住处，替他拿了粉笔匣，簇拥着他走向课堂。鲁迅的生动讲授，象磁石一样吸引着青年们的心。当时厦门大学学生总数不多，四科十二系共四百三十二人，报名选读鲁迅课的有国文系全部学生，还有一部分英语系、教育系的学生。等到正式开课以后，人数越来越多，不仅商科、理科和法科的学生都纷纷赶来听课，连校内的助教和校外的记者、编辑也闻风而至。教室满座了，许多人便倚墙站着听。鲁迅讲课前，先把认真编好的讲义发给学生。讲课时，并不限于讲义的内容，而是围绕一个作家或作品，联系时代背景详加分析，旁征博引。大家屏息静气地听着鲁迅娓娓而谈，不时被他幽默的语句引得哄堂大笑。

鲁迅的讲课能吸引这么多的人，除了他态度亲切从容，言词简练生动之外，更重要的是思想新颖，分析鞭辟入里。当时，五四运动已经过去七年多了，但在厦门，旧思想、旧文化的浓云毒雾依然到处弥漫。市里的报纸，大学的刊物，甚至中小学生的作文，一律都用文言。孔家店的幽灵在校内外游荡。厦门大学校长兼国学院院长林文庆，就是个孔老二的忠实信徒，他曾专门写过《孔教大纲》鼓吹孔孟之道。在这样的情况下，青年们多么希望有人带领他们冲破这沉闷的空气呵！如今，他们把这番希望寄托在鲁迅身上。

鲁迅在讲授文学史的时候，同封建文人、资产阶级学者尊儒反法的论调针锋相对，他对于历史上坚持革新、坚持前进并屡遭儒家中伤咒骂的法家代表人物及其作品，给予高度评价。他称屈原的《离骚》“逸响伟辞，卓绝一世”；赞李斯的奏议“尚有华辞”，“秦之文章，李斯一人而已”；誉贾谊和晁错的政论文“皆为西汉鸿文，沾溉后人，其泽甚远”……有些在过去文学史著作中几乎被抹煞的法家代表人物，鲁迅甚至用专章加以论述。鲁迅对于编写一部中国文学史是存志已久的。尽管厦门大学的图书资料十分缺乏，但他还是着手编了十章，这就是以后整理出版的《汉文学史纲要》。由于鲁迅能从现实斗争的需要出发，以严肃的科学态度对待祖国文化遗产，力图找出它的内在规律性，探求文化发展与社会发展的关系，因此，他这部著作中所体现的文学史观，是非常接近历史唯物主义的。他的讲课受到青年们的热烈欢迎，也是不奇怪的。

青年们把鲁迅看成引路的导师，他们不满足于光听鲁迅讲课，还希望在鲁迅的支持和

指导下开辟新文艺的园地。有一次，几个青年来到鲁迅的卧室，表明了自己的心愿，鲁迅边听边频频点头：“好的，好的！我一定来帮助你们！”

在鲁迅的帮助下，厦大的学生组织了两个文艺团体，一个取名“泱泱社”，出版《波艇》月刊；一个叫做“鼓浪社”，出版《鼓浪》周刊，附在鼓浪屿的《民钟日报》副刊上发行。鲁迅尽管感到这些学生的作品由于受到资产阶级文艺的影响，或“过于颓唐”，或“大言无实”，“恐怕也不见得有什么好结果”，但仍象在北京时一样，怀着培养新一代的可贵热情，帮助青年们审稿、改稿，接洽出版事务。他曾经同一个向他约稿的书店联系，希望能出版青年的文学刊物，可是书店大概觉得无利可图，拒绝了。鲁迅非常气愤，对青年们说：“这种市侩，只要有利可图，他们会若无其事地厚着脸皮，又来请我写文章，那我只好不客气地说：‘没有什么空闲’！”后来，鲁迅又向上海的北新书店联系，托他们代为付印发行。十一月间，一本草绿色封面、装帧颇为精美的《波艇》月刊，送到了读者手中。为了表示对青年的支持，鲁迅特意把自己写的历史小说《眉间尺》（以后收入《故事新编》时改名为《铸剑》）发表在该刊的创刊号上。

与青年们在一起，鲁迅感到心情舒畅，但一接触到周围陈腐的空气，却又使鲁迅感到厌恶。

厦门，是帝国主义强迫开辟的“五口通商”之一。这儿，除了番客买办的洋房别墅之外，市区的街道又脏又狭，房屋又矮又破，四郊则到处是丛丛野草，累累荒塚，野狗在其间自由出没。鲁迅在谈起对厦门的感想时，引用了曾在清未来过这里的荷兰人亨利·包立尔的一句话：“中国全国就是大墓场”。

鲁迅更为厌恶的，是这座城市里流行的金钱至上的哲学。他说：“大概因为和南洋相距太近之故罢，此地实在太斤斤于银钱，‘某人多少钱一月’等等的話，谈话中常听见”。鲁迅虽然月薪较高，生活却很朴素，正象当时一位记者所说的：“没有一点架子，没有一点派头，也没有一点客气，衣服也随便，说话也不装腔作势。”但也正因为如此，他不时遇到一些人的白眼。

有一天，鲁迅拿了厦门大学总务处会计室发给的支票，到市区“集通银行”去支取薪水，他向着柜台里边说：“支款，先生！”

“好的，支票拿来！”柜台里边的人一边说，一边接过支票，不禁狐疑起来。他上上下下打量着鲁迅，心想：一个拿教授工资的人，怎么穿戴是这个样子？莫非是人家丢了支票他捡来冒领？于是就提高了嗓门问道：“你是哪一系的？”

“国文系。”鲁迅回答，又补充说：“或者是，国学研究院吧。”

“请稍等一下，到会客室坐坐吧！”那人装成彬彬有礼的样子，把鲁迅带到后面一间房子里，并拿了一张当天的《厦声日报》给他看。

鲁迅在会客室拿着报纸看了又看，香烟一支接一支，还是不见人影，正在莫名其妙，

忽听得远处断断续续传来了打电话的声音，“喂，喂！你是厦大会计室吗？——你们有没有一位教授名叫周树人的？——唔！是新来的。——唔！就是这样的身材！——唔！穿得太朴素了！——唔！唔！就给他！马上给，马上给！”那人这才笑容可掬地领鲁迅去办领款手续。

社会上是这样，在号称高等学府的厦门大学里也不例外。校长林文庆，对教员吝啬刻薄，日日希望大家从速做许多工作，发表许多成绩，象养牛为的是每日挤牛乳一般。鲁迅刚到校，他就问著作，问年底有什么东西发表，可是当鲁迅把稿子送去后，却没有下文。后来林文庆在一次会上提出连教学科研用的经费和预算也要打个对折。鲁迅在会上据理力争，林文庆却神气活现地说：“关于这事，是有钱的人，才有发言权。”鲁迅听后非常气愤，当场掏出两个角子拍在桌上，既犀利又幽默地说：“我也有钱，我有发言权。”弄得林文庆啼笑皆非，狼狈不堪。

十月十四日上午，厦大举行纪念周会。对于这种每星期一次的例行集会，学生们历来不感兴趣。然而这天大家听说鲁迅要来演讲，便争先恐后地拥到群贤楼上的大礼堂里。九时正式开会，照例是林文庆担任主席，照例是大家起立先唱校歌：“自强自强，学海何泱泱！……鹭江深且长，……嗟乎，南方之强！”唱毕，林文庆简单说了几句开场白，便向坐在台上的鲁迅一揖，顿时，礼堂里响起了一阵热烈的掌声。鲁迅走到讲台边，看了看底下的听众，说：“今天，我的讲题是：《少读中国书，做好事之徒》。”听到这个题目，会场里立刻活跃起来。

鲁迅说：尊孔，崇儒，读经，复古，可以救中国，这种调子，近来越唱越高了。其实呢，过去凡是主张读经的人，多是别有用心。你们青年学生，多是爱国，想救国的。但今日要救中国，并不在多读中国古书，相反地，我以为暂时还是少读为好。中国古书越多读，越使人思想糊涂，分不清是非。

鲁迅又说：其次，我要劝你们做“好事之徒”。世人对于好事之徒，往往感到不满，认为“好事”二字，好象有“遇事生风”的意思，其实不然。我以为今日的中国，这种“好事之徒”却不妨多，因为社会一切事物，就是要有好事的人，然后才可以推陈出新，发生变革。

鲁迅在又一阵热烈的掌声中结束了演讲。

过了不久，鲁迅演讲的纪录稿在《厦大周刊》发表了，但是不见了前半部分，原来林文庆认为前半部分同自己的尊孔主张相悖，干脆把它删掉了。从此，学校当局每次来约鲁迅演讲，他都一概谢绝。他说：“一演说，则与当局者的意见一定相反，真是无聊。”

在厦门大学，除了林文庆之外，“教授”中还有许多无聊的人物。他们不学无术，开口闭口“马丹”、“古貌林”，平时除了玩玩留声机，唱唱昆腔之外，就懂得吃吃喝喝，同银行家吹吹拍拍，一切都“惟校长之喜怒是何”。十一月十七日在大礼堂开恳亲会，学生指导长林玉霖起而演讲，竟厚着脸皮说道：“‘恳亲’二字，是恳切亲密的意思，我们的老校长好比家长父亲……”鲁迅听后，气得真要立刻跳起来。一位哲学教授起来反驳了指导长几句，马

上又有个留学西洋的教授为他辩护道：“在西洋，父子和朋友没有什么两样，所以倘说谁和谁如父子，也就是谁和谁如朋友的意思。”鲁迅后来说：“这人是西洋留学生，你看他到了西洋一番，竟学得了这大识见。”

其中，鲁迅最讨厌的是那些“现代评论派”的门徒。他们自称只佩服胡适、陈西滢两个人，整天围着权势者打转，到处安插亲信，散布流言，兴风作浪。鲁迅鄙视地称他们为“学者皮而奴才骨”，甚至“连皮也太奴才”了。眼看这类人在厦大飞扬跋扈，鲁迅感到气愤、失望。他在给友人的信中说：“我以北京为污浊，乃至厦门，现在想来，可谓妄想，大沟不干净，小沟就干净么？”

是的，如果不荡涤整个旧世界的污泥浊水，厦门当然不可能独独“干净”起来。

社会和学校既然如此腐败，周围的一些人又这样可憎，鲁迅除教学和辅导青年外，别的事就不愿多管了。很久以来，他一直渴望能认真、系统地清理一下自己的思想，以便适应斗争的需要和形势的发展。现在相对安静些，“琐事”也比较少，这正是一个学习和思索的好机会。

从九月二十五日起，鲁迅搬到集美楼居住。这座楼很大，楼的前面就是演武场；楼下是阅览室和书库，楼上是装订书刊的场所，有几个房间空着。鲁迅就住在楼上靠西边第二间房子里。房间的北面有两个大窗门，可以遥望南普陀寺；南面有两个大房门，门外走廊上有一排石栏杆。到了夜晚，人去楼空，整座大楼常常只剩下鲁迅一人，周围一片寂静，除了风声、涛声，只有偶而传来的几声犬吠。鲁迅的心情怎么也平静不下来。他靠着石栏远望，只见海天微茫，黑絮一般的夜色笼罩着一切。记忆的闸门打开了，一幅幅早已随着时光逝去的生活图景在眼前出现了，于是他又继续了《朝花夕拾》的写作，接连写了《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父亲的病》、《琐记》、《藤野先生》和《范爱农》等五篇散文。这些散文首尾衔接，前后呼应，相当完整地回顾了自己从童年到青年时代的生活历程：童年时期对私塾封建教育的不满，少年时期在沉滞、黑暗的故乡和骗钱害命的庸医周旋，青年时期对改良主义运动的失望，留学日本期间对日本友人的深厚情谊以及对军国主义的反抗，归国初期亲眼看到资产阶级领导的辛亥革命的失败以及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悲惨遭遇……鲁迅从自己艰苦而曲折的生活道路中，从近代中国历史的急剧演变里，深深感到必须寻找新的革命力量，必须掀起一场彻底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才能开创一个崭新的时代。这几篇回忆性散文，是鲁迅自我解剖的生动纪录，其间留下了他不断寻找革命真理的足迹。

在一个深秋的夜晚，鲁迅编完了一九〇七年至一九二五年的论文和杂文。望后窗外骨立的乱山中的许多白点，是从塚；一粒深黄色火，是南普陀寺的琉璃灯；寺里正在庆祝佛陀诞辰，诵经拜佛，超度亡魂，演傀儡戏的锣鼓声断断续续，间隔中更显得寂静。

看着这些旧稿，回顾一次次的斗争，鲁迅思绪万千。这些杂文，字里行间充满着战斗的呐喊，完全是针对着不合理的社会制度而发的，因此，很遭到一些“正人君子”的憎恶。鲁

迅深深地知道这一点。他提笔写道：

天下不舒服的人们多着，而有些人们却一心一意在造专给自己舒服的世界。这是不能如此便宜的，也给他们放一些可恶的东西在眼前，使他有时小不舒服，知道原来自己的世界也不容易十分美满。……即如我的戒酒，吃鱼肝油，以望延长我的生命，倒不尽是为了我的爱人，大大半乃是为了我的敌人，——给他们说得体面一点，就是敌人罢——要在他的好世界上多留一些缺陷。

这番话，生动地体现了一个革命者的人生观，洋溢着一种不可遏制的战斗激情。

鲁迅说，他现在要印行这些杂文，是为了使喜欢他的作品的读者得到一点鼓舞，同时也是为了使那些憎恶他的文章的人得到一点呕吐，他毫不犹豫地写道：“那些东西因我的文字而呕吐，我也很高兴的”。不过这些以往的战斗，已经“和光阴一同早逝去，在逝去，要逝去了”。鲁迅决定把这本集子定名为《坟》——“一面是埋葬，一面也是留恋”。“埋葬”，是批判地认识到自己走过的道路，否定思想上夹杂着的那些错误的东西；“留恋”，是珍惜斗争的历史和经验，准备迎向新的战斗。

哪一些可“留恋”，哪一些该“埋葬”，这须通过自我解剖才能明白。因此，在《写在〈坟〉后面》中，鲁迅深沉地说：

我的确时时解剖别人，然而更多的是更无情面地解剖我自己……

鲁迅具有可贵的自知之明精神，他通过自我解剖告诉读者，自己虽然从旧营垒中来，情况看得较为分明，反戈一击，易制强敌的死命；但唯其从旧营垒中来，所以“觉得古人写在书上的可恶的思想，我的心里也常有”，“自己却正苦于背了这些古老的鬼魂，摆脱不开，时常感到一种使人气闷的沉重”，特别怕因此而毒害了热情地寻找真理的青年。鲁迅决心摆脱旧文化、旧思想的影响，渴望找到一条正确的道路，但他又说：“我可正不知那一条好，虽然至今有时也还在寻求”。

但是，革命在发展，时代在前进，它有力地推动着鲁迅在寻求革命真理的道路上不断迈进。北伐战争接连取得胜利的消息，促使鲁迅对谁是革命的主力军这个老问题有了进一步的认识。鲁迅过去一直把希望寄托在青年知识分子身上。这时他越来越强烈地感受到工农群众的力量，更清楚地看到了脱离实际、脱离群众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劣根性，对他们深感失望。他在一次通讯中说：“我现在对于做文章的青年，实在有些失望；我看有希望的青年，恐怕大抵打仗去了，至于弄弄笔墨的，却还未遇着真有几分为社会的，他们多是挂新招牌的利己主义者。”反动派一直咒骂劳动人民是“愚人”、“傻子”，自以为是天生的“聪明人”，鲁迅却从大量的亲身体验中得出了结论：“世界却正由愚人造成，聪明人

决不能支持世界。”

十一月二十七日，鲁迅就以“愚人”和“聪明人”为题，到集美学校作了一次演讲。

集美与厦门隔海相望，是著名的侨乡。十一月二十六日晚，集美学校的校长派秘书请鲁迅去演讲。演讲的题目事先并没有规定，但那位秘书带来了校长的一个口信：“校长的意思，是以为学生应该专门埋头读书。”鲁迅当即回答：“那么，我却以为也应该留心世事，和校长的意见正相反，不如不去好罢。”秘书面有难色，急忙改口说道：“不妨，也可以说说。”于是，第二天早晨，鲁迅便乘小汽船到了集美学校。

集美学校的大礼堂里，已坐满全校各部学生三千人。

鲁迅在雷鸣般的掌声中说：现今世上，聪明人不是很多吗，可是他们不能做事。为什么呢？因为他们想来想去，终于什么也做不成。他们过于思虑个人的利害，过于计较个人的得失。他们想着，想着，有利于自己者才肯做，有利于社会别人者，即使肯做，也常不彻底，不真诚，不负责，以至于败事而无成就。在这世界上，还有一种人，他们甘愿为群众利益，而放弃了自己的利益；他们甘愿为国家的独立自由，而献出自己的生命。这一种人在所谓“聪明人”的眼里看来，却是傻子。但是，你们要知道，世界是傻子的世界，由傻子去支持，由傻子去推动，由傻子去创造，最后是属于傻子的。这些傻子，就是工农群众，就是孙中山先生“三大政策”中所要扶助的农民和工人。他们是世界的主人，世界是属于他们所有的。

鲁迅的演讲引起了截然不同的反响，坐在讲台后面的校长摇头不止，鲁迅演讲刚结束，他就赶忙过来要了鲁迅的演讲稿，准备会后束之高阁，秘不示人。但是，青年学生们却报以一片热烈的掌声，他们决心学习“傻子”，鄙弃“聪明人”。

对工农群众认识的深化，又促使鲁迅对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认识比以往进了一步。十一月十四日，一个风雨之夜，鲁迅为一本别人翻译的俄国小说集《争自由的波浪》写了《小引》，在这篇《小引》中，他反驳了反动派对工农政权的诬蔑，指出：在十月革命后的俄国，“贵人自然总要较为苦恼，平民也自然比先前抬了头”。他还认为革命工农大众对敌人的暴力镇压是从敌人那里学来的：“俄皇的皮鞭和绞架，拷问和西伯利亚，是不能造出对于怨敌也极仁爱的人民的。”这种对革命敌人的镇压势在必行，极为重要。鲁迅进而联系实际，希望中国人民从十月革命中吸取经验，“推见将来”，争取祖国的解放。

正当鲁迅越来越瞩目于工农群众的时候，他接到一个通知，厦大学生会创办了一所“平民学校”，邀请他出席开学典礼。这个学校，学生主要是厦大工友的女儿、厦大中年轻的工友以及厦大附近一些贫苦失学的青年。教员则是义务的，由厦大的一些学生担任。十二月十二日，学校开学，为了出席这个会议，这一天鲁迅起得特别早，提前到了会。面对着这么多历来被剥夺受教育权利的贫苦工人的孩子，鲁迅觉得有许多话要对他们说，因此，他这次破了在厦门大学不再作演说的例，作了一次热情洋溢的演讲：

你们都是工人、农民的女儿，你们因为穷苦，所以失学，所以须到这样的学校来读书。但是你们穷的是金钱，而不是聪明与智慧。你们贫民的子弟一样是聪明的，你们贫民的女儿一样是有智慧的。你们能够下决心，你们能够奋斗，一定会成功，一定有前途。没有什么人有这样大的权力：能够叫你们永远被奴役；也没有什么命运会这样注定：要你们一辈子做穷人。

这些感情深沉的话，使二百多个工农学生深为感动。

会上有个留洋的教授，大放厥词，说什么这个学校于贫民有益，就是你们“底下人认识了字，送信不会送错，主人就喜欢他，要用他，有饭吃”等等，鲁迅听了大为生气，便愤然离席。

北伐的消息，也使鲁迅对厦门大学死气沉沉的局面更无法忍受。原先他想在这里工作两年，后来减为一年，最后缩短为一个学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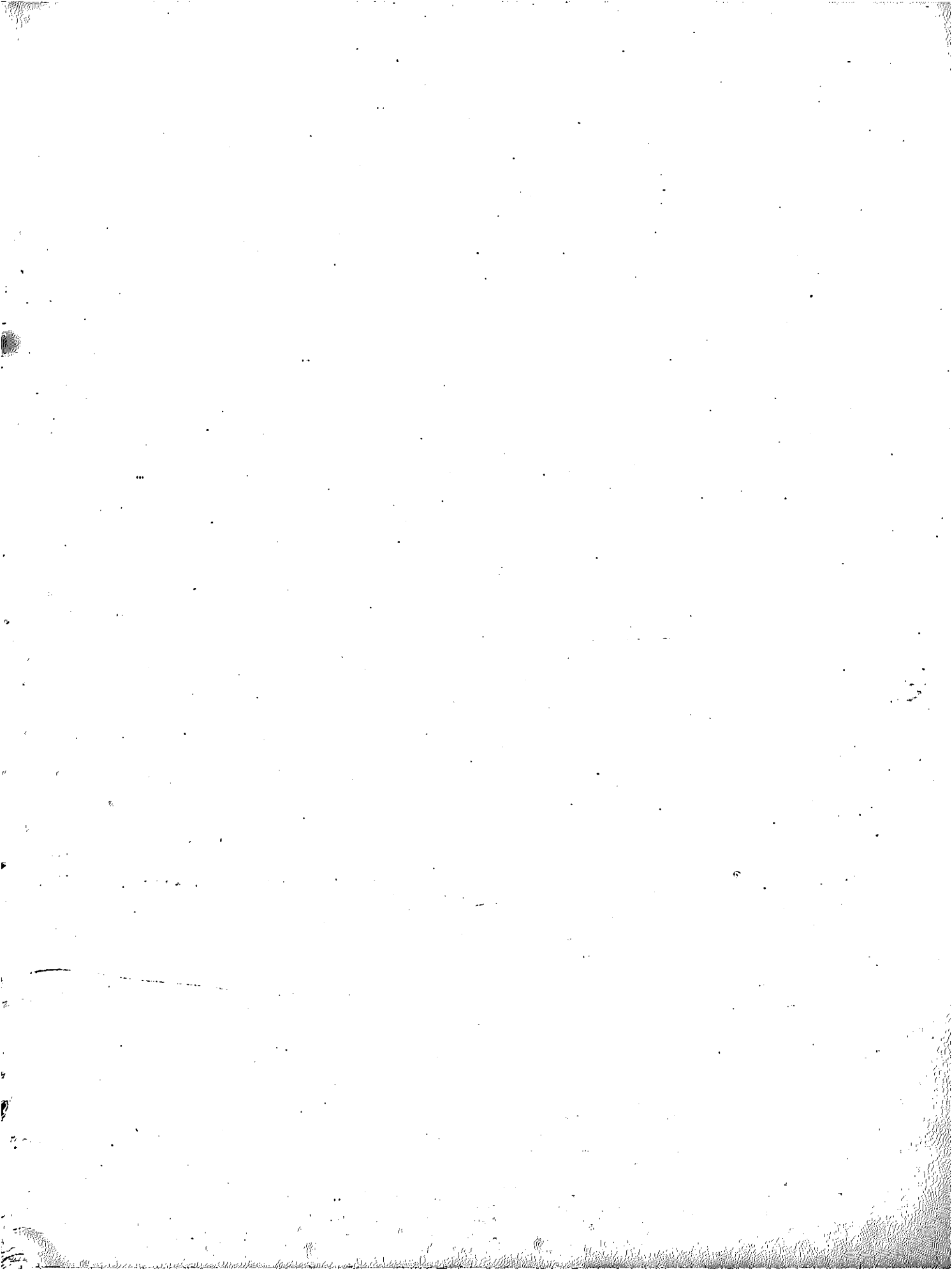
鲁迅渴望“到热闹的地方”去，到革命的旋涡中去，积极投入激烈的战斗。一九二六年秋，广州中山大学向鲁迅发来邀请的电报。鲁迅接受了聘请。他在给许广平的信中说：“我也还有一点野心，也想到广州去后，对于‘绅士’们仍然加以打击，……第二是与创造社联合起来，造一条战线，更向旧社会进攻，我再勉力写些文字。”十二月三十一日，鲁迅正式向学校提出辞职书，辞去一切职务。

鲁迅辞职的消息传出后，学生们立即掀起挽留运动。一月二日，学生自治会派代表会见鲁迅，表示了大家的心愿；后见鲁迅决心已下，就在一月四日下午召开了“厦门大学全体学生送别鲁迅先生大会”。同学们知道鲁迅所以提前离开是由于学校的腐败，他们对此格外感到愤怒。群众中积压着的不满汇为滚滚巨浪，终于掀起了一次大规模的改革学校的风潮。一月七日，群贤楼的布告牌上，走廊的石壁上，学校四周的围墙上，到处张贴了要求改革的标语，全体学生罢课，学期考试除鲁迅所讲两门提前考完外，其他各系各门功课一律停止举行。许多学生表示要追随鲁迅而去。林文庆看到风潮越闹越大，就恼羞成怒，表面上一再为鲁迅饯行，背后却攻击鲁迅是“放火者”，到厦门来是为了“捣乱”。林文庆以为这样一来就可以攻倒鲁迅，没想到鲁迅坚定地回答道：“放火者就放火者吧。”

离开厦门前，鲁迅特意坐在一个水泥坟墓的祭桌上拍了一张照片，四周是丛生的龙舌兰，坚韧挺拔。这张照片和杂文集《坟》的名字一样，表示向过去告别。

一九二七年一月十五日上午，鲁迅在许多师生的陪伴下离开厦大。次日下午，他与送行者一一握别，带着迎向新的战斗的革命豪情，也带着正在逐步激化，但尚未彻底解决的一系列深刻的思想矛盾，乘“苏州”号海轮前往广州。

(续五)



◆
一 九 七 五 年

◆
第 十 期

◆
总 第 二 十 六 期
◆

上海学习与批判杂志编辑部编

(上海复旦大学)

上海市报刊发行处发行

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上海绍兴路5号)

上海商务印刷厂印刷

代号: 4-192

定价: 0.25 元